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坚持创新开放合作 推动中国基础设施和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张晓强 (005)

中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011)

• 国际经济 •

把握数字经济机遇 提升中国软件出口竞争力 王晓红 李 蕊 (022)

绿色“一带一路”顶层设计与思考

张继栋 潘 健 杨荣磊 邢国均 (042)

非洲包容与可持续工业发展测度及援助方式选择

王 圳 岳鸿飞 周 静 (051)

货币政策转型规律探析

——基于国际比较和国内制度变迁的视角

郭迎锋 胡一鸣 梁云凤 (065)

完善金砖国家合作平台的思路和路径设计

赵春哲 (081)

• 区域经济 •

三个维度看浙江 黄 勇 潘毅刚 郎金焕 (094)

深圳：新时期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排头兵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李罗力 (107)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17)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4)



CONTENTS

Adhering to innovation, opening up and cooperation: To driv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s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industry *Zhang Xiaoqiang* (005)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 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CCIEE Research Group (011)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nhance China’ s softwar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Wang Xiaohong and Li Rui* (022)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top – level design of green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Zhang Jidong, Pan Jian, Yang Ronglei and Xing Guojun* (042)

Measurement of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hoices
of aid modes in Africa *Wang Zhen, Yue Hongfei and Zhou Jing* (051)

Analysis of the law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hange
Guo Yingfeng, Hu Yiming and Liang Yunfeng (065)

China’ s thinking and path design for improving BRICs cooperation platform
Zhao Chunzhe (081)

Three dimensions to see Zhejiang *Huang Yong, Pan Yigang and Lang Jinhuan i* (094)

Shenzhen: the pioneer of promoting social reform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Commemorating 40th anniversary China’ s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 Luoli e* (107)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7)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4)

坚持创新开放合作 推动中国基础设施和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张晓强

摘要：中国自 2009 年起成为居世界首位的能源消费大国，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能源产业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着力推动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能源行业的创新发展，需要强化基础研究，拓展实施若干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包括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深海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装备与技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控和电机关键技术，大型地下储气库建设工程技术，大规模储能技术，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等。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既要支持骨干大型能源企业的创新，也要加强对一大批中小能源企业创新的支持。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更有效地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这一顽疾。能源领域的开放需要努力的是：优化国际合作布局，更有效实施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化；加强与国际能源论坛、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制定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规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推动与主要油气贸易国家双边贸易使用本币结算，探索建立东北亚或亚太区域油气定价机制，合作开展能源互联网，积极推动与相关国家或区域间谈判签订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议（FTA）及投资保护协定；支持企业以多种方式开展国际合作。

关键词：创新 开放合作 基础设施 能源产业

作者简介：张晓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

* 本文为作者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在首届中国基础设施与能源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其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此，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也是中国基础设施和能源产业今后发展必须遵循的。

一、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从中国自身的经验出发，有“要致富，先修路”的生动说法。中国的矿业、制造业、农业、旅游业、电子商务发展等等，均因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而得以实现。截至 2017 年底，中国高速铁路通车里程 2.5 万公里，占全球的 60% 以上；高速公路 13.6 万公里，超过美国；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近 2800 个，城市地铁通车里程 3882 公里，均居世界首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和创新。为了发展高速公路，20 世纪 80 年代中进行了“借钱修路，收费还贷”的探索，在沿海主要港口都大量引入外资。中国高铁在 2004 年起实施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联合制造，打造中国品牌”的战略，从德国、加拿大、日本、法国引进技术，在此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而在短短十年间不仅运营里程增加了 200 倍，建设、运营管理、设备制造的水平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发展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2017 年，中国用于包括交通运输、电信、互联网、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的基础设施投资达 14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9%，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 22.2%，高居世界各国之首，如果再加上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领域的投资，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约 17 万亿元。当前，大批发展中国家都迫切希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顺应这一重大发展需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建设的优先领域。五年来，各参与国既积极开展电力、公路、港口、铁路、电信等本地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向着逐步形成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努力迈进。交通领域的中老铁路、印尼的雅万高铁、泰国的新铁路建设都取得重要进展；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已发展成东亚联接南欧、中东欧的重要海运枢纽。今后一个时期，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仍将在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处于重要位置。

二、中国已成为能源消费大国

中国自 2009 年起成为居世界首位的能源消费大量。中国的能源消费于 2017 年达 31.3 亿吨油当量、占比达 23.2%，比居世界第二位的美国高 40%。经过多年努力，中国能源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例如，2007 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量（26 亿吨油当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发电量 2011 年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中国清洁煤大型发电机组在度电煤耗、排放等指标方面已达世界先进水平，高压电网规模居世界之首，智能电网水平不断提升，80 万伏/100 万伏特高压输电工程居世界领先地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8.3% 提升至 2015 年的 12%，2017 年达到 13.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 2010 年至 2015 年降低了 18.2%，2016 年、2017 年又分别降低了 5% 和 3.7%。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比重 2007 年达 72.5%，2017 年已降至 60.4%。2017 年末中国累计风电装机达 1.8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达 1.3 亿千瓦，均居世界首位（37% 和 32%）。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从根本上来讲，靠的是深化改革，坚持科技创新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三、中国能源产业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2017 年中国消费了世界能源的 23.2%，但 GDP 仅占世界的 15%，能效水平仅为世界平均值的 65%；日本、美国的能效分别为中国的 2.7 倍和 2.4 倍。由于煤炭消费占比仍高达 60.4%，以及清洁煤工程技术发展存在的差距等因素，中国的大气质量虽经多方努力，但仍面临严峻挑战。京津冀地区是中国 PM_{2.5} 浓度最高地区之一，虽经连续五年努力，平均浓度已下降近 40%。但北京 2017 年 PM_{2.5} 平均浓度仍达 58 微克，几乎是广州市的两倍，与澳大利亚等先进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能源价格改革、国有能源企业改革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笔者还想指出的是，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对清洁高效能源的需求将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由于资源环境制约，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进口量连年增长，进口依存度逐年升高。2017 年，中国生产石油 1.92 亿吨，比上年减少 4.1%，进口原油达 4.2 亿吨，比上年增长 10.1%；生产天然气 1480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8.2%，但进口天然气和 LNG 6857 万吨，比上年增长 26.9%。原油、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已分别达到约 69% 和 38%。2018 年 1—9 月，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同比又分别增长了 6% 和 34%。保障油气供应安全也是重大挑战。

四、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着力推动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为此，要统筹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推进风电、光伏发电发展，安全建设自主核电示范工程 and 项目，完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扶持政策，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要构建现代能源储运网络，统筹推进煤电油气多种能源运输方式发展，加强能源储备设施建设。要加快推进能源全领域、全环节智能化发展，加快智能电网建设，推进能源与信息等领域新技术深度融合，统筹推进能源与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列出的能源发展重大工程中，包括对煤炭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使现役电厂每千瓦时平均煤耗低于 310 克、新建电厂低于 300 克；有序优化建设“三北”等地的风电、分布式光伏发电；建成国家石油储备二期工程，建设天然气储气库；要积极发展能源关键技术装备，包括加快推进煤炭无人开采、深海深层常规油气开发、700℃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提升第三代核电、高效锅炉、智能电网和高效电机等装备制造能力。这些重大工程以及“十三五”规划关于深入推进能源革命、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效、清洁低碳发展的战略要求，必须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深化改革、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才能实现。

（一）关于能源行业的创新发展

需要强化基础研究，拓展实施若干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包括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深海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装备与技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控和电机关键技术，大型地下储气库建设工程技术、大规模储能技术、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等。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既支持骨干大型能源企业创新，也要加强对一大批中小能源企业创新的支持。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更有效地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这一顽疾。

（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首先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其中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例如，对油气领域的勘探开发、进出口业务、管网建设运营、LNG 接收站等，要进一步对多种市场主体公平有序开放。要进一步健全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大幅度放开竞争性

环节价格。在天然气价及电价形成机制、能源期货市场发展、完善新能源支持补贴政策等方面都要作出更大的努力。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服务产品，加强银企合作，使绿色金融得以健康发展。为此，政府职能也应加快转变。要继续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进一步提升监管、服务和预测预警能力。

（三）深化能源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今后一个时期，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要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发布了多个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文件。2018年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首次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进一步减少了准入限制，对汽车、金融等领域的扩大开放还明确提出了路线图、时间表。

就能源领域的开放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优化国际合作布局，更有效实施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化。包括加强政府间合作，深化和扩大与重点资源国的能源务实合作，推进重大能源合作项目，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2017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居前五位的分别是俄罗斯（14.2%）、沙特阿拉伯（12.4%）、安哥拉（12%）、伊朗（7.4%）和阿曼（7.4%）。从上述五国进口的原油占全部原油进口的比重达53.4%。今后，中国作为世界原油进口量最大而且长期稳定的市场，有条件也需要实现更加多元化。2017年，中国进口LNG达3812万吨，比上年增长46.3%，占全部天然气进口的比重达到55.6%，主要进口国分别是澳大利亚（49%）、卡塔尔（22%）、马来西亚（12%）和印尼（9%）。上述四国占中国进口LNG比重高达92%。从发展趋势看，五年内中国将成为天然气/LNG世界进口第一大国，也应有更多元化的供应国。要重点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油气勘探开发、油气管网互联互通、发电与电网建设、新能源和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合作。2018年10月18日，在中国苏州举行的“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上，中国与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科威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委内瑞拉等17国共同发布了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部长联合宣言。宣言提出，促进各参与合作的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将就“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原则与务实行动开展深入的协商讨论，在2019年正式成立“一带一路”能源伙伴关系，这是向所有感兴趣的国家

和国际组织开放的合作平台。要特别指出的是，不仅是能源领域，“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所有领域都是开放式合作。对日本、西欧、加拿大、美国等非沿线国家企业的参与，中国也非常欢迎。实践中，已有一些日本、美国、西欧公司积极参与，中国政府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均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了共识。

第二，要加强与国际能源论坛、可再生能源署、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制定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规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等多边框架下积极开展合作，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发展格局。要坚持《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确定的原则与主要措施，发展绿色能源、低碳经济。中国将积极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百分之百兑现减碳承诺，即到 2020 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 2015 年减少 40%~45%，在 2030 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与各国共同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第三，在推动与主要油气贸易国家双边贸易使用本币结算、探索建立东北亚或亚太区域油气定价机制、合作开展能源互联网、积极推动与相关国家或区域间谈判签订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议（FTA）及投资保护协定等方面，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和良好前景。同时，支持企业以多种方式开展国际合作。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应动员各类资金，有序推进公私合作（PPP）模式，也应鼓励油气企业、航运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明多样化深入发展。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同时，中国也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和正当权益。健康的国与国外交关系和稳定发展的经贸合作及能源资源合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对此应高度重视，损害双边关系而又希望在经贸方面取得更多更大利益是很难实现的。我们应该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增添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

责任编辑：谷 岳

中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当前，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各项事业发展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全面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开放再出发、再奋进，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 回顾 前瞻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社会革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全面回顾中国经济领域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认真总结经过艰辛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入研究改革开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于坚定不移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改革开放 40 年研究（新时代改革开放出发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执笔人：王宪磊、李娣。

一、中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展与成就

改革开放 40 年来，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从人民生活不足温饱到全面小康的伟大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

40 年来，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大胆探索，全面深化和推进改革开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确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从改革前“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转变到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40 年来，市场主体逐步发育，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国有经济在石油石化、航空航天、电力、电信、交通运输、国防工业、重大资源开发、重大装备制造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及关键领域处于优势、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据统计，2017 年底，全国非公有制企业 2726.3 万家，注册资本超过 165 万亿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 50%，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 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 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 80%，对新增就业贡献超过 90%。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对经济稳定增长、扩大社会就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技术创新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适合农村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

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领域改革的突破口。20 世纪 70 年代末，安徽、四川等省率先进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经济改革实践，这种经营模式很快取得效果，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随后向全国推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党的十四大后，农村改革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党的十六大后，经济改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阶段。2006 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四税”，并相继推进以乡镇机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 40 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和 2 次中央深改委会议，其中有 19 次涉及农村改革议题，审议了 26 项涉农改革方案。推行承包地“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着力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了成功之路。

（三）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领域改革的中心环节。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对企业“放权让利”，改革在探索中不断推进。此后，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为多元股东持股公司制，建立了资本金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推动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与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相配套，中央各部门出台了 100 多个政策文件，各地结合实际出台落地文件超过 800 件，共同构成了国企改革设计图和施工图。40 年来，国有企业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不断深化，极大地激活了企业活力，增强了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国有经济布局 and 结构调整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四）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

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逐步打破了高度集中的传统宏观管理体制，实行简政放权，发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40 年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相继推进投资、财税、金融、外汇、价格等重大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建立中央银行调控体系，建设多元化银行体系，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推进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建设，实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稳定制度。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实施分税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完善一般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改进预算管理制度，颁布实施新《预算法》，实施营业税改增值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消费，有效应对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积极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投资体制改革方面，简化投资项目审批程序，不断扩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权限，优化投资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建立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投资项目资本金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决策分层化、投资方式多元化、融资渠道多元化、建设实施市场化和投资管理间接化。同时，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产业、区域、财政、

货币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40 年来，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有效防范和化解了经济领域的重大风险，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

（五）全面构建现代市场体系

经过 40 年改革，中国已基本形成多层次、多门类的商品市场体系和多种类市场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商品市场格局。各类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建设不断推进。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现市场定价，水、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扎实推进，放宽竞争性环节价格。初步建立土地市场化定价机制，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产权市场逐步建立，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都有了长足发展，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允许各类市场主体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

（六）推动建立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大，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城镇化进程进入快车道，城乡互动发展。21 世纪初，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等特大城市，及由特大城市引领的城市群，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逐步形成。党的十八大后，围绕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一步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同时，加快农村综合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七）逐步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40 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全面开放格局正在形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度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提高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逐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有效地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交流。党的十八大后，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放宽市场投资准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推进自贸区建设试点，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衔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扩大对外开放和国内改革发

展衔接。加强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合规制度建设。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据统计，1979—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4.1万亿美元，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9万亿美元，2017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规模位列世界第二位。中国已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2013—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7310.7亿美元，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18090.4亿美元。中国的贸易伙伴已由1978年的40多个发展到遍布全球，贸易市场多元化的格局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不仅使封闭和半封闭的中国成功地融入全球化，而且使全面开放的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八）初步建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经过40年改革，中国已初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各级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改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和标准得到全面落实，保障能力和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2017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8%，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超过80%。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培训不断强化。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整合，保障水平稳步提高，临时救助制度全面实施。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基本医保参保率超过98%，大病保险覆盖全部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力度加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均达到98%以上。

（九）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升，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71元，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增长8.5%。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为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5年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2017年为29.3%和32.2%，分别下降28.2%和35.5%。到20世纪80年代全国十几亿人口的温饱基本解决。21世纪初，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用电器全面普及。21世纪第一个10年，住房、汽车进入千家万户。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用轿车保有量呈现井喷式增长，从2012年的5989万辆增加到2017年12185万辆，其中私人轿车从5308万辆增加到11416万辆，分别增长了2倍多。旅游、休闲、养老、文化娱乐等产业爆发式增长。40年来，中国人民生活从贫困走向小康，正迈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改革开放 40 年的宝贵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以下七个方面十分宝贵。

（一）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顺利推进改革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始终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40 年来，我们党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以保持党始终成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我们党肩负着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重任，为了最终完成党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必须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40 年的改革进程和实践经验证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始终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是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改革开放前夕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解放思想、开启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此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新的发展变化需要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并推动了各领域改革，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相互促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提出一系列开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理念创新引领实践创新，不断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正是因为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才取得了 40 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在今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并贯彻到坚持改革开放、解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上来。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改革是我们党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尊重人民在实践中的创造精神，从实际出发作出的战略决策。40 年来每一项重大改革决策，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是党从群众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起来的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我们党立足国情，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从人民群众最期盼的领域，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必须牢牢坚持运用好这一宝贵经验。

（四）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渐进式推进改革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以问题为导向，正视问题、找准问题，先试点后推广，进而解决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党从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需要不断完善，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以问题为导向，实行渐进式改革方略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充分运用。实践证明，以问题为导向，渐进式改革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宝贵经验，有利于既积极又稳定地推进改革开放。

（五）始终坚持顶层设计与整体谋划，全面协调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一项极为复杂、宏大的系统工程，既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特别是攻坚克难阶段，任务复杂艰巨。不仅需要搞好顶层设计、整

体谋划和统筹协调，加强各领域、各层次、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耦合性、系统性和协调性，还需要注重思想方法、设计方法、操作方法和推进方法，讲求协调推进改革，力争最大综合效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三中全会都强调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和整体谋划，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重大原则、主要任务、重要举措以及路线图、时间表。坚持顶层设计与整体谋划，全面协调推进改革开放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协调、扎实向前发展。在新阶段全面改革开放中，应继续坚持和运用好这条宝贵经验。

（六）始终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改革需要开放的推动力量，开放需要改革的体制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改革是为了发展，开放也是为了发展，改革开放都是为发展服务。实践证明，哪些地方开放得早，改革同开放结合得好，那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就大，发展就快；哪些地方的改革不断深化，制度有所创新，那里的改革开放就搞得好。最早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和以后陆续增加的开放城市及地区，不仅走在前面，而且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方面也先试先行，提供了可复制的丰富经验。40 年来，我们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开放，以开放带动改革。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原有体制的弊端愈益显露，迫切需要改革，亟待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吸收外商投资增加和企业“走出去”，直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国际化、政企关系调整、外贸和外汇管理体制变革，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大步伐。与此同时，外贸、外资、外汇、营商环境等管理体制的改革又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将为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断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使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

（七）始终坚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中国成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又一条宝贵经验。坚持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40 年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放在首位，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仍是今后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而要解决发展面临的难题，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离开发展，改革就失去了意义。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不断进行改革，为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保障。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只有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保证经济社会顺利发展；否则，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在今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仍然必须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三、今后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当前，我们正处于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阶段。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的“两步走”战略任务。这个任务宏伟而艰巨。

全面估量和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是正确认识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新形势、新挑战，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依据。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从全球看，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抬头，贸易摩擦加剧，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

从国内看，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任重道远。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

我们既要充分看到有利条件，增强夺取新胜利的信心，又要高度重视前进中的矛盾和困难，不仅要继续改革原有经济体制遗留的弊端，而且要着力解决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还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与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环节和方面。因此，必须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社会多方参与、公平正义、规范运行的社会治理体系；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基础上，健全有效激发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良性互动运行高效的机制。

根据初步研究，认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领域深化改革开放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创新和完善现代化市场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根本要求。要加快创建和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抓紧研究制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政策。完善物权、债权、股权等各类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持续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完善资源和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深化科技、教育、人才体制改革，破除妨碍技术、劳动力、人才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

第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切实推进政企政资分开，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着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第三，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发展差距大是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突出体现，社会发展滞后和生态环境恶化突出表现在农村。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释放新的发展动能，稳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各类农村资源，着力引导要素资源流向农村，推进城乡“四化”同步发展，着力城乡绿色融合、协同共进发展。

第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政策协调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创新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构建适应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宏观调控和规划指标体系，协调运用好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加强政策统筹，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时机、节奏、力度，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工具。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

改革政策的协调配合，服务稳中求进。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第五，全面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健全有利于促进公平效率的财税制度。当前，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不明确，财政风险问题不容忽视。同时，现有的税制与分配制度拉大了区域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财税体制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二是推动形成新时代下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体系。三是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四是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

第六，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抓紧解决中国金融结构失衡、金融脱实向虚、金融服务滞后等问题。健全开放普惠现代金融制度体系。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形成广覆盖、可持续、补充性金融组织体系。创新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推动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积极扩大金融开放。纵深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严密防控系统性风险。

第七，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新形势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需要进一步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一是继续扩大经贸合作朋友圈。二是积极应对好贸易摩擦。三是加快建设高标准营商环境。四是扩大对外开放范围。五是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六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七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对外开放新空间，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发展格局。

第八、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着眼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关键在于加强科研为主的体制创新，打通技术创新的供需通道，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加强和完善科技创新管理，激发创新活力，更加重视人才的全面发展。

第九，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着力建设美丽中国。一是加强制度创新，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二是强化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健全绿色市场体系。三是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四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五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科学构建生态管理体制。六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责任编辑：李蕊

• 国际经济 •

把握数字经济机遇 提升中国软件出口竞争力

王晓红 李 蕊

摘要：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随着各国智慧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成长，将不断释放出对软件市场的强大需求，为扩大全球软件贸易创造出巨大的市场机会。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相比之下，中国在数字经济战略布局、发展环境、产业链、核心技术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应制定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相关发展规划；把握数字经济机遇，提高软件出口竞争力；加快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构建研技产融合的软件业生态体系；提高软件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水平；力争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关键词：数字经济 数字贸易 信息技术 软件出口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李 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助理研究员。

引 言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以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为引领、开放的平台为载体、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为内容，快速渗透到研发、制造、物流、贸易、金融、管理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以及政府管理、社会创新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变

革。数字经济时代“计算、网络、数据、软件”无处不在。软件是支撑计算、网络和数据的基础，软件信息技术服务是构成数字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也是数字经济的灵魂。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贸易也将成为下一代的主要贸易方式。2013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了数字贸易这一概念，即通过互联网传输而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主要划分为四类：数字内容、社会媒介、搜索引擎、其他数字产品和服务。2014年8月该机构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中又对数字贸易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将其定义为依赖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其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交付中发挥关键作用。数字贸易既包括数字化的产品或服务，也包括各种商品的电子商务。即，数字贸易既包括数字商品的贸易，也包括数字化的贸易方式，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数字化方式对传统贸易的升级。数字化给商业发展模式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和重构，也使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领域更加丰富，区域范围大大拓展，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贸易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据麦肯锡的研究，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起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及其他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中有50%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超过12%的跨境实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据测算，从2005—2014年通过互联网传输的全球数据流量增长了45倍，远远超过传统的国际商品贸易或金融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软件贸易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取决数字经济时代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智能流程自动化（RPA/IPA）、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AR/VR/MR）等新技术正在赋予软件业以新的内涵，为全球软件业的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注入新动力。同时，也促使软件出口企业改变传统的贸易模式，加快数字贸易条件下的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和跨境交付模式创新。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的空前发展必将为提升软件业的创新能力和出口竞争力带来深刻影响。

一、中国软件出口现状及主要特点

（一）软件出口增速回升，规模实力明显增强

近几年，中国软件出口进入波动趋缓增长时期，但实力明显提升。2017年，软件出口继续恢复中高速增长态势，软件出口执行金额375.56亿美元，相当于2011年的2.6倍；协议金额571.82亿美元，相当于2011年的3倍；合同数量59943个，相当于2011年的1.3倍（见表1、图1）。

表 1 2011—2017 年我国软件出口规模与增速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合同数	同比增长 (%)
2011 年	143.39	47.36	190.68	51.09	46159	18.22
2012 年	194.16	35.40	234.2	22.82	53887	16.74
2013 年	253.56	30.59	320.71	36.94	52683	-2.23
2014 年	300.57	18.51	377.15	17.55	52265	-0.81
2015 年	333.93	11.10	425.78	12.89	52173	-0.18
2016 年	342.3	2.51	464.89	9.19	52790	1.18
2017 年	375.56	9.72	571.82	23.00	59943	13.55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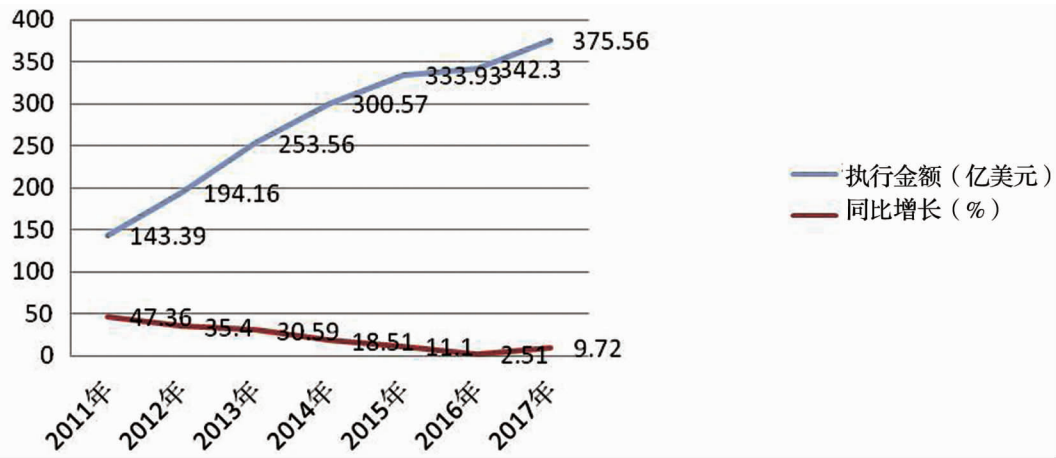


图 1 2011—2017 年我国软件出口规模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二）出口价值链持续向高端跃升，出口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

1. 软件出口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主，软件产品降幅收窄。2017 年信息技术外包出口执行金额 364.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1%，占总量的 96.98%；软件产品出口执行金额 11.35 亿美元，占总量的 3.02%，同比下降 3.98%，降幅较上年（-30.78%）大幅收窄。
2. 信息技术外包以软件研发外包为主，信息技术服务外包、运营和维护服务增长较快。2017 年软件研发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外包、运营和维护三项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243.42、68.80、51.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4%、16.51%、21.26%，分别占信息技术外包总额的 66.84%、18.89%、14.14%。
3. 逐步形成了软件外包为主，集成电路、电子商务平台等多元化出口格局。在软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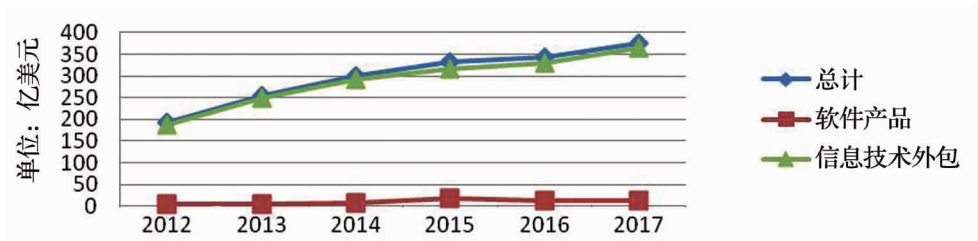


图 2 2012—2017 年软件出口结构趋势图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研发外包中，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软件技术服务占比较高，2017 年这两项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70.35、72.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68%、9.39%，分别占软件研发外包的 69.98%和 29.86%。在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中，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执行金额占 61.08%，居主导地位，电子商务平台服务、IT 解决方案呈现大幅增长，2017 年这三项执行金额分别为 42.02、4.19、3.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6%、226.44%、367.10%。在运营和维护服务中，信息系统运营和维护服务执行金额占 68.14%，其他运营和维护服务实现 74.75%的增长。上述分析表明，我国软件出口企业向高端综合业务领域的拓展能力不断提高，尤其是跨境电商的国际领先优势带动了电商平台的高速增长。

表 2 2017 年信息技术外包出口规模与增速

单位：亿美元

合同类别	合同数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59943	13.55	571.82	23.00	375.56	9.72
信息技术外包 (ITO)	55177	15.52	553.60	23.72	364.20	10.21
软件研发外包	40866	13.25	394.04	29.03	243.42	6.74
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	30720	17.48	310.13	37.65	170.35	5.68
软件技术服务	10012	2.22	83.52	4.97	72.69	9.39
其他软件研发外包业务	134	-3.60	3.82	-25.45	0.38	-7.62
信息技术服务外包	7604	33.94	83.92	-4.18	68.80	16.51
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	5579	39.44	46.48	-7.51	42.02	4.56
电子商务平台服务	297	40.09	4.76	159.35	4.19	226.44
测试外包服务	753	5.31	21.76	66.16	12.07	11.67
IT 咨询服务	124	4.20	0.64	-19.77	0.42	3.36
IT 解决方案	371	113.22	4.13	380.68	3.73	367.10

续表 2

合同类别	合同数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业务	480	5.26	6.14	-70.37	6.37	14.46
运营和维护服务	6700	11.74	75.28	39.89	51.51	21.26
信息系统运营和维护服务	5092	13.99	50.51	25.16	35.10	12.54
基础信息技术运营和维护服务	1161	-4.76	22.59	82.90	14.81	42.75
其他运营和维护服务	447	44.19	2.18	97.01	1.60	74.75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4. 软件产品以应用软件为主，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呈波动发展。2017 年应用软件执行金额 8.91 亿美元，占软件产品出口总额的 78.5%，同比下降 15.11%，降幅较上年（-23.09%）大幅收窄；系统软件执行金额 2.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93.39%，较上年（-63.72%）呈现大幅回升；支撑软件执行金额 0.07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27，较上年（99.93%）出现大幅下滑。

表 3 2016—2017 年软件产品的出口规模与增速 单位：亿美元

	2016 年		2017 年	
合同类别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342.30	2.51	375.56	9.72
软件产品	11.82	-30.78	11.35	-3.98
系统软件	1.23	-63.72	2.38	93.39
应用软件	10.49	-23.09	8.91	-15.11
支撑软件	0.103	99.93	0.07	-32.27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三）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主体地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有所下滑

从软件出口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且保持微弱增长。2017 年东部地区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占比为 87.94%，较上年增长 0.54 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占比分别为 2.86%、5.56%、3.65%，比上年分别下降 0.29、0.14、0.08 个百分点。

在东部地区，2017 年江苏、浙江、广东列软件出口规模前 3 位，执行金额分别为 122.61、51.34、51.28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52%、2.96%、44.37%。其中，广东省增

长较快，2014—2015 年执行金额列东部地区第 5 位，2016 年超过北京市列第 4 位，2017 年再次超过上海市列第 3 位。此外，山东省增幅最高达 4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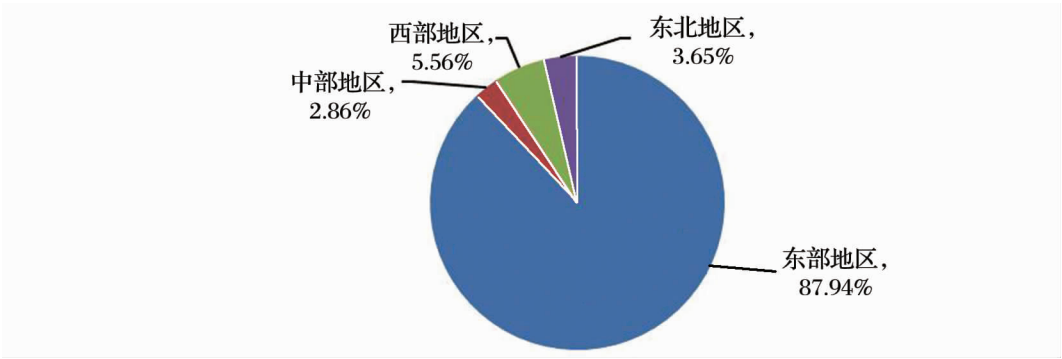


图 3 2017 年各区域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占比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表 4 2017 年东部地区软件出口规模及增速 单位：亿美元

省（市）	合同数	同比增长（%）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总计	59943	13.55	571.82	23.00	375.56	9.72
江苏省	18074	12.61	138.86	0.59	122.61	2.52
浙江省	16560	28.03	57.14	6.48	51.34	2.96
广东省	2316	-9.60	75.50	64.04	51.28	44.37
上海市	4065	-1.43	45.52	-0.61	36.91	0.16
北京市	3160	10.45	51.74	-39.06	33.41	3.23
山东省	2365	11.45	29.81	49.44	28.02	47.13
天津市	461	-12.36	3.46	-9.32	3.23	14.97
福建省	2442	27.85	4.61	52.39	3.17	19.39
河北省	423	109.41	110.59	13742.77	0.24	-20.28
海南省	36	20.00	0.08	-54.29	0.05	-72.15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在中部地区，2017 年湖南、江西、湖北列软件出口规模前 3 位，执行金额分别为 3.56、3.02、2.74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5.59%、-24.87%、7.71%。除江西呈负增长外，湖南、湖北均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湖南“十二五”以来首次跃居第一。此外，河南增速最高达 218.34%。

表 5 2017 年中部地区部分省份软件出口规模及增速 单位：亿美元

省（市）	合同数	同比增长（%）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总计	59943	13.55	571.82	23.00	375.56	9.72
湖南省	357	-32.13	4.27	15.44	3.56	15.59
江西省	499	-19.26	3.44	-20.69	3.02	-24.87
湖北省	1008	28.90	5.06	38.61	2.74	7.71
安徽省	152	44.76	1.54	-21.37	1.31	15.54
河南省	362	704.44	0.14	-4.26	0.11	218.34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在西部地区，2017 年四川、重庆、陕西列软件出口规模前 3 位，三个地区执行金额分别为 13.05、4.03、3.64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43%、0.16%、28.45%。此外，广西、新疆、贵州均呈现大幅增长，增速分别为 1090.92%、249.99%、217.0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具有较大增长潜力。

表 6 2017 年西部地区部分省、市、自治区软件出口规模及增速 单位：亿美元

省（市）	合同数	同比增长（%）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总计	59943	13.55	571.82	23.00	375.56	9.72
四川省	751	-10.27	17.07	-12.84	13.05	3.43
重庆市	615	-13.14	4.22	-3.85	4.03	0.16
陕西省	1387	20.09	4.23	31.47	3.64	28.45
广西壮族自治区	16	14.29	0.07	90.91	0.075	1090.92
贵州省	4	-20.00	0.41	343.51	0.04	217.02
云南省	10	42.86	0.03	-12.15	0.02	-27.05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在东北地区，辽宁软件出口规模继续保持领先优势，黑龙江则增速最高。2017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12.58、0.62、0.48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7.18%、-7.34%、29.08%。

表 7 2017 年东北地区软件出口规模及增速

单位：亿美元

省（市）	合同数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59943	13.55	571.82	23.00	375.56	9.72
辽宁省	4493	2.72	12.65	-51.68	12.58	7.18
吉林省	151	-8.48	0.69	-10.51	0.62	-7.34
黑龙江省	226	93.16	0.68	16.65	0.48	29.08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四）美欧日市场占主体，“一带一路”沿线出口快速增长

2017 年中国软件出口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居前 10 位的依次为：美国、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德国、英国、芬兰、印度，执行金额占总额的比重达 72.38%，较上年的前 10 位国家和地区的占比 76.05%下降了 3.67 个百分点。对印度出口执行金额增速最高达 53.81%，首次进入前 10 位；其次为对英国、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美国出口，分别同比增长 36%、23.84%、14.25%、11.07%、6.25%。此外，对芬兰、中国香港、德国、韩国出口分别同比下降 2.09%、4.78%、15.19%、19.75%。

表 8 2017 年中国软件出口目的地前 10 位国家（地区）

单位：亿美元

省（市）	合同数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全球	59943	13.55	571.82	23.00	375.56	9.72
美国	7785	10.28	101.30	-31.01	88.42	6.25
中国香港	7013	4.19	55.11	-0.77	44.30	-4.78
日本	14987	9.37	43.81	0.11	40.97	14.25
中国台湾	2948	14.71	25.47	12.58	22.46	23.84
新加坡	1656	11.67	25.88	-16.58	21.93	11.07
韩国	2069	10.52	28.77	-7.32	19.52	-19.75
德国	1790	10.70	17.47	12.79	12.05	-15.19
英国	1449	8.30	10.09	6.89	10.07	36.00
芬兰	136	18.26	10.29	-11.43	6.12	-2.09
印度	1622	1.50	10.66	137.45	6.01	53.81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2017 年中国对美国、欧盟（28 国）、日本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合计为 189 亿美元，占总量的 50.32%，较上年增加 0.32 个百分点；中国对上述三大经济体软件出口依次分别为 88.42、59.60、40.97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6.25%、16.17%、14.25%，均呈现出不同上升态势，其中日本在连续两年下滑后出现回升，欧盟则在 2015 年大幅下滑后连续两年稳步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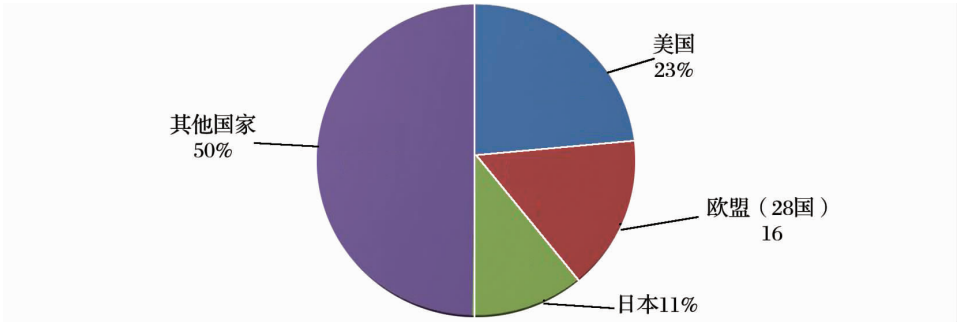


图 4 2017 年我国软件出口市场美欧日占比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伐加快，中国软件出口已经遍及除波黑以外的沿线 70 个国家（地区），2017 年出口执行金额为 87.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9.34%，占总量比重为 23.28%，比 2016 年增加 9.04 个百分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软件出口前 10 位分别为新加坡、韩国、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南非、泰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表 9）。

表 9 2017 年中国软件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情况

单位：亿美元

省（市）	合同数	同比增长（%）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总计	14314	—	224.51	—	87.43	—
新加坡	1656	11.67	25.88	− 16.58	21.93	11.07
韩国	2069	10.52	28.77	− 7.32	19.52	− 19.75
印度	1622	1.50	10.66	137.45	6.01	53.81
沙特阿拉伯	253	− 17.86	4.95	214.21	3.95	196.7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38	24.72	3.16	248.23	3.05	360.98
马来西亚	791	29.89	113.43	2907.34	2.96	0.83
南非	288	7.87	3.03	90.65	2.84	139.19
泰国	1245	69.85	2.69	− 8.04	2.56	15.45

续表 9

省（市）	合同数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俄罗斯	666	56.71	2.54	- 27.72	2.43	- 26.31
印度尼西亚	431	25.29	3.55	74.80	2.280	4.29
越南	430	44.78	3.23	102.58	1.95	46.54
巴基斯坦	357	60.09	3.65	224.61	1.91	96.51
土耳其	358	32.59	1.29	63.51	1.26	87.29
菲律宾	355	44.31	1.36	124.66	1.17	126.17
孟加拉国	158	3.27	0.89	- 38.97	1.16	41.99
埃及	94	- 3.09	0.69	2.90	0.95	258.95
科威特	82	- 3.53	0.67	33.63	0.85	73.50
捷克共和国	220	22.22	0.94	- 22.25	0.84	- 25.81
缅甸	138	- 32.35	2.41	302.39	0.82	34.49
伊朗	230	23.66	0.89	- 3.36	0.78	17.78
其他国家	2533	—	9.91	—	8.218	—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注：截至 2017 年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 72 个（包括中国），详见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cat_id=10037。

（五）软件出口主体以内资企业主导，外资企业有所下降

在 2017 年中国软件出口企业中，内资企业执行金额 229.75 亿美元，占总量的 61.18%，较上年增加 13.14 个百分点，出口能力持续提升；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执行金额分别为 112.63、32.13 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 29.99%、8.55%，较上年分别下降 10.58、2.84 个百分点（图 5、表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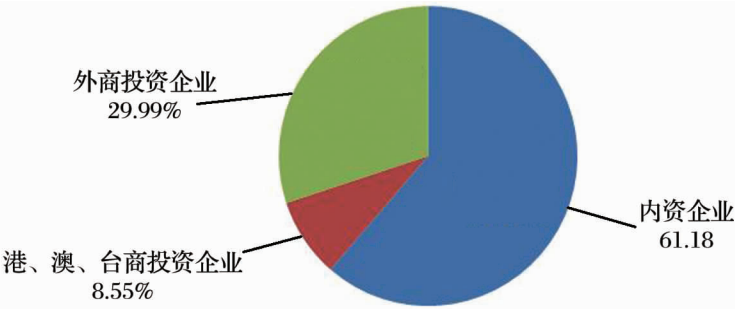


图 5 2017 年我国软件出口企业结构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表 10 2017 年软件出口按企业性质分类情况 单位：亿美元

企业性质	协议金额	占比 (%)	执行金额	占比 (%)
全国	571.82	100.00	375.56	100.00
内资企业	384.55	67.25	229.76	61.18
国有企业	19.83	3.47	17.00	4.53
集体企业	168.64	29.49	149.60	39.83
股份合作企业	0.01	0.00	0.01	0.00
联营企业	0.05	0.01	0.03	0.01
有限责任公司	0.00	0.00	0.00	0.00
股份有限公司	73.74	12.90	52.46	13.97
私营企业	120.79	21.12	9.18	2.44
其他企业	1.50	0.26	1.48	0.39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46.74	8.17	32.13	8.55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3.76	0.66	2.82	0.75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0.00	0.00	0.00	0.00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32.85	5.75	26.09	6.95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83	1.72	3.11	0.83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30	0.05	0.16	0.03
外商投资企业	139.94	24.47	112.63	29.99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25.36	4.43	17.41	4.64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0.34	0.06	0.27	0.07
外资企业	103.63	18.12	84.81	22.58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36	1.64	9.12	2.43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1.26	0.22	1.02	0.27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六）基地城市集聚引领作用显著，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软件出口基地城市在全国软件出口中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2017 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大连、西安、天津、广州、成都和济南等 11 个基地城市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共计 238.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6%，占全国软件出口总额的 63.5%。其中，杭州、深圳、南京列前三位，执行额分别为 41.92、41.32、37.60 亿美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11.16%、11.00%、10.01%，集聚引领作用显著；深圳、济南、西安增长速度最快，分别实现 53.42%、44.29%、28.52%的增速（表 11）。

表 11 2017 年全国 11 个软件出口基地城市情况

单位：亿美元

省（市）	合同数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32180	12.08	298.61	− 5.89	238.39	9.56
杭州市	9722	38.75	47.07	5.19	41.99	0.55
深圳市	1126	− 36.35	58.53	66.60	41.32	53.42
南京市	5661	19.05	39.00	− 1.96	37.60	0.20
上海市	4065	− 1.43	45.52	− 0.61	36.91	0.16
北京市	3160	10.45	51.74	− 39.06	33.42	3.23
成都市	750	− 10.29	17.05	− 12.86	13.03	3.41
大连市	4129	1.47	11.68	− 54.36	11.66	4.29
广州市	828	68.98	12.43	29.16	8.62	9.09
济南市	895	− 20.66	7.92	53.11	7.05	44.29
天津市	461	− 12.36	3.46	− 9.32	3.23	14.97
西安市	1383	20.58	4.22	32.15	3.62	28.52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七）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综合效益明显提升

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呈现跨越式增长，由 2011 年首次突破 10 万件到 2016 年突破 40 万件，2017 年突破 70 万件。2016 年全球信息技术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中国占据 4 席，分别是国家电网、中兴、华为、联想。2006—2016 年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以平均年 35% 以上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长，2017 年增幅近 83%。2016 年大数据、VR 两类新技术领域的代表软件登记增速连续两年超过全国软件登记整体增长。2017 年工信部发布的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中，过 100 亿元的企业达 9 家；其中排名第一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其软件业务收入突破 2000 亿元。2016 年软件百家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 1485 亿元，较上届增长 20.5%，超过收入增长 10.3 个百分点；研发强度（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达 11.5%，较上届提高 1.9 个百分点，高于全行业 4.3 个百分点；参与研发的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的 48%，较上届增长 10%。其次，百家企业中有 40% 的企业收入增长率超过 20%。一是在云计算、大数据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企业增长突出，如阿里云、京东尚科、软件业务收入增长均超过 150%，百度云增长达到 90%；二是在新兴领域具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也保持增长，如华讯方舟、大疆分别在移动宽带、无人机等领域占据优势，软件业务收入增速达 73% 和 68%；三是深耕产业链

上下游的企业，如小米移动、云中飞依托自有终端品牌提供移动端解决方案，分别增长 55% 和 69%；四是抓住行业计算平台重构和智慧城市发展机遇的企业，如天源迪科和北明软件分别增长 46% 和 101%。

二、中国软件出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挑战

第一，软件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困境，基础软件、开发工具软件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从国内软件市场看，2016 年中国软件市场规模 2849.7 亿元，其中应用软件占 76.3% 达 2174.0 亿元。从软件进出口结构看，中国软件产品出口份额很小且主要是应用软件，系统软件出口能力薄弱；从软件进口看，在高端软件、芯片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处于劣势，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在软件产品领域，中国面临着国外软件开发商的强力垄断，操作系统软件、数据库软件、集成电路设计工具 EDA 软件基本被国外软件企业垄断，如微软、SAP 和甲骨文等；集成电路设计工具 EDA 软件由 Cadence、Synopsys 和 Mentor 三家企业占据 90% 的市场份额。

第二，企业成本和风险不断上升，行业人才流失有所增长。一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管理成本提高。2016 年软件百家企业管理费用增长 14%，由于数字化对于软件企业的管理能力、技术能力、营销能力、研发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更加复杂化，导致软件企业管理成本有所上升。二是人力成本上涨尤为突出。2016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为 122478 元，较上年增长 9.3%，首次超过金融业列各行业榜首。2017 年中国软件业从业人员近 600 万人，较上年增长 3.4%；从业员工工资总额增长 14.9%，人均工资增长 11.2%。三是软件业“跳槽”的现象明显增多。近年来，大量软件业中高端人才流向互联网及其他新兴产业。

第三，大型软件企业的盈利能力、国际品牌影响力仍存在差距。2016 年中国信息产业有 16 家上市公司进入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加上华为公司（17 家公司）共实现销售额 4317 亿美元、利润 506 亿美元；而美国信息产业进入 2000 强的企业有 74 家，实现销售额 15821 亿美元、利润 2113 亿美元。中国企业的利润仅为美国企业的 24%。全球市值最高的前 10 家公司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占 5 席，分别是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

第四，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场景面临重大变化。软件业是技术创新快速演变的行业。从中国近几年的知识产权案例来看，软件贸易中既有基于软件著作权的许可证或实物拷贝，又有信息技术外包（ITO）、商务流程外包（BPO）和集成电路（IC）设计服务贸易中的服务产品和嵌入式软件的实体产品，还有软件即服务（SaaS）模式为代表的云服务。随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不断以非关税壁垒的形式频繁出现在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场景中，其中尤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ITC）发起的 337 调查为典型。337 调查针对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企业，一般以侵犯知识产权调查为主，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一旦被认定违反该条款，后果可能招致包括对物、对人的全面禁令。2017 年美国对中国企业发起 337 调查 24 起，占发起调查总数的 37.5%；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涉及软件业的企业和领域是调查重点，理由全部是专利侵权。2017 年 2 月美国商会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在专利、著作权、商标、商业秘密、市场准入和批准国际条约六个方面对全球 45 个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进行了打分，中国排名第 27（14.83 分），与美国（32.62 分，排名第 1）、日本（31.29 分，排名第 4）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

第五，数字贸易规则将对中国软件出口带来新的挑战。云计算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SaaS 正在逐步取代传统软件进出口模式，通过流量收取服务费成为主要的收益方式。因此，数字贸易规则与壁垒，将对软件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数字贸易主要依托互联网体现出自由化和开放性，同时具有虚拟化、可复制性、贸易方式复杂、监管难度大等特点。在规则方面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产生冲突，使得现有 WTO 关税规则难以产生效力。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也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数字贸易壁垒。这些壁垒不仅包括针对电子产品的关税和配额，还包括：数字本地化、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侵权、国际合规性评估、网络安全风险等非关税壁垒。目前由于各国对数字贸易规则没有达成共识，全球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及争端解决机制，由此产生的“电子摩擦”（e-friction）使传统的争端解决机制也面临挑战。

三、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为软件产业提供了创新动力和市场空间

全球经济正在加快复苏进程，为软件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宏观环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8、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 3.9% 左右；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达 2.3% 和 2.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达 4.9% 和 5%。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随着各国智慧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成长，将不断释放出对软件市场的强大需求，为扩大全球软件贸易创造出巨大的市场机会。

第一，全球软件信息技术服务市场持续增长。据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研究，目前全球软件支出和软件出口增速均高于 IT 设备和 IT 服务。2016 年全球 IT 总支出 35360 亿美元；其中，数据中心系统支出 75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软件支出和软件服

务支出分别为 3260 亿美元和 94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 和 3.1%。2017 年全球 IT 与软件支出增长 2.9%，其中软件支出 3570 亿美元，增速 7.2%。2005—2016 年全球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总额由 2027 亿美元增长至 4080 亿美元，其中计算机服务增速最快，由 1184 亿美元增长至 3531 亿美元，增长 2 倍。^① 2009—2016 年期间全球服务贸易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平均增长率为 6.35%，超过总服务出口增速，也超过其他细分行业服务出口增长。

第二，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创造巨大的软件应用市场。融合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平台化软件是平台经济的关键支撑，主要体现在软件开发的平台化及基于云计算的平台化软件服务。平台化软件分为技术支撑型平台和应用实现型平台。技术支撑型平台的用户为软件开发人员，这类平台包括软件中间件、开发工具、应用服务器等。应用实现型平台的用户为终端用户，提供商不但负责平台的维护和升级，还要负责实现基于平台的上层应用。据 Gartner 分析，2017—2020 年全球公有云市场规模年均增速在 15% 以上，到 2020 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834 亿美元。据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预测，到 2020 年全球云计算业务支出将达到 1910 亿美元，相当于 2014 年的 2.65 倍。2016 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达 58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0%，增速处于较高水平。2016 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 193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人工智能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增速超过 35%，其增长动力主要源自智能化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快速发展。2016 年全球大数据市场中的软件规模约 139.3 亿美元，全球人工智能市场中软件平台规模约 110 亿美元，两者约提供了软件市场规模的 7% 份额。在《MIT 科技评论》公布的 2017 年全球 10 大突破技术中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占 3 个，分别为强化学习、自动驾驶货车和刷脸支付。2017 年行业巨头纷纷通过开放基础技术平台、计算平台汇集产业资源，力图构建以企业大平台为中心的产业生态体系。

第三，信息安全推动网络安全服务市场迅速壮大。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小到每个人的隐私保护与财产安全，大到企业利益乃至国家战略，无不与网络空间安全紧密相关，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海、空、外太空之后的“第五空间”，获得了各国高度的重视和大量的财力投入，基于网络安全的外包服务快速增长。2017—2018 年全球 IT 安全外包服务支出分别达 167 亿美元和 185 亿美元，增长 11%，到 2019 年全球企业对安全外包服务的支出将占安全软件和硬件产品总支出的 75%。

^①根据 UNCTAD 统计数据，计算机服务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第四，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成为全球软件市场持续扩大的重要动力。当前，互联网正由消费向产业发展，产业互联网时代正在到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结合，将不断优化生产流程和作业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变革升级，既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也为软件市场发展增添动力。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产业互联网加速与制造业、金融、物流、零售与批发、房地产、交通等传统产业融合，推动智能制造、智慧金融、智慧物流、智慧零售、智能建筑、智慧交通的发展，使产业网络化连接、数字化转型、融合化发展成为主要特征。

四、国内数字经济发展为提升 软件出口竞争力奠定了产业基础

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国家战略，为建设世界数字经济强国提供了新动力。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2.9%。据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到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近16万亿美元，数字经济渗透率48%，就业达4.15亿。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位于世界先进水平，2017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5.8%，共有网民7.72亿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光缆总长达3747万公里，比上年增长23.2%，所有地市基本建成光网城市；截至2017年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26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总数13.7亿户。

第二，中国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实力显著增强。2017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5.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9%，增速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2.9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增速高出全行业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53.3%。尤其是面向行业应用、智能制造、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应用软件、工业软件、信息安全服务、平台运营服务快速增长。2017年中国云计算相关的运营服务（包括在线软件运营服务、平台运营服务、基础设施运营服务等在内的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超过8000亿元，较上年增长16.5%；信息安全和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均超过1000亿元，分别增长14%和19.9%。产品智能化带动了嵌入式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升。2016年中国软件业研发投入4545亿元，占软件业务收入比重达7.2%。2017年对重点软件企业的监测显示，全年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接近11%。

第三，数字时代到来使软件产业成为当前和未来的投资热点。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产品是甄别信息、挖掘信息价值的重要工具。软件是大数据产品的基础，主要包

括数据库、数据仓库、大数据分析 & 呈现工具等。2016 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达 167.7 亿元，同比增长 34.3%；互联网、金融、电信三大行业是大数据 IT 产品的主要市场，其中互联网对大数据相关产品的投资达 60.9 亿元，占市场总额的 36.3%；金融业和电信业有着对海量数据资源与数据处理的需求，对大数据的投资规模分别为 32.2、30.4 亿元。2017—2019 年中国大数据市场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达到 32.6%，2019 年将达到 391.3 亿元。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也将带动大数据市场的快速发展。目前以数据挖掘、统计分析、可视化为代表的软件产品成为大数据投资的重点，占比在 36% 左右。随着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大数据交易流通规则、监管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流通审查和风险评估体系等不断完善，都将带动新的相关软件开发。

第四，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推动软件技术加快创新和软硬件一体化。人工智能从产品结构上可分为智能硬件平台和应用软件平台，智能硬件平台主要包括智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智能无人设备等，应用软件平台则主要包括语义分析、机器视觉和语音识别等。软件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灵魂与核心支撑，智能硬件平台离不开人工智能软件的支撑。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推动软件技术的创新应用，带动硬件设备、内容制作、运营服务等全产业链发展。在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中，互联网业的人工智能应用市场占比最高达 20.4%，其次是金融领域 18.5%，安防交通领域为 15.3%。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人工智能类创业公司超过 650 家，产业规模较上年同期增长 51.2%，投融资超过 430 项，主要投资方向有无人驾驶、智能硬件、语音交互等。2017 年百度正式发布了“Apollo”开源计划，并与北京汽车、一汽解放、奇瑞等汽车厂商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将提速智能汽车的产业化发展进程。随着智能家居、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新技术应用逐步走向成熟，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将驱动中国人工智能市场保持稳步增长，预计 2017—2019 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2.8%，2019 年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 439.2 亿元。

第五，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软件业加速转型升级。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政务、电子商务等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市场应用，为制造、商贸、物流、电信、能源、金融、医疗、教育、汽车电子及政府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平台经济作为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模式，由平台服务商、生产和服务企业、消费者共同构成了网络协作体系。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将颠覆传统软件业的生态系统，颠覆现有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模式，改变了软件的分发方式和功能定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数据生成规模庞大、应用场景丰富，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发展方面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将成为软

件产业扩大海外市场的重要支撑。

五、把握数字经济机遇，提高软件出口竞争力

（一）加快数字经济战略布局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制订了清晰的数字经济战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2015年欧盟提出“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要求创建有利于数字网络和服务繁荣发展的市场环境；2016年公布了数字战略行动计划，要求建设有活力的一体化数字市场。2015年2月英国政府出台《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2016年3月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发布《德国数字化战略2025》；日本先后提出《e-Japan战略》《u-Japan战略》和《i-Japan战略》。相比之下，中国数字经济在战略布局、发展环境、产业链、核心技术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应统筹布局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相关发展规划。

（二）加快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构建研技产融合的软件业生态体系

加快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针对系统软件、数据库软件、开发工具软件等核心技术短板，加大基础研究力度，集中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的科研力量解决创新能力不强等“卡脖子”问题，推出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软件和核心工业软件，推动下游企业参与应用软件开发，逐步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中推广应用，不断构建研技产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

一方面，提高软件对于各行业领域的渗透性与融合。以智能制造为抓手，重点支持高端工业软件、新型工业APP等研发和应用，发展工业操作系统及工业大数据管理系统，提高工业软件产品的供给能力，强化软件支撑和定义制造的基础性作用。围绕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市场流通等环节，支持相关应用软件、智能控制系统、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及农业大数据、涉农电子商务等发展；支持发展能源行业关键应用软件及解决方案；发展互联网金融相关软件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支持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智能仓储体系建设及物流装备嵌入式软件等研发应用，提升物流智能化水平；支持面向交通的软件产品和系统研发，支撑智能交通建设。

另一方面，加强软件与大数据、云计算的融合发展。按照数据集中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打通数据孤岛，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协同管理和服务。推动大数据融合应用，促进政府数据和企业数据融合。以构建基础软件平台为核心，逐步形成软件、硬件、应用和服务于一体，安全可靠的软件产业生态。

以高端工业软件及系统为核心，建立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智能制造关键环节的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平台，形成软件驱动的制造业智能化发展体系。以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云操作系统等为核心，面向移动智能终端、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领域构建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面向公众开放的人工智能研发与测试平台。如，促进终端与云端协同的人工智能云服务平台、新型多元智能传感器件与集成平台、大数据智能化服务平台等。

（三）提高软件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水平

第一，提高软件知识产权的识别判断能力。软件产品的知识产权主要是著作权，其次是专利权。其中软件著作权在软件产品贸易中主要以软件许可证的形式体现。嵌入式软件则存在两个知识产权场景，首先是实体产品研发阶段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开发工具和中间件的知识产权合规问题，然后是嵌入式应用开发完成后集成到实体产品中的整体知识产权保护问题。SaaS 模式下云服务软件的知识产权，则应关注部署在云端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云服务软件界面背后的核心算法和数据处理方法。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应简化注册程序，提高注册程序效率和便利度，让更多的软件产品能通过注册获得软件著作权登记。

第二，加快软件企业知识产权的海外布局。中国软件企业在知识产权海外布局方面的步伐仍然落后，对于应对以知识产权为主要手段的非关税壁垒极为不利。国内企业一方面应积极谋求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的海外布局；另一方面要主动了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差异，加强与目标市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协调。同时，要加强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研究，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第三，积极构建标准有效应对软件知识产权壁垒。在软件贸易中，专利及以核心专利为主的技术标准，构成了高精尖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非关税壁垒。要积极构建知识产权行业联盟，形成合力，推进优势领域核心专利构建行业技术标准，并注重行业应用的创新成果专利化，以行业力量将专利标准化，最终进入国际标准，在软件贸易中取得竞争力和优势地位。

（四）力争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全球新一轮贸易规则的重构主要取决于数字贸易规则，占据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地位便掌握了未来服务贸易规则的话语权。目前美国、英国、日本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分别为 59.2%、54.5%、45.9%，均高于中国水平。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在全球软件市场中保持垄断地位，必将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数字贸易规则。通过不断向外输出新的技

术标准和贸易规则进一步扩大软件市场。因此，一方面是数字贸易这一新的贸易方式对传统贸易规则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则是数字贸易规则对软件出口模式带来重大影响。应积极制订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有效应对数字贸易壁垒，建立争端解决机制。

一是利用中国互联网的巨大市场及跨境电商、软件外包等领域的国际领先优势，主动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把握和主导国际话语权，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数字贸易规则。尤其要利用全球自贸区战略，加强在区域合作和双边协定中的贸易谈判，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通过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贸谈判平台开展数字贸易规则的磋商，推进多边、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为创建公平竞争的全球数字贸易环境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加强对数字贸易摩擦的跟踪研究工作，推动建立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领域内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国软件出口利益。三是提高对数据跨境流动、数字化软件产品与服务进出口的监管能力，建立预警监测机制，加强国内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监管、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参考文献：

1. 工信部：《2017年（第16届）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发展报告》，工信部网站，2017年9月8日。
2. 中商产业研究院：《2012—2016年中国软件行业趋势及调研分析报告》，2017年。
3. 崔艳新、王拓：《数字贸易规则的最新发展趋势及我国应对策略》，《全球化》2018年第3期。
4. 林笑跃、董庆伟、高小玉：《软件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全球化》2018年第5期。
5. 沈家文：《数字经济与软件业发展研究》，《全球化》2018年第5期。
6. 沈玉良、李海英、李墨丝、弓永钦：《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全球化》2018年第7期。
7. 隋秀峰、闫晓丽、王闯、王龙康：《大数据、人工智能与软件业发展机遇》，《全球化》2018年第8期。

责任编辑：谷 岳

绿色“一带一路” 顶层设计研究与思考^{*}

张继栋 潘 健 杨荣磊 邢国均

摘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始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引导完善国际环境治理规则，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循环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绿色金融以及绿色贸易体系建设等。中国正在用行动打造一条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共享生态文明成果的“绿色丝绸之路”。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任重道远，必须直面“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生态承载力低、环保基础薄弱、不少企业意识差、部分行业影响大等挑战。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运用战略思维做好顶层设计的“四梁八柱”，既要牵住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国际产能合作的“牛鼻子”，向国际社会及时反馈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更要加强遥感手段对重点行业领域在重要生态脆弱区的环境影响监测，避免出现“一带一路”重大生态风险。

关键词：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 生态环境 顶层设计

作者简介：张继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生态经济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
潘 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生态经济办公室咨询研究员、博士；
杨荣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生态经济办公室兼职研究员；
邢国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执行总监、博士生导师。

^{*} 本文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着力构建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丝绸之路”。这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顺应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国际潮流，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也展现了我们党作为负责任大国执政党的使命担当。

一、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就与挑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问题，也用实际行动印证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

（一）“数”说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效

1. 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截至 2018 年 6 月，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相关的重要政策文件已达 10 余份，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形成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系列成果，以及《关于印发〈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的通知》（商合函〔2013〕74 号）、《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环国际〔2017〕58 号）、《关于印发〈“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的通知》（环国际〔2017〕65 号）、《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等重要文件先后发布，建立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政策体系。

2. 生态治理水平不断提高。近 5 年来，“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显著减少，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率从 50% 提高到 85% 以上，接近发达国家本土治理水平；“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永久占地比例小，生态占用少，损毁的临时用地复垦率接近 100%。“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向沿线国家的环保装备出口年均增长超过 25%，为沿线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3. 环境监管手段不断创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立气象、资源、环境、海洋、高分等地球观测系列卫星及应用系统，已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土地覆盖、植被生长、农情、海洋环境等 31 个生态环境遥感专题数据库，已完成“一带一路”沿线 26 个重要节点城市的生态环境基本特征、土地利用程度、约束性因素，以及 12 个海区、13 个近海海域和 25 个港口城市生态环境的监测。对于“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已经可以做到生态风险预警及环境实时监测。

4. 企业环保行为不断规范。根据 2017 年关于中国 543 家对外投资企业的调查显示，65% 以上企业按照沿线东道国的要求开展了环评工作。其中，67% 的企业委托了第三方机

构完成海外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80%的企业表示不会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影响；超过 70%的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并开始有意识地从产品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出发，控制供应链对环境的影响；24%的企业已经制定了针对负责任采购的相关规范和标准（如采购低碳环保产品），49%的企业正在制定相关制度。

5. 生态环保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已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0 个低碳示范区建设、100 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1000 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 80 多个国家在太阳能、水电、风能、生物质能以及核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展合作，形成了设备制造、联合研发、工程设计与建设、项目投资与经营的全方位国际合作体系，预计到 2020 年，国内外可再生能源领域新增投资将达到 2.5 万亿元人民币，就业人数将超过 1300 万人。

（二）“例”证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绩

1.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重视环境污染防治。中石油在苏丹的投资过程中，坚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与“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决不立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决不开工、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决不投用”的“三不”原则，严格控制“三废”排放，并针对炼化企业的特点，大力搞好厂区绿化，为炼油厂员工和周边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娱乐、休闲环境；华电集团在巴厘岛电厂项目建设过程中，确保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都得到统一妥善处理，减少对海边地形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了“景观工程”“优质工程”和“绿色环保工程”的目标；中钢集团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过程中，通过规划设计，降低勘探活动、矿山开采对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的影响，加强尾矿管理，实施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土地综合利用效率；河南金龙精密铜管公司在墨西哥投资过程中，为减少污水对环境的影响，投资 100 万美元修建污水处理站，实现污水零排放。

2. 优化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当地可持续发展水平。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在印度承建的古德罗尔燃煤电厂，在遭遇排放限值调整升级的突发情况下，依然获得了印度环境保护金奖和社会责任铂金奖；上海神工环保股份公司通过联合中国外经（集团）公司参与建设巴基斯坦卡拉奇市的固体废弃物管理项目，缓解了当地垃圾侵占土地的问题、减少垃圾处置经费并降低能源消耗，弥补资源不足；鞍山嘉鲜公司通过承接美国密西西比河等流域亚洲鲤鱼捕捞和加工项目，形成了“两头在外+两头在内”的双向联合经营模式，帮助解除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危害。

3. 掌握环保核心技术，增强全球环境治理能力。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收购德国欧锐科（EuRec）公司 70% 股权，在垃圾分类与处理、生物废物处理等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申请获得多项专利；天保重装通过收购美国圣骑士公司 80% 股权，取得污水污泥处理处置方面的全套先进技术，使公司产品可以直接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成为国际一流的固废处理系统解决方案及环境治理服务提供商；永清环保通过收购土壤及地下水修复解决方案提供商美国 IST 公司，在应对复杂环境问题带来的隐藏风险，有效预测、重点解决地下储罐场地、煤气厂场地以及工业垃圾填埋场等存在的环境问题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绿色“一带一路”不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造成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是中国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优选方案。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要敢于直面“一带一路”沿线生态承载力低、环保基础薄弱、少数企业意识差、部分行业影响大等挑战。

（三）直面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挑战

生态安全已经成为投资发展的重要考量乃至决定性因素。近年来，中国企业位于缅甸、柬埔寨、纳米比亚、赞比亚、加蓬、印尼、蒙古、墨西哥、秘鲁等国的石化、采矿、森林开发、海洋开发、水利水电等领域投资遭遇挫折。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东道国生态本底差。狭义的“一带一路”地区大部分属于生态脆弱区，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环境准入较低，发展需求紧迫于环境需求，诱使部分企业盲目投资建设，造成不可逆的环境危害，引发了当地民众抗议甚至恶性事件。第二，投资主体意识淡薄。中小企业增多，资金不够充沛，长远发展意识薄弱，环境责任承担不够，容易出现不计生态后果的开发建设。在相关调查中，当问及企业在东道国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时，政治局势、员工安全和当地商品价格仍是企业普遍关注的风险，而环境问题作为东道国利益相关方，尤其是运营地社区居民、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等非常关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第三，部分行业环境影响大。投资流向集中的采矿业、热电、煤气、制造业以及水生产供应业等，属于环保要求高、社会普遍关注的行业领域。尤其资源开发类、水利、电力、化工等项目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三废”等污染物造成的潜在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第四，后天投资劣势明显。中国是国际自然资源开发投资市场上的后来者，大多数环境风险低、易开发的优势投资地区和投资项目已被很多发达国家占据，中国企业获得了很多相对高风险、高难度、低收益甚至环境保护欠账较多的项目。第五，生态环境风险增加。2015—2016 年中国经历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按照项目建设周期和对外投资滞后的特点，以及产能合作重点行业领域对生态环境影响规

律，从设计筹备阶段进入建设运营阶段后，生态环境影响集中显现的时间节点开始临近。

“中国环境威胁论”是“一带一路”建设道路上的阴影。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自然本底和生态环境规制，运用战略思维构建绿色“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强化遥感手段对重点领域和重要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监测，加强重大生态风险预防，将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科学内涵

绿色“一带一路”是推动绿色商品贸易、绿色产能合作、绿色园区建设、绿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构筑绿色金融体系和绿色环保合作平台的实践探索，是保障“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安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绿色“一带一路”立足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通过务实合作和体制机制建设，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实现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健康经济发展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达到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目标。

三、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理念、世界共享”的内在要求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以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原则，提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绿色化水平，将生态环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增进沿线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相互理解及支持，分享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提高生态环境风险防控能力，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服务、支撑和保障。

（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

绿色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顺应和引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国际潮流的必然选择，是借鉴中国绿色发展经验、促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高效使用、循环利用和有效保护，降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能源资源消耗，促进企业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

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三）“中国智慧、区域合作”的关键举措

全球和区域生态环境挑战日益严峻，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共同需求，防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和建设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有利于务实开展合作，推进绿色投资、绿色贸易和绿色金融体系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建立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新秩序，服务于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

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思路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的建设目标，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坚持企业主导、政策推动、分业施策、防控风险的原则，通过区域合作、绿色创新、人才支撑、平台建设、信息公开等办法，推动与沿线国家开展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环保交流互鉴，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保产业合作，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生态本底及环境规制的研究水平，发挥绿色“一带一路”在重大投资项目上的生态风险防控作用、在产能优化布局上的指导作用、在绿色标准国际化上的支撑作用、在区域生态环保合作上的示范作用，以及对“走出去”项目事中事后的监管作用。努力将“绿色合作”贯穿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中，开创美丽、绿色、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建设新局面，为沿线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五、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与重点领域

（一）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

1.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企业在交通设施建设和经贸产业园区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引导企业自觉遵守当地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推进基础设施的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加强政府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发挥第三方机构在境外投资项目上的比较优势，对工程建设中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等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加强和完善绿色化基础设施工程的政府间交流，发挥生态环保服务在跨境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于落地实施过程中的保障作用。建立一批重大交通建设、产业园区开发、重点产能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生态环保标准，引导建设一批基础设施绿色化合作

典范。

2. 绿色国际产能合作。中国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是先进产业和能力的输出，是顺应世界产业转移基本规律、适应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规律的共赢合作。面对“一带一路”沿线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必须重视国际产能合作中的绿色化程度，着力开展一些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示范性能合作项目；注重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材料和能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废弃物排放量，加强废弃物处理；打造从产品设计、生产开发到产品包装、产品分销的整个产业链条绿色化。国际产能合作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要树立一批钢铁、能源、建材、轻工等重点领域的优质产能绿色品牌。

3. 生态环保产业合作。引导各国发展模式从低成本要素投入、高生态环境代价的粗放模式向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双轮驱动模式转变，能源资源利用从低效率、高排放向高效、绿色、安全转型，节能环保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循环经济进一步推进，产业集群绿色升级进程进一步加快，绿色、智慧技术加速扩散和应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绿色制造业和绿色服务业兴起。逐步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创新绿色金融在产能合作不同领域的应用，引导资金呈现向环境友好型产业流动趋势；建成一批环保产业合作示范基地、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基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和科技园区等国际产能合作平台等。

4. 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臭氧层破坏、化学污染、总悬浮微粒超标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日益严重，全球生态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统筹并发挥现有双边、多边环保国际合作机制，构建环保合作网络，建设多元合作平台，强化中国—东盟等相关合作机制的作用，扩大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在多边层面，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为平台，形成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国际共识；在双边层面，继续强化中国与重要沿线国家机制性环保合作，与沿线国家绿色发展及生态环保战略与规划对接，如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哈萨克斯坦“绿色桥梁”倡议对接；在区域层面，重点开展中国—东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澜沧江—湄公河等机制下的环保合作，带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

1. 加强资源开发领域生态环保合作。针对矿产开发、林业开发等，围绕资源开发绿色发展技术创新，与世界发达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 and 市场，提高资源的流动性和整体安全性。共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监测体系，加强资源开发生态

灾害联防联控联治能力。推动设立专门的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基金，重点支持沿线国家资源开发生态环保基础工程，合力强化资源开发事中事后生态保护和修复，协调营造一批集保护保存、休闲康养、旅游观光、文化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矿山公园、国家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形成绿色生态长廊。

2. 强化能源电力行业绿色技术合作。将自身产业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新能源体系的需求相结合，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绿色能源。树立能源电力领域优质产能绿色品牌，探索开展能源电力绿色环保标志互认，同时与国际能源标准和机制对接，通过能源合作推广“中国标准”，提高能源生产、转化和利用效率，推动能源经济的绿色高效清洁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强与欧洲发达国家在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建立联合开发与资助机制，在新一代核电技术、新型储能技术、智能电网、高效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方面共同研究。

3. 推动建材行业绿色产业链条发展。针对中国建材行业与世界各国多种形式贸易往来，持续开展产品出口、对外工程总承包、技术服务、劳务合作等主要业务，倡导国内建材行业企业制定“走出去”绿色发展战略，鼓励建材龙头企业率先开展绿色建材国际产能合作。在“一带一路”大通道沿线的中心城市建设绿色建材园区，以园区为平台，以水泥、平板玻璃等原材料产业为核心，引进国内混凝土制品、土工材料、建筑卫生陶瓷、新型建材等优势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建材工艺技术研发，减少传统建材行业对环境造成的有害气体污染、粉尘污染和水污染，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重点项目建设提供绿色支撑。

4. 实现轻工纺织行业绿色低碳发展。针对中国纺织业加快形成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在范围、层次、结构、布局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绿色理念融入，通过“走出去”进行产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先进研发能力和技术、终端渠道等领域的投资与并购，逐步形成绿色、环保和科技新优势。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扩大国际高端市场份额，加快推进轻工纺织产业国际产能合作，建成一批海外优质原料供应基地和生产加工基地、技术创新和设计中心，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产业链的跨国整合和价值链的全球突破，促进轻工纺织行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5. 深化核与辐射领域安全利用合作。分享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良好实践，积极参与国际核安全体系建设。开展核电站建设与运行安全、辐射环境安全、核设备质量与可靠性以及核与辐射应急响应等国际合作，利用国际公约履约平台构建跨部门高层定期对话机制，深入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经合组织核能署等国际组织的各类活动。进一步改进

和完善国际合作项目管理，加强核与辐射安全国际合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建立与国内核能企业之间的日常及定期交流的机制，推动建立核与辐射安全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切实协助“一带一路”国家提升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

六、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建议

（一）充分利用多、双边交流机制

利用中国—东盟（10+1）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现有政府间多、双边机制，为绿色“一带一路”提供良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

（二）继续发挥行业协会等“中间人”作用

利用重点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与企业间合作机制，发挥行业协会在生态环保咨询、行业自律、企业协作等方面的作用；利用“一省一国”机制和企业牵头机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发挥地方政府和重点企业在生态环保方面组织对话、政策对接、科技引领等作用；发挥海外企业本土化优势和牵头作用，作为政府间生态环保对话与合作机制的有益补充。

（三）强化生态预警与服务

利用遥感监测手段和外交服务机制，强化对企业生态预警、指导、协调和服务，及时有效地为企业提供风险信息 and 政策建议等；成立绿色“一带一路”专家咨询委员会，围绕对外投资主体责任和项目影响结果，组织编制符合国际规范要求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操作指南。

（四）推进相关信息共享和交流

推进绿色“一带一路”生态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建立绿色“一带一路”信息共享共享机制，实现生态本底与环保规制有机结合，提升识别、预防和控制生态风险的能力。

（下转第 106 页）

非洲包容与可持续工业发展 测度及援助方式选择

王 圳 岳鸿飞 周 静

摘要：本文结合包容与可持续发展（ISID）的内涵，构建了包含“社会发展”“工业增长”“资源环境”和“平等包容”四大维度的非洲 ISID 测度指标，实证检验不同援助方式对非洲 ISID 的作用影响。结果表明，2000—2014 年非洲 ISID 虽有进步，但水平普遍偏低且进步缓慢，非洲中高收入国家呈现进步趋势，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基本不变甚至发生倒退。技术援助与外商援建投资对非洲 ISID 有显著促进作用；赠款援助无法解决储蓄率和外汇不足的资金缺口问题，援助效果较差；有偿贷款的援助方式需要更加谨慎，其仅对市场经济环境相对成熟的非洲中高收入国家起积极作用，对大多数非洲国家影响作用不大甚至会使其陷入被动。非洲中高收入国家已经开始注重工业增长与资源环境、社会公平之间的协调关系，非洲中低收入国家正面临不可持续发展和“污染天堂”的挑战。

关键词：包容 可持续 工业发展 援助方式 市场环境 资本存量

作者简介：王 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处长、博士；

岳鸿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别顾问；

周 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提出

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时代已近半个世纪之久，但非洲整体的工业化进程仍处在较初级阶段。2014 年非洲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 10.1%，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 1.6%，且仍以附加值较低的资源型产品为主。严重滞后和脱节的工业化进程使得

非洲工业很难融入国际市场，更难实现自发地转型与腾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非洲工业不仅是非洲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挑战。

2013 年 12 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利马宣言》中正式提出，建立“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发展（ISID）”，并将其作为非洲未来工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发展包含着三大内涵：其一，非洲国家有权利依靠工业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中获益；其二，非洲国家女性和男性、成人与儿童均有获得工作、教育和享受繁荣的权利；其三，非洲的工业应通过绿色发展实现工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ISID 战略为非洲工业化树立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如何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从实际情况看，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经济生产要素，需要在国际援助的催化下加以充分利用和激活。然而，当前国际社会援助非洲工业发展的方式各有不同，如何根据非洲国家不同的工业化基础选择更为科学有效的援助方式，是进一步落实 ISID 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文献述评

就非洲工业的发展历程看，“进口替代、出口加工、国际援助与合作”发展战略以及由此对应的“进口替代阶段、结构调整规划阶段和减贫战略阶段”是学者们对非洲工业发展历程的重要共识。陈宗德（2003）按照约翰·科迪的标准，以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依据，计算本世纪初期非洲国家的工业化情况，发现非洲只有南非和埃及可以列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其余国家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或尚未开始。朱华友（2016）等运用钱纳里标准划分法，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就业结构等方面对非洲工业化水平进行评价，发现非洲工业化整体水平偏低，50%以上的国家仍处在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等国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就非洲工业化的发展方式而言，林毅夫认为非洲工业化发展应因势利导，充分挖掘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引进相应的技术和模式。多萝西·麦考密克（1999）提出非洲工业化进程中应实行产业集群模式以发挥集体效益，从而避免小企业生产水平低、产品市场小等弊端。陈宗德认为落后的金融业也是制约非洲工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关于援助对非洲工业作用的影响，当前学界仍争议较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援助对非洲工业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格·罗辛（1980）认为在非洲工业初期外国资本的流入将有助于技术专业，弥补工业化所需资金不足等；陈默（2014）认为大量修建基础设施援助对当地经济起到直接促进作用。但也有学者对国际援助的作用发起质疑。达姆比萨·

莫约（2009）认为从撒哈拉以南接受援助的非洲国家看，在过去的 40 年他们的工业不仅未能实现增长，甚至还出现倒退。张永蓬（2012）基于国际援助理论演变趋势，认为单凭国际援助难以解决非洲发展的问题，未来援助的重点应是帮助非洲实现经济多样化。有的学者指出，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发展援助”与“发展合作”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传统援助资金的“输血”模式应向发展合作的“造血”模式转型。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对非洲工业化发展进程的评价，多从工业本身的经济含义出发，缺少对工业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系统判断。对于援助效果，学界已开始认识到根据非洲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援助方式对提高援助效果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拓展当前的研究，第一，从包含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维度的 ISID 基本内涵出发，构建基于“社会发展”“工业增长”“资源环境”和“平等包容”的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指数（ISID Index），并测算非洲 20 个国家从 2000—2014 年的工业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水平。第二，以援助内容与方式的不同按技术援助、资金援助和项目援助细化国家发展援助方式并分析其特点。第三，按照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的非洲国家经济水平对不同援助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找到最优路径并给出政策建议。

三、包容与可持续工业发展指数构建与测评分析

1. 包容与可持续工业发展指数的构建

根据 ISID 的概念内涵，根据现有公开数据，按照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的要求选择了 20 个非洲国家 2000—2014 年的 13 项工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类的指标。指标包含正向指标 10 个，逆向指标 3 个。其中，“人均工业增加值”用价格指数平减，以 2000 年为基期做可比价处理；“工业增加值单位能耗”以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库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能耗乘以当地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做近似代理。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补，对于“单位国土面积铁路公里数”考虑铁路建设的周期和时长的特征在 5 年内进行均值插补。为保证所构建指标的可加性，本文对逆向指标做倒数处理，进行指标性质的反向转化。

在基础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构建 ISID Index。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可以实现两个效果：第一，在降低数据维度个数的同时又尽量保证原来的信息不缺失；第二，实现维度间所彼此指标的严格不相关，结果见表 2。

在主成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 Varimax 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更加突出主成分的特征和属性类别。所得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如下：从载荷旋转矩阵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 Y_1 中“通电率”“城市改善的卫生设施”“每 100 人所拥有的电话线路”“高等院校入学

表 1 非洲 ISID Index 选取与数据来源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来源	性质
非洲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指标	人均 GDP 工业增加值	百万美元	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OECD 等	正
	单位国土面积铁路公里数	公里/万平方公里	世界银行	正
	通电率（占人口比）	%	国际能源署	正
	每 100 人所拥有的电话线路数量	个	国际电信联盟报告和数据库	正
	航空运输量	次/天	《世界民用航空统计》	正
	城市改善的卫生设施比例	%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监测项目	正
	单位工业增加值单位能耗	美元/千克石油当量	国际能源机构	逆
	二氧化碳排放量	公吨数	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环境科学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	逆
	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	立方米/人	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与水信息系统（AQUASTAT）	正
	高等院校入学率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正
	单位 GDP 教育公开开支占 GDP 比重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正
	女性劳动参与率	%	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数据库	正
	基尼系数	%	世界银行集团发展研究局	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共数据整理而得。

表 2 主成分选取、方差贡献率及方差累计贡献率

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方差累计贡献率（%）	旋转后特征根	旋转后方差贡献率（%）	旋转后方差累计贡献率（%）
1	4.720	33.712	33.712	3.620	25.860	25.860
2	2.478	17.703	51.415	2.763	19.734	45.594
3	1.546	11.042	62.457	1.914	13.669	59.263
4	1.052	7.513	69.970	1.499	10.708	69.970

率”“固定宽带”这五个指标的正向载荷较大。五项指标的突出特征可直接或间接反映出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表象。从第二主成分 Y_2 可以发现，反映工业增长和贸易水平的指标“工业增加值”“航空运输量”的载荷分别达 0.946、

表 3 Varimax 因子载荷旋转矩阵

主成分 指标	Y ₁	Y ₂	Y ₃	Y ₄
单位工业增加值	0.158	0.946	-0.019	0.019
通电率	0.650	0.086	0.064	0.060
航空运输量	0.171	0.944	-0.029	0.025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0.521	0.137	0.540	0.008
城市改善的卫生设施	0.775	0.200	-0.272	-0.037
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	-0.185	0.105	0.462	0.599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0.398	-0.047	0.683	-0.147
基尼系数	0.062	-0.077	-0.253	0.797
女性劳动参与率	-0.640	0.198	0.212	0.554
固定宽带	0.523	0.692	-0.001	-0.063
单位 GDP 教育公共开支	0.180	-0.353	-0.504	0.390
每 100 人所拥有的电话线路	0.800	0.394	-0.017	-0.015
单位国土面积铁路公里数	-0.173	0.162	-0.684	-0.075
高等院校入学率	0.830	0.264	-0.181	-0.093

0.944，而其余指标相对贡献较小。第三主成分 Y₃ 中“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3 项与资源环境相关的指标正向载荷最大，而与工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指标多为负向载荷，因此该项指标表现出了明显的绿色与生态环境属性。第四项主成分中，基尼系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单位 GDP 教育公共开支的载荷值较大，其余指标多载荷较小或为负值。由此，所构建的主成分特征属性鲜明，可依次定义为“社会发展”“工业增长”“资源环境”“平等包容”四项新指标。表达式如下：

$$Y_1 = 0.158X_1 + 0.650X_2 + \cdots + 0.830X_{13} \tag{1}$$

$$Y_2 = 0.946X_1 + 0.086X_2 + \cdots + 0.264X_{13} \tag{2}$$

$$Y_3 = -0.019X_1 + 0.064X_2 + \cdots (-0.181)X_{13} \tag{3}$$

$$Y_4 = 0.019X_1 + 0.060X_2 + \cdots + (-0.093)X_{13} \tag{4}$$

在主成分选取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变动和离散程度计算数据所包含的“效用价值”，采用熵值法对上述四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经计算“社会发展”“工业增长”“资源环境”“平等包容”四项主成分指标权重分别为 0.241、0.191、0.281、0.287。此权重相

对平均，同时也重点突出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与合作的平等包容增长。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指数表达式如下：

$$\text{ISID Index} = 0.241 Y_1 + 0.191 Y_2 + 0.281 Y_3 + 0.287 Y_4$$

(5)

表 4 非洲国家 2000—2014 年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指标综合得分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低收入国家	− 0.380	− 0.380	− 0.386	− 0.391	− 0.399	− 0.409	− 0.420	− 0.424
塞内加尔	− 1.240	− 1.232	− 1.230	− 1.233	− 1.227	− 1.258	− 1.246	− 1.232
尼日尔	− 0.682	− 0.669	− 0.676	− 0.685	− 0.691	− 0.674	− 0.732	− 0.780
贝宁	− 0.607	− 0.602	− 0.596	− 0.594	− 0.554	− 0.556	− 0.553	− 0.523
坦桑尼亚	− 0.383	− 0.371	− 0.382	− 0.385	− 0.391	− 0.404	− 0.407	− 0.417
多哥	− 0.449	− 0.440	− 0.435	− 0.435	− 0.433	− 0.432	− 0.427	− 0.394
埃塞俄比亚	− 0.303	− 0.329	− 0.321	− 0.308	− 0.328	− 0.305	− 0.322	− 0.327
莫桑比克	0.118	0.091	0.076	0.054	0.043	0.031	0.014	0.000
刚果（金）	0.505	0.513	0.479	0.459	0.392	0.325	0.310	0.285
中低收入国家	− 0.156	− 0.158	− 0.151	− 0.138	− 0.119	− 0.118	− 0.120	− 0.107
苏丹	− 0.828	− 0.821	− 0.811	− 0.820	− 0.816	− 0.829	− 0.826	− 0.821
肯尼亚	− 0.333	− 0.336	− 0.336	− 0.335	− 0.344	− 0.327	− 0.328	− 0.338
突尼斯	− 0.446	− 0.424	− 0.364	− 0.331	− 0.306	− 0.308	− 0.353	− 0.311
加纳	− 0.228	− 0.235	− 0.242	− 0.254	− 0.259	− 0.265	− 0.277	− 0.265
摩洛哥	− 0.298	− 0.324	− 0.329	− 0.311	− 0.289	− 0.263	− 0.250	− 0.218
科特迪瓦	− 0.077	− 0.078	− 0.071	− 0.060	− 0.048	− 0.048	− 0.046	− 0.048
赞比亚	0.156	0.148	0.141	0.240	0.340	0.333	0.332	0.322
喀麦隆	0.236	0.228	0.234	0.227	0.224	0.231	0.234	0.267
刚果（布）	0.414	0.417	0.416	0.403	0.425	0.416	0.432	0.446
中高等收入国家	0.199	0.252	0.249	0.263	0.266	0.285	0.333	0.401
南非	− 0.028	0.033	0.023	0.064	0.053	0.065	0.135	0.138
博茨瓦纳	0.369	0.384	0.384	0.339	0.343	0.344	0.345	0.387
毛里求斯	0.255	0.339	0.339	0.385	0.401	0.446	0.520	0.678
平均值	− 0.192	− 0.185	− 0.185	− 0.179	− 0.173	− 0.174	− 0.172	− 0.158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平均值
低收入国家	− 0.422	− 0.427	− 0.433	− 0.441	− 0.440	− 0.452	− 0.455	− 0.417

续表 4

塞内加尔	- 1. 227	- 1. 217	- 1. 206	- 1. 208	- 1. 214	- 1. 222	- 1. 232	- 1. 228
尼日尔	- 0. 792	- 0. 842	- 0. 901	- 0. 965	- 0. 965	- 0. 961	- 0. 948	- 0. 798
贝宁	- 0. 485	- 0. 474	- 0. 465	- 0. 447	- 0. 435	- 0. 424	- 0. 421	- 0. 516
坦桑尼亚	- 0. 422	- 0. 427	- 0. 436	- 0. 440	- 0. 440	- 0. 450	- 0. 455	- 0. 414
多哥	- 0. 378	- 0. 355	- 0. 341	- 0. 327	- 0. 329	- 0. 353	- 0. 360	- 0. 393
埃塞俄比亚	- 0. 329	- 0. 335	- 0. 342	- 0. 343	- 0. 356	- 0. 373	- 0. 375	- 0. 333
莫桑比克	- 0. 005	- 0. 016	- 0. 022	- 0. 037	- 0. 040	- 0. 062	- 0. 060	0. 012
刚果（金）	0. 264	0. 250	0. 247	0. 237	0. 256	0. 225	0. 213	0. 331
中低收入国家	- 0. 101	- 0. 096	- 0. 085	- 0. 075	- 0. 078	- 0. 077	- 0. 098	- 0. 112
苏丹	- 0. 836	- 0. 844	- 0. 837	- 0. 825	- 0. 824	- 0. 814	- 0. 818	- 0. 825
肯尼亚	- 0. 348	- 0. 336	- 0. 332	- 0. 338	- 0. 342	- 0. 345	- 0. 346	- 0. 338
突尼斯	- 0. 279	- 0. 265	- 0. 241	- 0. 217	- 0. 246	- 0. 273	- 0. 510	- 0. 325
加纳	- 0. 255	- 0. 251	- 0. 244	- 0. 232	- 0. 235	- 0. 224	- 0. 219	- 0. 246
摩洛哥	- 0. 186	- 0. 154	- 0. 119	- 0. 095	- 0. 080	- 0. 063	- 0. 058	- 0. 202
科特迪瓦	- 0. 051	- 0. 059	- 0. 061	- 0. 063	- 0. 054	- 0. 037	- 0. 036	- 0. 056
赞比亚	0. 311	0. 308	0. 306	0. 304	0. 293	0. 289	0. 284	0. 274
喀麦隆	0. 281	0. 298	0. 314	0. 331	0. 333	0. 332	0. 378	0. 277
刚果（布）	0. 458	0. 439	0. 447	0. 457	0. 454	0. 444	0. 439	0. 434
中高等收入国家	0. 410	0. 436	0. 443	0. 458	0. 485	0. 531	0. 557	0. 371
南非	0. 111	0. 117	0. 115	0. 109	0. 117	0. 117	0. 115	0. 086
博茨瓦纳	0. 396	0. 381	0. 394	0. 400	0. 426	0. 488	0. 519	0. 393
毛里求斯	0. 723	0. 811	0. 821	0. 864	0. 911	0. 989	1. 038	0. 635
平均值	- 0. 152	- 0. 149	- 0. 145	- 0. 142	- 0. 139	- 0. 136	- 0. 143	- 0. 162

2. 测评结果与分析

按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为标准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本文所测算的 20 个非洲国家中包括 8 个低收入国家、9 个中低收入国家、3 个中高等收入国家。以此为组别对非洲 20 个国家从 2000—2014 年的 ISID 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分析（结果及趋势见表 4 和图 1）。

从整体情况看，非洲国家 ISID 的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从 2000—2014 年非洲总体 ISID 有所进步，但进步速度十分缓慢。本文以 20 个国家 2000—2014 年面板数据的各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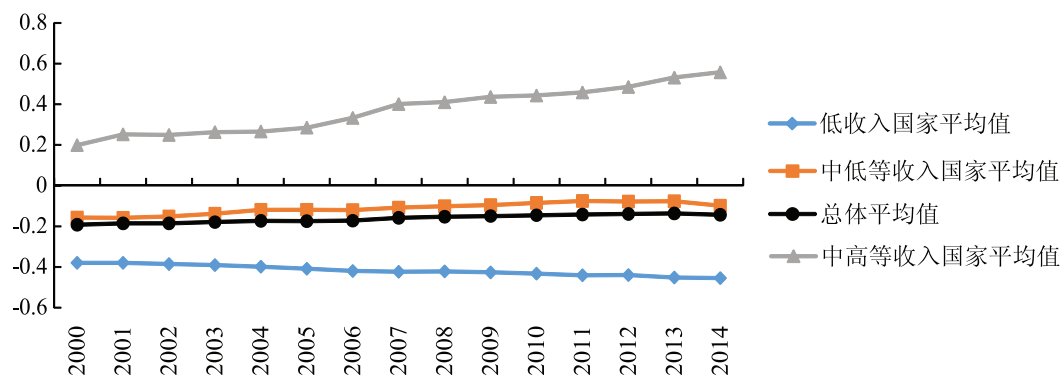


图 1 低收入、中低等收入、中高等收入非洲国家 2000—2014 年 ISID 指数平均值

指标综合水平为基准，ISID 指数的正负反应了样本高于或低于综合基准的情况。从数据结果看，非洲国家 ISID 总体 15 年平均值为 -0.162，即非洲国家 ISID 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从变化趋势看总体 ISID 均值变化十分平缓，2000 年 20 个国家总平均值为 -0.192，2014 年为 -0.143，反应出非洲 ISID 有所改善，但进步速度缓慢。

从组间的横向比较看，非洲国家 ISID 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与国家的经济水平或人均国民收入保持一致。中高等收入国家的 ISID 指数的平均值最高，达到 0.371；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 -0.112，接近总体平均水平；低收入国家 ISID 指数的平均值最低，为 -0.417。中高等收入国家的 ISID 水平远高于低收入、中低等收入国家。此外，在低收入国家中，ISID 指数均值最低的塞内加尔，均值为 -1.228，最高的刚果（金）为 0.331；而中高等收入国家 ISID 指数最高的毛里求斯，均值达到 0.635。计算结果充分反映了非洲国家之间 ISID 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从组间的纵向比较看，非洲低收入、中低等收入、中高等收入国家间 ISID 的变化情况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中高等收入国家 ISID 指数进步速度更加明显，ISID 均值由 2000 年的 0.199 增加到 2014 年的 0.557。中低等收入国家 ISID 水平从 2000 年的 -0.156 增加到 2014 年的 -0.098，增长趋势平缓，速度缓慢。而低收入国家 ISID 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ISID 指数从 2000 年的 -0.380，下降到 2014 年的 -0.455。刚果（金）、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尼日尔、肯尼亚、突尼斯等 7 个国家出现了 ISID 水平的倒退。

除此以外，计算的结果中另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值得关注。首先，南非、突尼斯、摩洛哥作为公认的非洲工业强国，并未在 ISID 指数中表现明显的领先优势。而以轻工业为主且金融行业发达的毛里求斯，和以钻石经济为特征，污染相对较小的博茨瓦纳在 2000—2014 年间表现出了较高的 ISID 水平。第二，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刚果（金）作为低收入国家群组中工业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其 ISID 指数的退步幅度在所测得的样

本中最大。这也从侧面证明出当前非洲部分国家的工业发展很有可能，或已经走上传统黑色的开发发展道路，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忽视其与环境生态和社会的兼顾发展。

四、国际发展援助方式对非洲 ISID 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国际发展援助方式的界定及数据选择

基于国际援助实践，本文在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将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方式按技术援助、资金援助和项目援助三类进行划分，并在资金援助中细分赠款援助和以市场方式运行的有偿贷款援助。

1. 技术援助（TA）。技术援助指援助方无偿地或按优惠条件提供的技术、管理知识和人才援助，内容包括智力、技能、工艺等方面的培训或技术成果转让移植到受援国。本文以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中的非洲国家技术合作捐助为代理变量。

2. 赠款（GRA）。赠款是指以发展援助为目的，义务提供的特定金额。赠款不与贷款搭配使用，也多不包括技术合作的范畴。赠款主体可分两类，一类为国际金融组织的多边赠款，第二类为国家间的双边赠款。本文以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中的赠款（不包括技术合作）为代理变量。

3. 有偿贷款（LCS）。有偿贷款同技术援助、无偿赠款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自身的有偿性。国际金融组织或双边国家间向受援国提供贷款援助，通常具有固定的还款期限和市场贷款利率，重点以援建具有盈利性的重大项目为主要内容。因此有偿贷款是以市场为依托的一种援助方式，本文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IDA）信贷之和作为有偿贷款的表征变量，数据选自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库。

4. 外商援建投资（FAI）。外商援建投资是以市场手段进行援助的另一种方式，其本质是通过投资项目，帮助受援国发展基础设施和工业产品。需要说明的是，伴随着传统发展援助向新型的发展合作转型，外商援建投资和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外商投资已很难分界。基于此，本文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作为外商援建投资的代理变量，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此外，为了在实证过程中突出不同非洲国家 ISID 发展的基础与环境上的差异性，本文还选取了各国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比重（GCF）和货物出口服务额占 GDP 比重（EGS）为控制变量，从 ISID 的内部物质基础和外界拉动环境对国家特点进行控制。“技术援助额”“赠款”“有偿贷款”“外商援建投资额”以 2000 年为基期采用美国 CPI 进行平减。

(二) 模型选择与构建

本文重点考证不同援助方式对不同国家 ISID 水平的横向影响，因此假定参数不随时间变化，即满足时间上的一致性条件。基于上述指标选取，构建面板模型如下：

$$ISID_i = \alpha_i + \beta_{1i} \ln TA_i + \beta_{2i} \ln GRA_i + \beta_{3i} \ln LCS_i + \beta_{4i} FAI_i + \beta_{5i} GCF_i + \beta_{6i} EGS_i + \epsilon_i \tag{7}$$

模型（7）的截距和斜率存在以下两种假设。

假设 1：斜率相同，但截距不同，模型如下：

$$ISID_i = \alpha_i + \beta_1 \ln TA_i + \beta_2 \ln GRA_i + \beta_3 \ln LCS_i + \beta_4 FAI_i + \beta_5 GCF_i + \beta_6 EGS_i + \epsilon_i \tag{8}$$

假设 2：截距和斜率均相同，即模型形式为： $ISID_i = \alpha + \beta_1 \ln TA_i + \beta_2 \ln GRA_i + \beta_3 \ln LCS_i + \beta_4 FAI_i + \beta_5 GCF_i + \beta_6 EGS_i + \epsilon_i$ (9)

具体选用何种模型，可借助 Hausman 检验和 F 统计量的协方差分析确定，模型的选择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面板模型选择的协方差分析检验

组别	S1	S2	S3	F1	F2	结论
低收入国家	0.0496	0.0803	0.4109	0.9628	9.7124	接受假定 1，采用模型（8）
中低等收入国家	1.0450	2.0230	9.8280	1.4558	11.2064	接受假定 1，采用模型（8）
中高等收入国家	1.6841	2.7370	6.1636	0.9725	3.5465	接受假定 1，采用模型（8）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 Fisher－ADF 检验、Fisher－PP、LLC 检验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表 6 给出所检验的结果中，结果均表明所有变量是水平序列平稳的。

在模型选择及平稳性分析的基础上，从不同援助方式对非洲不同类型国家 ISID 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6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水平统计量		
	LC 检验	Fisher－ADF 检验	Fisher－PP 检验
TA	- 1.53995**	178.737****	228.019****
GRA	- 5.1861****	97.4689****	100.075****
LCS	- 3.05682****	109.372****	129.330****
FAI	- 6.17436****	112.6677****	108.472****
GCF	- 1.88841***	60.1526***	60.5358***
EGS	- 3.43956****	55.5344**	72.0196****

表 7 不同援助方式对非洲“低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
“中高等收入国家” ISID 水平的影响

	低收入国家	中低等收入国家	中高等收入国家
C	- 3. 3905**** (1. 1949)	- 8. 0111**** (2. 3321)	- 6. 6242**** (2. 0083)
TA	0. 0368**** (0. 0111)	0. 2431**** (0. 0539)	0. 1219* (0. 0797)
GRA	0. 0367* (0. 0124)	0. 0199 (0. 02765)	0. 0729 (0. 03942)
LCS	0. 0004 (0. 00367)	- 0. 30139* (0. 0338)	0. 02414*** (0. 0201)
FAI	0. 0032*** (0. 0013)	0. 0012* (0. 0093)	0. 0149**** (0. 0107)
GCF	0. 01516** (0. 0091)	- 0. 1443**** (0. 0255)	0. 2941* (0. 1787)
EGS	- 0. 0154 (0. 0240)	0. 1640** (0. 0499)	0. 1425**** (0. 3404)
R ²	0. 9832	0. 8857	0. 7984
Adj R ²	0. 9811	0. 8723	0. 7699
F	477. 325****	66. 396****	28. 0766****
Huasman 检验	Chi2 (6) = 26. 665	Chi2 (6) = 11. 736	Chi2 (6) = 53. 34
	Prob = 0. 0002	Prob = 0. 0681	Prob = 0. 0000
模型选取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注：*、**、***、**** 分别代表 20%、10%、5%、1%的显著性水平。

从实证的结果看，不同援助方式对非洲不同国家的 ISID 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作用。

第一，技术援助在非洲“低收入”“中低等收入”“中高等收入”国家包容与可持续发展中均表现出显著地促进作用，特别对“低收入”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内在于物质资本之中，具有内生增长动力。对于非洲国家而言，知识存量与资本存量的严重不足使其无法具备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国外成熟技术的引进与扩散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直接驱动力。同时，非洲的技术援助多为加工代工型产业，对妇女就业与社会的包容发展十分有利。

第二，就资金援助而言，赠款援助仅对低收入国家包容与可持续工业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中低等收入和中高等收入的非洲国家 ISID 水平并未带来显著的影

响。以市场手段执行的有偿贷款，在中高等收入国家表现出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低等收入国家却表现负向效应，而其对低收入非洲国家作用并不显著。根据双缺口模型理论，发展中国家因为储蓄率和外汇的不足，制约了经济增长。若国际援助可以弥补储蓄和外汇缺口，进而可推动经济增长。从实证结果看，捐款援助并没有显著提高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的 ISID 水平；但对于低收入的非洲国家，捐款援助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地储蓄率。此外，有偿贷款可以发挥作用的条件又相对较高甚至苛刻。从实证结果看，贷款援助仅对市场环境初步形成，且具有一定经济运转能力的中高等收入国家起积极作用；而对投资环境尚不成熟的非洲中低等收入国家而言，偿还与资金回流的要求，将使其陷入更大的被动。结合评估和实证结果看，有偿贷款的开发很容易使工业走上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特征的发展道路。非洲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工业发展很可能正面临“黑色开发”和“污染天堂”的挑战。

第三，就项目投资援助而言，外商援建投资对非洲“低收入”“中低等收入”“中高等收入”国家 ISID 均表现出促进作用，而且对“低收入”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发挥促进作用的显著性水平更高。根据“大推动理论”，发展中国家若想脱离“贫困陷阱”需要一个来自外界的“大推动”，而基础设施投资是其主要内容。从实证结果来看，外商援建投资确实表现出对非洲发展的推动作用，从一定层面上印证了大推动理论的有效性。对于非洲“低收入”国家，工业基础设施是当地工业发展的最大短板，所以外商援建投资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对于“中高等收入国家”，其对外商投资可提出相应的环境要求。然而对于非洲“中低等收入国家”而言，其发展需求弱于“低收入”国家，又不具备“中高等收入国家”对环境的对话资本。因此外商援建投资对当地 ISID 贡献的显著性水平也弱于其他两个群组。

此外，非洲国家资本存量水平对“低收入”和“中高等收入”ISID 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中低等收入”国家 ISID 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解决非洲“低收入”国家工业资本存量不足问题仍是推动当地 ISID 进展的关键，而非洲“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工业发展仅能实现经济效益，尚不能做到兼顾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相比之下“中高等收入”的非洲国家已具备实现 ISID 的条件。从境外市场环境看，其对“中低等收入”和“中高等收入”国家的 ISID 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低收入”国家 ISID 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外向型经济对非洲工业 ISID 起积极作用，但仍需要满足一定的经济基础与发展条件。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合上述测算与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非洲国家当前 ISID 水平普遍偏低。从 2000—2014 年非洲国家 ISID 整体水平

虽有进步，但进步速度十分缓慢。各国 ISID 水平总体上与国家的经济水平或人均收入保持一致，中高等收入国家的 ISID 水平最高，中低等收入国家其次，低收入国家 ISID 水平最差，于此同时 ISID 在非洲不同国家间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不平衡。从增长态势上，中高等收入国家 ISID 呈现进步趋势，中低等收入国家基本保持稳定，低收入国家 ISID 水平呈现整体下降。

第二，技术援助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包容与可持续工业发展的重要援助方式，且对非洲“低收入”“中低等收入”“中高等收入”国家均有显著作用。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技术驱动方式仍以外生为主，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国外成熟技术的引进和扩散是推动非洲实现包容与可持续工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第三，赠款援助无法彻底解决储蓄率和外汇不足的资金缺口，对非洲国家包容与可持续的工业发展作用并不显著。但其对低收入非洲国家的基本生活需求有直接作用，可适当调节低收入国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市场手段执行的有偿贷款援助对非洲“中高等收入”国家 ISID 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对风险抵抗小的非洲“中低等收入”国家而言将产生消极作用。

第四，外商援建投资对非洲国家 ISID 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对于非洲“低收入”国家而言，外商援建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此类国家 ISID 发展的关键路径；对于非洲“中高等收入”国家，该类国家已经表现出了对外商投资的环境要求，强调项目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维贡献；对于非洲“中低等收入”国家，外商投资援建存在只顾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环境效益的特点，外商投资对当地 ISID 的正向作用明显弱于“中高等收入”地区。

第五，从资本存量与非洲 ISID 发展的关系看。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基础存量是 ISID 提升的关键；非洲“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已基本走上包容与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开始注重工业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社会公平之间的协调发展；而非洲“中低等收入”国家很可能已走上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化发展之路，面临“污染天堂”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基于以上结论，现对非洲包容与可持续工业发展及援助方式的选择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以技术援助和外商援建投资作为当前援助非洲 ISID 发展的主要方式。将现已成熟的工业绿色发展技术移植到非洲国家，通过技术转移的外生动力驱动非洲工业朝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同时加强技术技能培训，加强妇女参与劳动的权利。第二，可继续加强对非洲“低收入”国家的捐款援助，保障贫困居民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可对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中高等收入”非洲国家实行贷款援助，对经济运营环境差，抗风险性

能力不足的非洲国家谨慎使用有偿贷款。第三，关注非洲“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工业发展，谨慎预防此类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可通过进一步加强绿色技术援助和贸易合作推动“中低等收入”非洲国家的 ISID 发展。第四，选择示范效益明显，可复制条件充分的地区或国家进行重点扶持。对当前包容与可持续工业发展成效明显、进展快速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案例总结和推广。同时，进一步加强援助方式和有效性的理论研究和改进，使其更好地指导非洲国家工业援助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格·罗辛、远帆：《外国资本在非洲国家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国际经济评论》1980 年第 5 期。
2. 陈宗德：《全球化中的非洲工业发展战略》，《西亚非洲》2003 年第 4 期。
3. 梁益坚、李兴刚：《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渊源与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7 期。
4. 张永蓬：《国际援助理论演变与国际援助非洲面临的挑战》，《亚非纵横》2012 年第 4 期。
5. 陈默：《中国援助的非洲模式及其对非洲发展影响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位论文，2014 年。
6. 王圳、岳鸿飞：《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方向》，《国际经济合作》2015 年第 2 期。
7. 李智彪：《非洲工业化战略与中非工业化合作战略思考》，《西亚非洲》2016 年第 5 期。
8. 朱华友、赵雅琼：《非洲国家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及实现路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
9. 王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中国合作发展前景分析》，《东北亚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 期。
10. Dorothy McCormick. *African Enterprise Clusters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and Reality*.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9, 1999.
11.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 Penguin Books, 2009.
12. UNID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United Nations, 2016.

责任编辑：沈家文

货币政策转型规律探析

——基于国际比较和国内制度变迁的视角

郭迎锋 胡一鸣 梁云凤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环境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现有间接调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其有效性不断降低。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需要主动适应宏观调控目标的变化和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下的微观主体的预期、金融工具创新和新的金融业态的出现、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方面的变化，这就要求我国的货币政策需要由当前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从国际经验和国内的制度变迁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与分析，可以发现货币政策的转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关键词：货币政策 转型规律 间接调控 基准利率

作者简介：郭迎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胡一鸣，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

梁云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博士后。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期，传统货币政策调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需要由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转型。《金融业发展与改革“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均提出了要推动我国的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我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利率市场化形式上完成之后的“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框架双轨并行的过渡期，进一步探寻货币政策转型的规律，有利于在这个过渡期内包括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合理化设置货币政策目标、科学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顺畅利率传导机制，

从而顺利实现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

一、货币政策转型的国际实践比较

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发展与转型，深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本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化；二是世界货币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政策理论发展的影响。这两个方面也是相互影响的，这是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西方国家实行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由于经济的滞胀以及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学者例如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对当时的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理论为指导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进行了反思。西方国家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 90 年代完成，开始执行到现在为止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下述内容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对美国、欧盟、英国和日韩货币政策的转型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找出我国货币政策转型发展的有效借鉴。

（一）美国货币政策转型实践

1. 美国利率市场化之前的货币政策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美国基本执行利率管制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美联储主要依靠 1933 年《格拉斯—斯蒂格利茨》被授权发布“Q 条例”对商业银行的储蓄及定期存款规定利率上限，20 世纪 50 年代美联储与联邦财政部达成协议独立执行和实施货币政策，其联邦储备公开市场委员会成为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公开市场操作、贴现率即法定准备金率成为当时的主要操作工具。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依据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美联储一直执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将固定利率作为中间目标。在 60 年代末开始出现“滞胀”问题，并且在 1973 年石油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高通胀，物价上涨会提高对货币的需求，而维持固定利率就会提高货币供应量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这种局面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呼声与理论探讨随之而来。这一时期的主要货币政策理论的支撑者为凯恩斯主义主张下的相机抉择的货币规则，其显性特征就是选择将固定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2. 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货币政策

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取消了“Q 条例”对存款利率的限制，从 1970 年开始到 1986 年 3 月截止（张建华，2012）。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美联储开始将货币供应量 M1 作为中介目标，具体而言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整个 70 年代，美联储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操作目标，主要运用非借入准备金围绕着该操作目标

进行操作；在 80 年代初，美联储开始反向操作，即非借入准备金为操作目标，允许联邦基金利率的上下波动，在该时期，名义收入增长率（最终目标）与 M1 增长率（中介目标）和非借入准备金的增长（操作目标）三者之间有非常显著的联动关系；80 年代中后期，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引入与 M1 一起作为中间目标，操作目标选择为借入准备金，该借入准备金在当时被认为是评价商业银行资金缺口的主要指标。这一时期的主要货币政策理论的支撑者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术主张下的单一货币规则，^① 其显性特征就是将货币供应量 M1 作为其中介目标，相应的将基础货币作为操作目标。

3. 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的货币政策

1986 年 3 月“Q 条例”完全被废止，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结束，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型提供了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联储主要采用公开操作的手段围绕着联邦基准利率的操作目标实施货币政策，同时将 M2 增长作为中介目标（在 M1 的基础上加入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主要的传导途径为：美联储联邦储备公开市场委员会确定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据此通过联邦基金市场卖出或买进政府债券影响商业银行准备金的供求关系。1993 年泰勒法则^②的出现，为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依据，该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放弃了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改为一直沿用至今的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操作目标并对市场利率进行影响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体系，其最终目标确定为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泰勒法则表明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美联储可以设定联邦基金目标值，最终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具体的做法为：美联储每两周依据商业银行的日均存款情况计算出法定存款准备金水平，以 17（14+3）天为一个考核周期进行考核，通过对储蓄头寸的管理来影响市场利率。分两种情况：第一，在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低于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时，商业银行间的拆借会转向美联储（拆借成本更低），拉低市场拆借利率；反之，美联储就会抛售国债，吸收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拉高市场拆借利率。美联储会连续反复的进行操作，使得市场预期达到货币政策的目的。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体系内已经不存在了，虽然诸多学者认为美国实际上执行的是“通胀目标制”的国家（汪洋，2008），但在美联储的官方文件中一直未曾明确，也就是说当前美国执行

^① 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为了防止货币成为经济混乱的原因，给经济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依照货币主义的观点，最优的货币政策是按单一的规则控制货币供给量，其货币增长速度等于经济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

^② 依据泰勒法则 $R=R'+a(P-P')-b(U-U')$ 所核算出的名义利率 R 与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非常接近，为该法则在美国对货币政策的指导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的是凯恩斯单步法（政策工具——操作目标——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货币政策之下，由于“零利率”的出现，应急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量化宽松）开始出现，美联储直接干预中长期贷款和债券利率水平，并在最终目标上充分就业被视为比物价稳定更重要，这些临时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美国降杠杆、率先走出后金融危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此期间，美联储引入了阈值指引代替了以前的时间指引，作为预期管理工具对其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了有益补充。

美国货币政策转型的关键还在于利率市场化的完成，但这并不是美国能成功的从数量型货币政策转向价格型的唯一因素，还有两项在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因素，一是债券市场的发达（伴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二是影子银行的发展所造成的社会融资规模的迅速膨胀。这两项因素连同利率市场化打破了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效力，为货币政策的成功转型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环境。

（二）德国^①及欧盟货币政策转型实践

1. 德国利率市场化之前的货币政策

同美国一样，德国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也是执行利率管制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德国的利率管制要追溯到 1929 年的经济危机。为防止资金外流，当时的德国政府开始执行利率管制的政策。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利率管制的范围要更广，存贷款利率、票据贴现率和各种银行手续费都有详细的管约束，德国当时的央行通过确定再贴现率影响商业银行的利率水平并传导至实体经济层面。二战后德国的经济政策以及宏观调控手段属于由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演化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的银行体系结构两个重要的特征：独立性央行的确定和以国有银行为主的德国银行结构。第一，德国央行独立性原则在西方国家明确较早，早在 1949 年的宪法——《联邦德国基本法》第 88 条就规定联邦政府应当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并于 1957 颁布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确定德意志联邦银行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德国央行。德国央行是在废除两级中央银行体制并在改组与合并各个州中央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② 德国的货币政策在成立之初便以物价稳定为主要的最终目标，其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严格围绕最终目标进行，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不受联邦政府的影响，成为西方国家中独立性中央银行的典范。第二，德国金融机构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结构，其国有性质的德国储蓄银行、州立银行和合作银行的资产比例达到 53.1%，要高于私人银行的资产比

^①本文的德国专指联邦德国。

^②<http://www.bundesbank.de/Navigation/DE/Bundesbank/Organisation/organisation.html>

例（郭迎锋、沈尤佳，2014），这期间德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为央行的基础货币。德国当时的管控型货币政策符合经济环境并且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使得二战后成立的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能够很好的运用这种货币政策，对德国战后的经济恢复和腾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失业率和通胀率在发达国家中居于较低水平。随着德国战后经济的恢复，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德国马克自由兑换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由于外部的冲击（具体表现在美国等国家的更强波动利率变化打破了德国较为稳定的利率水平），而致德国资本外流加剧，使得德国央行相对稳定的利率政策大打折扣，放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被提出。

2. 德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货币政策

德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利率市场的改革，1962 年德国修改《信用制度法》中缩小了对利率限制的对象范围，并在 1965、1966、1967 年分步骤做出了 2.5 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超过 3 个月 100 万马克以上的大额存款利率、全面放松利率管制的规定，从法规形式上解除了利率管制（体现在解除了“强制”利率规定）。但为了避免自由利率下的竞争混乱，德国在 1967—1973 年间实行了金融同业组织相互协商的“存款指导利率”的建议措施（实际上实施了实质性的利率管制），到 1973 年废止。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于 1966 年成立的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存款担保基金”为德国的利率市场化后的金融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于美国利率市场化之后较快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联邦基准利率），德国在 1973—1987 年的很长一段时间依然采用基础货币作为操作目标，因为德国融资结构中非金融企业的银行贷款比例一直稳定在 55% 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德国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体系），其数量型货币政策在信贷渠道的传导机制上依然可以保持其效果。

3. 德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的货币政策

虽然德国的间接融资在金融市场中一直占有比较高的比例，但由于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资产证券化趋势下金融衍生品也从美国影响到了德国，德国居民的资产结构发生了变化，银行存款比例开始从 20 世纪 70 年的平均比例 53.9% 下降到欧洲 32.8%，^① 导致了货币乘数的波动。在基础货币 M0 到 M2 的关系上无法像之前进行推算与预测，因此，1987 年德意志联邦银行将能够体现中长期特征的货币供应量 M3^② 引入作为中介目标。德国的货币政策在利率化市场改革之后的操作目标经历了从“利率走廊”到回购利率的过

^①Deutsche Bundesbank Monthly Report, January 1999.

^②M3 一般理解为 M2 与私有机构和公司的大额定期存款，具体统计口径包括现钞、隔夜存款、两年期内存款三个月内可通知赎回存单、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份额及货币市场票据、两年期内的债券。

程。利率走廊的上限是伦巴德贷款利率,^① 下限是再贴现率利率。1985 年之后, 德意志联邦银行开始采用市场公开操作的工具进行有价证券的回购, 就是现在德国仍然采用的短期回购利率 (7 天或 14 天回购利率)。

1998 年欧洲中央银行在德国央行的运行基础上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 该机构的单一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 并执行了通胀目标制的目标, 把 HICP 指数^②在 2003 年明确规定为 2% 的水平。欧洲央行是对隔夜拆借利率的操作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 同时也要依据 HICP 对欧元区国家执行通胀指标的情况进行评估。另外, 欧洲央行通过《The Monetary Policy of the ECB》的报告加强与欧洲民众及机构的信息沟通, 其所公布的 HICP 目标值成为预期实现的最主要的工具。欧洲央行在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设置上也延续了德国的做法, 操作目标采取隔夜拆借率有上下限的利率走廊机制,^③ 最终目标采取 HICP 的通胀目标。在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其“双支柱”策略是主要特征, 在“双支柱”策略目标值的设置上, 第一支柱为类似于德国的 M3 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其参考值明确为 4.5%; 第二支柱是对未来价格风险的广泛评估, 大约包括对工资、汇率、债券价格和财政政策等, 具体主要通过对银行信贷和资产价格的观测上, 如果二者同时增加则被认为泡沫经济的出现。

(三) 英国货币政策转型实践

1. 英国利率市场化之前的货币政策

在英国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的利率市场化之前, 英国对利率管制的形式是所谓的“利率协定”, 分为两层: 第一层是中央银行设定的再贴现率, 第二层是商业银行以再贴现率为基础的存贷款及银行间拆借利率。“利率协定”规定了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银行间拆借利率与再贴现率的关系。通过这两层关系之间“利率协定”的设置, 英格兰银行作为英国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影响着市场利率, 当时英国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互不干扰, 例如住房融资服务归属于专门的英国住房抵押贷款经营, 银行专注于存贷款业务, 这也是英国这种利率管制体制可以成功运转的主要因素。这个时期的英国货币政策

①“伦巴德贷款”是德意志联邦银行向信用机构提供的、以某些证券和债权为抵押品的 3 个月以内有息贷款。原则上, 联邦银行提供伦巴德贷款仅仅是为了满足信用机构的临时性流动资金需要。伦巴德贷款利率与再贴现利率只差一般不到 1%。

②HICP: Harmonized Index Of Consumer Prices (消费者物价指数 HICP), 是欧洲央行的通货膨胀和物价稳定的消费物价指数, 采用欧元的成员国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

③隔夜拆借率的上限为: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每月所确定的再融资利率水平; 下限为: 吸收商业银行剩余资金的存款便利。

体系最终目标上是多元化的，每一阶段侧重点不同，50—60 年代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同美国一样，英国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出现“滞胀”问题，在公众对高通胀率的预期之下英格兰银行难以通过控制利率水平来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无奈之下，引入了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另外，国际资本在英国政府放宽金融市场限制之后开始进入英国银行业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在缺乏弹性的利率管制局面下导致了英国资本的外流，最终引发了英镑的贬值。这种局面下英国开始考虑利率市场化改革。

2. 英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货币政策

为了快速有效地解决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波动过大和英镑币值不稳的问题，英格兰银行执行了一步到位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1971 年 5 月发布了《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报告并于 1971 年 9 月份实施，一举废除了银行间利率协议，同时取消了分业经营限制和贷款限额管理等。由于英格兰银行没有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权力，英国政府在高通胀、经济衰退和本币贬值的情况下干涉了利率，使得英国在 1981 年才最终取消了最低贷款利率，利率完全自由化，在 1982 年同德国一样也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在这期间，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70 年代侧重于稳定物价，中介目标是坚持货币供应量，操作目标也相应的变为基础货币。

3. 英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的货币政策

随着英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英国 1986 年英格兰金融混业经营的出现，英国的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过渡到价格型。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行价格型货币政策，其最终目标确定为单一性的维持物价稳定，并同欧洲央行一样确定了物价变动的范围，中间目标也从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监测，操作目标是一组短期利率，包括隔夜拆借利率、3 个月国债利率和 3 个月银行拆借利率，操作工具包括了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制度、特别存款和道义劝说等。1998 年英格兰银行被正式确定为独立行使货币政策权力的机构之后，英国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随着直接融资市场比例扩大并且资产证券化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英国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步发展到现在的两周回购利率作为其操作目标，主要的操作标的是金边债券（因为它是英国公开市场业务中质量较高的工具），以此向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表现市场利率并最终影响英国的宏观经济。其最终目标为单一型的货币政策——物价稳定，同时设定了通货膨胀目标率（2.5%）作为中介目标。

（四）日本、韩国货币政策转型实践

二战以后，服从日本高度集中和管控的经济政治格局，日本采用了约束型的金融体

制，同英国一样采用了分业经营的模式，但要比英国的规定更为严格，在面对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存贷款客户对象由不同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且不得越界，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就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利率管制始于 1947 年《利率调整法》，其主要特点是对不同的利率采取有针对性的直接限制或指导性限制形式。这种管制体制下的利率长期保持了低水平，在恢复日本经济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日本经济腾飞后的 20 世纪 70 年代始，日本直接融资市场迅速发展，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降低。这一时期旧的分业经营限制和低利率管制导致银行经营困难，同时日本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摩擦不断，加上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日本在 1971 年首先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之后才在 1977 年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针对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采取了分步实施的利率市场化，于 1994 年结束，利率市场化之后的银行竞争加剧，风险偏好趋于激进，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银行的呆账坏账激增造成了大量银行倒闭。这种影响一直至今，因此日本的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始终有金融稳定，除此之外物价稳定是另外一个最终目标（同美国一样日本央行没有设定通胀目标），但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国际收支平衡也是其中之一。在中间目标的选择上，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是贷款增加额，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改为货币供应量，随着利率市场化完成，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其操作目标在 1997 年的《日本银行法》明确为隔夜拆借利率，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调节银行在日本央行的准备金账户头寸来实现对货币市场利率的控制，其他的操作工具主要包括再贷款和存款准备金，窗口指导的手段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逐步被取消。

韩国政府从 20 世纪 50 年开始执行严格的政府管控的金融体制。韩国 1952 年颁布的《利息限额法》将金融机构的利率调整权力划归至财政部，为了使资金流向重点支持的行业，韩国政府制定了范围广泛利率水平极低的政策性贷款计划，形成了金融机构利率与市场利率的严重脱节。这种局面下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使得韩国相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了滞胀局面。从 80 年代起韩国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较为波折，经历了从开放到管制再到开放的两个阶段，其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也在信贷控制和货币供应量之间摇摆，但最终取得了成功。突出表现在：一是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二是货币供应量增长平稳，三是流动性增加推动了资产价格。随着利率化市场改革的成功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越来越不适宜，表现在货币供应总量和实体经济指标的关系逐渐变弱。这种情况下，韩国央行在其货币政策转型期的 90 年代初扩大了货币供应的观察范围，引入 MCT（M2 + CDs + 货币信托）进行货币总量的计算，以此来反映体现非银行金融机构活

动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当前韩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执行单一型的最终目标——物价稳定，设定了通货膨胀目标率（2.5%~3.5%）作为目标值。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一定的借款工具成为其操作工具。

二、我国货币政策转型的基本情况

（一）第一次转型：从“准货币政策”到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一国货币当局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交换和消费均由政府统一计划与分配，可以说即使没有货币该经济体系也可以运转，当然就不存在货币政策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央银行需要采取更多的间接调控的方式和市场化的手段调控经济，利用市场化的传导机制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转并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因此，总体而言，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度变迁应该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

1. 我国货币政策的前身：从财政政策附庸到“准货币政策”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为 1979—1983 年。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存在货币政策，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与分配的主体，财政政策在经济调控中居于主导地位，银行仅仅作为财政政策的附庸而存在，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不存在，中国人民银行居于从属地位。我国的货币政策严格意义上讲应该从 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开始。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1979 年到 1983 年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计划只是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依然摆脱不了财政政策的附庸地位。但中国人民银行在此期间内同时具有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两项职能，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已经具有了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并且这种职能随着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逐步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其作为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角色越来越明显。从国家政府层面而言，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党中央国务院层面也开始着手进行改革。1981 年 8 月中国金融学会首先提出建议，1982 年 7 月批转同意开始组建中央银行体制，并在 1983 年 9 月颁布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从实践操作而言，1981 年开始的“拨改贷”政策，打破了之前“长期资金财政拨款解决、短期周转资金银行贷款解决”的局面（孟建华，2006），改由企业的资金需求由贷款解决，初步形成了信贷政策并建立了信贷渠道。因此，这一期间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称之为“准货币政策”阶段。

2. 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为 1984—1992 年。1984 年 1 月 1 日，随着中国工商银行的组

建，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正式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货币政策正式成为中国的两项宏观调控政策之一。从 1984 年到 1992 年是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显性特征是信贷规模的扩张，操作目标是直接控制贷款规模或贷款最高控制限额。直接控制贷款规模具体体现在 1985 年所颁布的《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要求中，实行了三层信贷计划的操作工具：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人民银行信贷计划和专业银行信贷计划；贷款最高控制限额体现在 1989 年实行的“限额管理、以存定贷”的办法来核批各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① 因为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控制了贷款规模，不需要中介目标的存在，最终目标是币值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以经济发展为主。整体上是信贷规模高速扩张所带来的物价指数高企的时期，M0、M1、M2 增速远远大于 GDP 增速，在政策实施方面出现了紧缩与扩张的反复交替，缺少必要的前瞻性措施和手段，并且出现了几次大的经济波动，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够稳定。

（二）第二次转型：从直接调控到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

这一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的典型特征是从对贷款的直接限额调控逐步向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间接调控方式转变，并在 1998 年基本确立了公开市场操作作为主要工具的间接调控货币政策，到 2008 年一直维持着外汇占款为主的货币投放政策格局。

1. 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的货币政策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为 1993—1997 年。在吸取了 1984—1992 年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并结合 1992 年出现的经济发展过热、通胀率过高的情况，我国的货币政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促进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当时货币政策的显性特征是“适度从紧”的反通胀措施。1995 年颁布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公开市场操作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被提出，标志着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方式开始得到重视，同时，也取消了同业拆借利率的最高限额，拉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1997 年 6 月，人民银行通过《关于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在该市场上可以开设银行间债券的回购业务，连同 1996 年财政部开始通过证券交易所发行国债，使得场外业务（银行间市场为主）和场内业务（交易所为主）得以共同发展，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建立了基础性渠道。但这一时期依然保持着对商业银行贷款额度规模管

^① 中国会计网，http://www.kuaiji.com/fagui/1442052?utm_source=fagui&utm_content=zx_right。

理的信贷计划，使得货币政策也保持着直接调控的方式，因此处于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确立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1996 年开始公布 M0、M1 和 M2 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所以操作目标也从控制信贷规模开始向控制基础货币的目标过度，具体的操作工具转向了以再贴现、存贷款基准利率等间接性操作工具为主。应该说这一阶段首要的最终目标是物价稳定，同时 M2 的增速也较上个时期逐年回落，GDP 也在平稳回落中保持了适度增长。1996 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宏观经济环境。

2. 外汇占款格局下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为 1998—2008 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正好处于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间。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坚持货币不贬值的政策使得出口迅速减少，并带来了总需求不足、物价负增长和通货紧缩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负面影响，1999 年开始实行反通缩的稳健货币政策。1998 年人民银行确定存贷比作为其监管手段之一，取代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限额，开始编制基础货币规划，根据货币供应量的中介目标和外部经济环境来确定基础货币数量，并在该年 5 月份正式实施了公开市场操作，标志着间接调控为主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开始确定，基本建立了人民银行→货币市场→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的数量型货币政策额度间接调控机制。

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外部环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我国伴随着煤炭、钢铁、水泥等产业的发展使得粗放式的发展格局凸显；二是我国加入 WTO 开始形成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大量的国际资本开始进入我国。在中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基础货币增长迅速，人民银行需要对冲外部注入的流动性，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民银行提高了存贷款基准利差，使得流向实体经济层面的资金成本过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市场与实际经济的脱节，实际上形成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失效的结果。1998 年在操作工具上人民银行引入了窗口指导，为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加入了直接调控的工具。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依然保持着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的目标，最终目标的选择多元化，包括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并且在不同年份的侧重点依据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而有所不同。在制度建设层面比较重要的有 2005 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拉开了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三）第三次转型：从数量型到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

这一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的典型特征伴随着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

和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方式向基准利率的调控方式转变，并以 2012 年我国政府的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政策的加快部署与实施为分界岭划分为两个阶段。

1. 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政策主导下的货币政策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为 2008—2012 年。相比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给我国所带来的影响更大更深远。为了应对更加困难的经济放缓局面，中央政府出台了 4 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作为辅助手段进行了全面宽松的操作，导致 2009 年 M2 的年增速达到了 28.05%，为自 1997 年以来的最高位；其所追求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基本实现，达到了 9.24%。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效果来看，这种数量型货币政策是失效的，但与上一周期的外汇占款所导致的失效原因不同。2008—2012 年的失效原因主要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流向渠道集中在房地产和地方投融资平台上，信贷扩张中大约 50% 份额流向了这两个渠道造成了房地产泡沫，2008—2012 年间的房价收入比达到了 11.3:1 的不合理水平。地方债务在 2008 年之后扩张速度也惊人，2009 年地方债务余额的增速达到了 61.9%（陈彦斌等，2015）。这种局面下，加强了家庭和政府的持币意愿，降低了货币流通的速度，降低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在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体系内的操作工具、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均无显著变化，在最终目标的重点顺序上，首先强调了经济增长，其次是保证就业。同时，影子银行和金融创新开始涌现，直接融资的比重上升而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比例下降趋势明显，这也是当时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不足的原因。另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明显，中国人民银行的推进工作也不显著，汇率市场化改革在 2005 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之后再无进展。

2. 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中利率市场化改革

2012 以后，我国社会经济步入了“三期叠加”的局面，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成为货币政策所面临的主要宏观经济形势，原有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不足。基于此，中国人民银行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在 2013 年 7 月 20 日和 2015 年 10 月 23 日央行分别全面放开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和存款利率上限，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接续于利率市场化在形式上也完成了。同时外汇占款下滑、直接融资市场比例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开展、汇率市场改革加快等方面的因素也促进了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的步伐。我国利率管制时代的结束，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正式进入了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时期。由于转型期内旧的数量型调控工具和传导途径逐步失效、新的价格型调控工具和传导途径的有效性尚未建立，需要转型期内特殊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也进行了创新：短

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和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并且为了解决上一周期全面宽松的不利后果采取了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降杠杆的要求）。例如 2013 年 4 月人民银行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农业银行和中小银行进行定向降准措施。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上加入了金融稳定的结构性调控目标，使得调控的难度加大、复杂程度提高。总结而言，这五项最终目标的重要性顺序应当为：在保证金融稳定、结构不失衡的前提下，首先考虑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成为次级目标。

因此，2012 年以后的货币政策转型的核心是利率市场化在结束利率管制后的继续深入，包括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完善金融市场等促进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所采取的基本途径为：采取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的工具，调节市场基准利率并传导至金融市场利率，最终实现对物价调控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尽量采取相对单一的目标体系，以保证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并提高微观主体的预期。

三、总结：货币政策发展的规律

从货币政策制度变迁的纵向比较、国际实践的横向对比以及我国货币政策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显性特征进行了分析与描述，大致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货币政策转型的理论基础

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型按照利率市场改革前、改革中和改革后分成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货币理论指导下的货币政策具体实践的不同。改革前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理论指导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其标志就是将固定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中央银行可以直接通过利率的调控实现对消费和投资的引导，中央银行尚不具备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改革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理论指导来源于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主义，标志就是将货币供应量（M1 或 M2）作为中介目标，并且将基础货币作为操作目标；改革后这些国家采用了泰勒规则下的货币政策理论，将基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并实现以物价稳定为核心的最终目标。这些货币政策背后的货币理论指导均有适合这些国家具体发展实践的土壤，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转型需要找到适合自己国情发展的货币理论体系作为指导。

（二）货币政策转型的必要条件

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需要四个必要条件：一是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金

融自由化改革；二是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央行；三是“三元悖论”下的汇率自由兑换；^①四是以债券市场为核心的高度发展的直接融资市场。除了对第一、第三和第四个必要条件在理论界较少争议之外，对第二个必要条件“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央行”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议。一般而言，一国货币政策的起点在于该国经济循环过程中货币需求，该国央行只要能依据实际经济需求发行货币就是其独立性的具体表现。从这一点来考察，美联储和德意志联邦银行无论是转型前还是转型后的货币政策都由于其独立性而被视为各国央行的典范。

（三）货币政策转型的发展规律

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型的经验以及我国货币政策的发展逻辑来看，随着各国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结构不断完善，其货币政策的发展规律可以划分为信贷规模控制、盯住货币总量和基准利率调控等市场化机制由浅入深三个不同阶段。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所依托的内部宏观经济环境和外部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也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加快转型以适应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宏观经济环境。

（四）货币政策转型的逻辑关系

我国货币政策的转型应该从两个逻辑关系上进行分析。第一种逻辑关系：从直接调控的行政干预式向间接调控的市场调节式转型。这方面应该站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高度来进行，解决政府与市场应该在什么样的原则下进行资源的配置，政府直接干预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选择上信贷渠道更为直接有效，而市场调节下的传导渠道利率传导、资产价格传导、汇率传导和预期传导更为有效。第二种逻辑关系：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传统的利率管制下的数量调控向完善的利率市场机制下的价格调节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一是要确定转型过程是如英国转型的“一步到位”和韩国的激进式的快速市场化，还是如德国、日本的渐进式的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要回答如何处理数量型向价格型过渡阶段过程中的特殊货币政策工具的取舍与评价；二是多元化的目标体系向单一化目标体系转型，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单一型的目标体系说明在操作工具、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上都有一项必不可少的选项，具体而言，一国货币当局主要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对基准利率（唯一性，可选货币市场的拆借利率或债

^①蒙代尔“三元悖论”（The Trilemma，即：固定汇率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理论下，为了使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能有效实施，保证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要逐步放开固定汇率制。未来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提高是长期性趋势，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成为必然选择。

券回购利率)施加影响实现主要以物价稳定为主的目标,其他少量的目标(如充分就业的最终目标)和其他少量的操作工具(如存款准备金)作为补充。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多元化无论是在操作工具上、操作目标(除了基础货币外还兼有管制利率)还是最终目标上相对价格型货币政策都具有多样性,而且是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而实施的,而价格型货币政策视中介目标的存在为“存在非必须”。基于上述两种逻辑关系的理解,我们可以从直接与间接、数量与价格构建货币政策的二维模型(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间接调控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是基于这两种逻辑发展的最优模式和最成熟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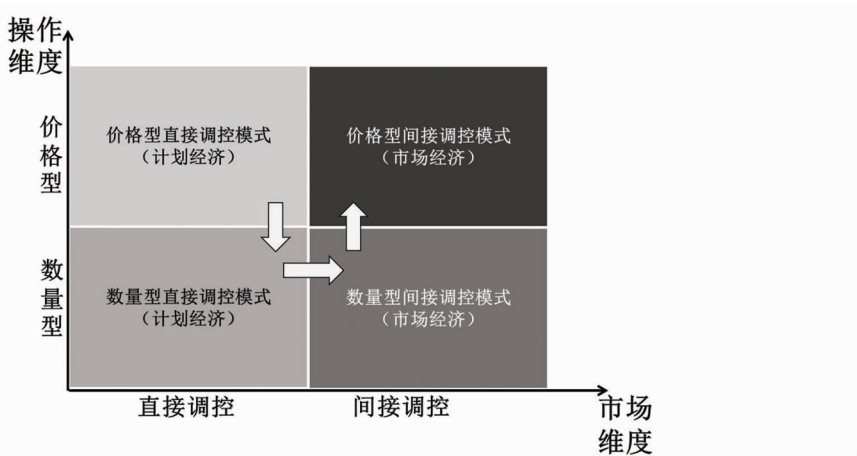


图1 货币政策转型的二维模型

数据来源：笔者自行绘制。

（五）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期的应对方案选择

在我国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转型期内，最终目标侧重于结构失衡不恶化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因此定向宽松被人民银行广泛采用，但从实际效果看尚不清晰，还有待评价。在操作目标的选择上，除了传统的基础货币之外，可以借鉴德国和欧洲央行的做法，建立转型期间的利率走廊，并分步实施由宽到窄以完成未来培育并确定短期基准利率的目标。转型期内中介目标的选择，在两个方向进行努力与尝试，一是借鉴德国（M3）和韩国（MCT：M2 + CDs + 货币信托）转型期做法，对现有中介目标的扩展，将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进一步外延，采用社会融资总额的做法进行范围更广的货币供应量的监控，以此来反映转型期非银行金融机构活动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二是对未来价格型货币政策考虑是否需要设立中介目标，从实际情况看，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基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多元化（两项）的选择而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值，而韩国、英国和欧洲央行基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单一化而采取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值与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建立传导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如果选择价格型货币政策，从逻辑关系上而言，在最终目

标之前如果存在一个目标值使得货币政策围绕着该值进行操作，就具备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存在特征，就必须选择通货膨胀率作为中介目标，因为价格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核心（多元化目标体系）或唯一（单一化目标体系）是物价稳定。

参考文献：

1. 张勇、范从来：《货币政策框架：理论缘起、演化脉络与中国挑战》，《学术研究》2017 年第 11 期。
2. 陈彦斌、刘哲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面临的困境与改革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3. 郭强、邓黎桥、刘场：《美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研究》，《新金融》2016 年第 3 期。
4. 张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演变及我国的选择》，《生产力研究》2016 年第 2 期。
5. 王年咏、刘毅：《经济转型期的德国金融改革及启示》，《经济纵横》2014 年第 8 期。
6. 胡振红：《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演变及动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5 月 9 日。
7. 吴超林：《1984 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中的货币政策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8. 王元、杜飞轮：《货币政策机制化相关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4 年第 7 期。
9. 曲彬：《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前瞻性研究——“利率走廊”调控新范式初探》，《华北金融》2014 年第 7 期。
10. 万解秋、徐涛：《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的效率——兼评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经济研究》2001 年第 3 期。
11. 王楚明：《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演进与展望》，《上海经济研究》2008 年第 5 期。
12. 汪洋：《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版。
13. 张勇、李政军、龚六堂：《利率双轨制、金融改革与最优货币政策》，《经济研究》2014 年第 10 期。
14. 郭豫媚、陈彦斌：《利率市场化大背景下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人文杂志》2015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完善金砖国家合作平台的思路 和路径设计

赵春哲

摘要：金砖组织逐步实现从经济投资概念向国际合作机制的实质性转化，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拥有的制度性权力，与其经济实力和现实贡献还很不相称。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体系权责不对称的现象更加凸显，国际制度的代表性与有效性日益不足，明显影响了治理效果。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在“一带一路”建设总体布局下，与“一带一路”和 G20 等合作机制相互补充，逐步扩大规模，构建常设机构，丰富合作内容，加深合作程度，为建设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平台打下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稳步扩大成员国规模，将合作平台从金砖成员国拓展到全球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关键词：金砖国家 合作平台 合作机制

作者简介：赵春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2009 年 6 月，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四国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之后，金砖组织正在逐步实现从经济投资概念向国际合作机制的实质性转化。目前，金砖国家组织成员增加到 5 个，来自亚欧非美四大洲，金砖国家合作已经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经贸、财政、金融、农业、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禁毒、统计、旅游、智库、友城、地方政府合作等数十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多层次架构。与此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现有全球治理

体系中拥有的制度性权力，与其经济实力和现实贡献还很不相称。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体系权责不对称的现象更加凸显，国际制度的代表性与有效性日益不足，明显影响了治理效果。在以往的治理平台无法充分适应全球治理任务变化的情况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有必要密切加强合作，建设新的更为有效的国际治理平台。

一、当前金砖国家合作主要存在的问题

当前，全球性挑战突出，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不稳定因素增加，给金砖国家合作造成了一定的挑战，金砖国家合作面临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建设已经开展了很多工作，有了一些成果，但仍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一）金砖国家合作仍处于非正式阶段

金砖国家合作目前仍以论坛形式为主，务虚成分居多，缺乏稳定正式的长效性机制，深化相互合作缺乏有效平台支撑。比如，仅有领导人峰会等高层会晤机制，但没有设立秘书处等常设机构，领导人会晤的成果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和执行力。各领域和各层级合作平台之间缺乏有效整合和协调，难以发挥协同作用。

一些具体合作平台虽然已开始运作，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仍不成熟。例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应急储备机制的结算方式、储备货币、汇率政策、组织结构等都还没有具体的规定。

作为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最为积极的国家，中国国内目前也存在经验不足、人才缺乏、战略资源有限等问题。中国传统外交和国际合作以参与原有国际组织、遵守原有国际规则为主，缺乏主导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和规则的经验。最近 10 年开始有所尝试，但还处在探索和积累经验阶段，实际能力尚有所欠缺。同时，无论专业外交人员、研究力量还是民间力量，合作能力和领导素质也都远远不适应金砖国家合作等新兴平台建设的需要。此外，在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总体外交布局下，金砖国家合作平台所处的位置尚不清晰。在国家总体战略资源有限的约束下，金砖国家合作平台所能得到的份额也受制于大环境的发展趋势。

（二）金砖国家经济发展遇到困难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部分成员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困境。经济增速显著降低，结构性矛盾突出，金融风险不时爆发。特别是俄罗斯和巴西两个资源型国家，遇到的困难最为明显。不仅产业经济、就业受到明显影响，还引发国际收支危机和金融汇率危机，并进一步演化为社会政治危机。巴西罗塞夫总统遭到

弹劾，是经济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的典型案例。这些因素，都对金砖国家合作深化形成不利影响。

表 1 2008—2018 年金砖五国各经济体 GDP 增长率

国家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巴西	5.0	-0.2	7.6	3.9	1.8	2.7	0.1	-3.8	-3.6	0.2	1.7
中国	9.6	9.2	10.6	9.5	7.7	7.7	7.3	6.9	6.7	6.6	6.2
印度	3.9	8.5	10.3	6.6	5.1	6.9	7.3	7.6	6.8	7.2	7.7
俄罗斯	5.2	-7.8	4.5	4.3	3.4	1.3	0.6	-3.7	-0.2	1.4	1.4
南非	3.2	-1.5	3.0	3.2	2.2	2.2	1.5	1.3	0.3	0.8	1.6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展望》《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7 年度报告》。

金砖国家的崛起与全球化密不可分，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潮流方兴未艾，在全球化遭遇挫折情况下，金砖国家合作的经济基础也在削弱。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正在竞相吸引外国投资，试图引导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流。美国大幅放松了对传统化石燃料开采的限制，给俄罗斯的油气产业带来巨大竞争压力。这些都弱化了金砖国家原有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对其发展国际合作形成制约。

与此同时，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正在快速进行，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仍处在领先地位，而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总体不占优势，存在再次落后的可能。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可能重构，原有的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禀赋和价格优势可能不再有经济意义，金砖国家的经济地位和发展潜力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三）金砖国家之间合作基础不稳固

尽管金砖国家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存在，金砖国家内部合作的基础并不稳固，合作平台建设任重而道远。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仍有待解决。

1. 金砖各国合作所依赖的经济一体化基础比较脆弱

欧盟国家的经验证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决定了区域合作的程度。而金砖国家从地理空间上看，分布在亚、非、拉美、欧四大洲，一体化程度不可能像欧盟那样紧密。而且，各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还是外延型的，而不是内涵式的发展，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比较突出，缺乏可持续性动力。

由于各国处于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合作的互补性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式相似，经济对外依赖性强，同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面对着相同

的发展诉求，利益争端也屡见不鲜。例如，中国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生产效率的优势，使中国产品在巴西市场上屡屡遭到巴西的反倾销调查。另外，金砖国家在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上也争议不断。比如中国和巴西进行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国和俄罗斯就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谈判过程相当艰难。

2. 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

一个组织的发展依赖于其稳固的基础，而稳固的基础要求成员间地位基本平等。但在金砖五国中，存在多方面的不均衡、不平等。从经济总量看，中国一家独大，这也使得各国对中国始终抱有戒心。从人口看，中印最大且规模相当，远远超过其他三国。从国际影响力看，俄罗斯在政治领域仍是全球大国，中国在上升但实际影响力有限。从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看，巴西是介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国家，且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已有很多年；俄罗斯是从高收入国家滑落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很多方面保持着高收入国家的水准；中国是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不久的国家，正在努力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印度则处在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攀登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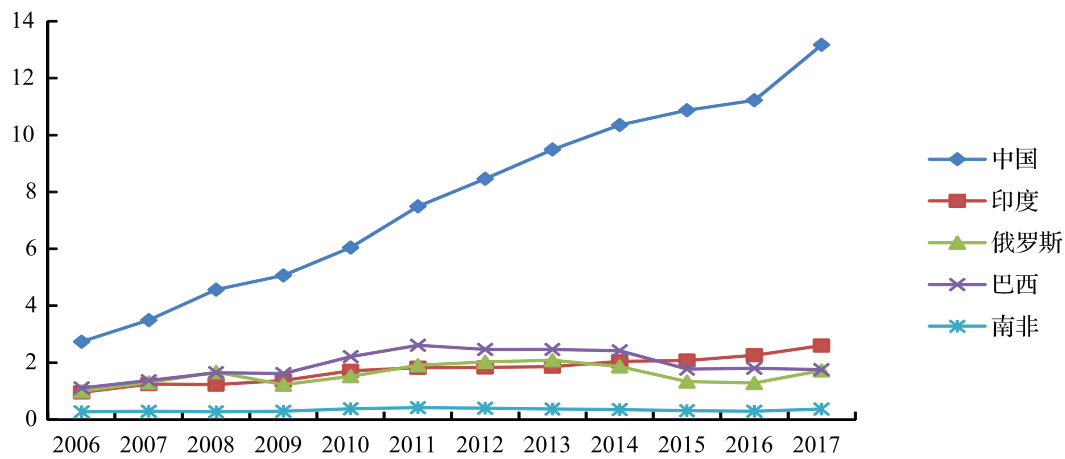


图 1 2006—2017 年金砖国家 GDP 规模走势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

此外，金砖五国虽然都称为新兴市场国家，但从二战以来的中长时间段看，其实在经济实力方面，中国和印度是上升型国家，俄罗斯和南非是衰落型国家，巴西是相对停滞型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态势，使得各国的国情、心态和政策存在较大差异，都给金砖国家合作增添了难度。

3. 内部政治关系复杂制约合作机制的完善

有别于以经济共同体形式出现的欧盟，和以政治联盟为目的的北约，金砖五国虽然有能力有意愿通过经济力量的联合，促进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提升，但成员间的利益分歧

会严重制约金砖国家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印度之间长期以来存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近期内也有事件发酵，目前看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还难以形成合力。例如，2017年6月18日，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边界线进入中国西藏自治区的洞朗地区，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该地区的正常活动，直至8月28日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洞朗事件持续两个多月。目前中印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政治互信基础薄弱，是制约金砖国家合作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中俄目前关系较好，但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也存在一些潜在矛盾。

各国对金砖国家概念和合作前景的认同度并不是特别高，投入的诚意不足。金砖国家间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相关合作平台不得不按照成分照顾各方利益和考虑方式进行，在制度建设上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例如，为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服务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的直接动因。世界银行自成立以来，其话语权由西方发达经济体操控，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正值基础设施密集投资的发展阶段，但难以从世界银行直接获取资金。金砖国家期待更多样化和有效的金融支持政策，这催生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为金砖各国大兴土木提供贷款。但在随后长达两年的谈判中，金砖各国的出资额及股权比例一直悬而未决。有美国在世界银行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前车之鉴，有的金砖国家担心中国资金实力一家独大而主导金砖银行，各国都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平等公平话语权、开放包容机制的新金融平台。最终金砖银行的出资额、股比、总部地点和人事安排是各方妥协下的一个产物，例如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各国等额出资、均等享有话语权等形式。但是这种按照国别平均分配的平等合作方式也损失了一部分效率，即平等与效率无法兼顾。在缺乏主导者的情况下，如何维持金砖银行高效运作将是一个新的挑战。

（四）金砖国家合作面临严峻外部挑战

1.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

金砖国家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10年的兴起，与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也是其影响力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但在国际金融危机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全球经济形势正在加速发生变化。经历了危机后的漫长衰退和调整，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正在出现明显复苏迹象。而且由于发达国家过去几年市场出清和结构调整更为彻底，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大潮中仍占据领先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开始试图夺回全球经济领导权。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应对经济挑战的平台，二十国集团（G20）的影响力开始显著下降，发达国家传

统合作平台七国集团（G7）的影响力则在快速恢复。由于发达国家全球治理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经验和成熟的机制，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具有明显优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新兴国际治理机制，很难与传统发达国家合作机制竞争。

此外，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明显的弱点，这就是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抗风险能力较弱。在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随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已逐步进入加息周期。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货币环境趋于紧缩，从而容易在新兴市场国家引发因资本回流发达国家而形成系统性的金融危机，金砖五国也不例外。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将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外汇应急基金等合作机制形成严峻挑战。

表 2 2008—2017 年金砖国家货币与美元的年末兑换汇率

国家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巴西	2.3	1.7	1.7	1.9	2.0	2.3	2.7	3.9	3.26	3.19
俄罗斯	29.4	30.2	30.5	32.2	30.4	32.7	56.3	72.9	66.65	57.60
印度	40.0	50.9	45.1	44.6	51.2	54.4	60.1	62.6	67.95	64.15
中国	6.8	6.8	6.6	6.3	6.3	6.1	6.1	6.5	6.94	6.52
南非	9.3	7.4	6.6	8.1	8.5	10.5	11.6	15.6	13.63	12.29

资料来源：《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6）》、wind 数据库。

2. 新的国际政治格局

随着中国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在显著上升。中美日益成为决定全球治理格局的主要国家，全球治理格局正在从美国一家独大，向中美共治的 G2 方向发展。由于美国不愿意退出其全球领导者地位，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又日益积极主动，双方的复杂博弈将对金砖国家合作等新兴治理平台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

例如，美国对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成立始终采取消极态度，试图阻止其盟友加入，直到最近才略有改观，但仍很难放弃遏制立场。在历史上，英美等发达国家历来擅长“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一贯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分化离间、制造矛盾的遏制措施，防止其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国际力量。因此，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未来也可能面临类似的阻碍和挑战。

二、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建设总体思路

（一）背景和出发点

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建设的总体思路，应从两个角度加以考虑。

一是从全球实力对比变化和治理体系改革的角度。金砖国家的人口总数占全球总人口近 50%，外汇储备占到全球的 2/5，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 1/5，而金砖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享有的投票额、话语权却极其不对称。虽然金砖五国普遍面临各种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但各国对合作的前景抱有充分的信心，并且积极共同寻求合作中分歧的解决之道。金砖国家机制不会走向衰落，仍然具有强大号召力和生命力。做专、做优、做强合作机制是金砖五国共同的意愿。金砖国家应进一步创新合作方式，丰富合作的内涵，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切实的福利。合作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探索新兴市场国家间战略合作互动，在合作机制建设中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在国际舞台上凝聚声音提高话语权。

二是从中国自身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际领导力的角度。对中国来说，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首先通过金砖国家平台引领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治理，然后通过金砖国家推动 G20 在全球治理当中的作用，再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这样的效果更好。中国通过引领金砖国家制度化建设在国际规则制定包括国际标准制定过程当中发挥作用，也是利用这一机制非常有效的做法。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目前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推进金砖国家合作要在这个顶层设计之下考虑。目前，金砖国家均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都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可以取代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后者仍然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主要在欧亚大陆和非洲，既包括大量发展中国家甚至贫困国家，也包括不少发达国家，带有更多的地缘政治色彩。金砖国家则主要以经济性质为聚合点，涉及全球主要区域的新兴市场大国。因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机制并不完全重合，可以发挥互补和协同作用。

另一方面，目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仅包括 5 个国家，相互联系较为松散，从国际合作实力来说也显得较为单薄。2017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指出：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合作平台，金砖合作的意义已超出五国范畴，承载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期望。金砖国家奉行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高度重视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下一步，如果能扩展成员国范围，将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都纳入，将会形成一股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目前，全球新兴市场国家还缺少自己的共同合作平台，还没有联合起来维护和促进自己的利益。金砖五国的合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开了个好头，从长期来看，完全有可能以金砖合作机制为基础，拓展为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平台，使我国成为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协作的引领者。

按照上述分析，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建设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一带一路”建

设总体外交布局下，与“一带一路”和 G20 等合作机制相互补充，逐步扩大规模，构建常设机构，丰富合作内容，加深合作程度，为建设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平台打下坚实基础。

（二）基本目标和方向

按照上述基本思路，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建设可以设定短、中、长期目标序列。其中，短期目标应该是健全现有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增强协调性和执行力；中期目标应该是在现有合作平台基础上拓展和延伸，搭建多层次、多领域的金砖国家多轨合作平台架构；远期目标应该是以金砖国家合作平台为基础，形成我国发起和引领的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平台。

在发展方向的选择上，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可以从联合国、欧盟、经合组织（OECD）和 G7 等国际合作平台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按照多轨合作的思路，打造综合性的合作平台架构，覆盖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主要领域，为成员国共同发展提供更有效的国际合作支撑。

美国学者戴蒙德和麦克唐纳在《多轨外交》一书中，以美国国际治理实践为基础，提出了由 9 个方面交流合作渠道构成的多轨外交体系，即官方正式外交、非政府专业人士、商业、平民、研究教育、社会行动、宗教、慈善、传媒。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建设，可以参考这一体系框架，以现有合作平台为基础加以构建。目前，金砖国家“一轨”合作平台已初具形态，下一步需要更加完善和制度化；“二轨”合作平台已有智库理事会等形式；“三轨”合作平台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工商理事会，都可以继续扩充完善；其他 6 个轨道的合作平台还基本上是空白，未来可逐步构建起相关合作机制。

金砖国家合作平台框架图：

一轨（官方正式外交）：领导人峰会，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宏观经济对话、财经对话等部级交流，友城等地方政府合作……

二轨（非政府专业人士）：智库理事会，政府前高官交流，政治、法律、经济、能源、卫生等专家论坛……

三轨（金融商业）：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机制等金融机构，工商理事会、能源资源等商业合作……

四轨（平民）：非盈利组织合作、志愿者活动、平民交流、体育竞赛、旅游……

五轨（研究教育）：高校合作、留学生培养、交换生，联合科技项目……

六轨（社会行动）：人权和犯罪预防、反对种族主义、民族团结、环境保护、妇女儿

童权益、养老、禁毒、少数群体权益……

七轨（宗教文化）：宗教对话、跨文化交流与对话、语言学习、艺术交流、出版合作、博物馆图书馆合作……

八轨（慈善）：公益基金会合作、卫生援助、发展援助、扶贫……

九轨（网络和传媒）：互联网治理及技术合作，新闻合作、新媒体交流……

（三）路径设计

金砖五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经济发展模式迥异且存在竞争关系，合作的道路注定充满考验。

新型公共产品和新的功能性合作项目应是金砖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路径。金砖国家通过合作提供国际型公共产品，在推动经济增长之外对全球做出更多贡献，这是国际体系的需求也是金砖未来能够持续存活和发展以及壮大的重要的立身之本。金砖国家之间要形成新的功能性的合作项目，这些项目能够实现金砖国家的共同获利，解决金砖国家相互之间因各种差异出现的金砖内聚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建设的基本路径应该是，以目前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关系为依托，从扩大经贸投资合作开始循序渐进推动平台建设，逐步构建多轨合作平台，条件成熟时推动设立秘书处，形成常设组织，形成更紧密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稳步扩大成员国规模，将合作平台从金砖成员国拓展到全球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金砖国家建设合作平台的路径，可以学习借鉴欧盟的经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始于法、德等欧洲大国的合作，最初的合作局限在煤钢联盟等具体经济层次，然后逐步拓展，覆盖欧洲主要国家和主要经济领域，再拓展到社会、政治等合作，最后推动全面的一体化建设。金砖国家虽然属于跨地区合作，与欧盟的区域合作存在较大差别，但基本的逻辑可以参考。可以借鉴欧盟、上合组织、OECD 等国际组织的经验，设立不同层次的成员资格结构，通过伙伴国、观察员等形式将新成员纳入合作范围。待条件成熟、原有成员国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将其正式纳入合作平台。

三、推进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建设的若干建议

（一）稳步构建多层次成员国体系

金砖合作机制始终秉持自愿协商、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对于有意加入的国家，可以按照伙伴国、观察员的方式，与金砖组织建立先期联系。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完善相应的体制，按照制度和标准吸纳新的成员。首先可以考虑把 G20 内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

为对话伙伴国或观察员，特别是应尽快吸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中等强国参与金砖国家合作平台活动，逐步构建多层次的成员国体系。

（二）循序渐进推动设立金砖国家秘书处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对是否应该设立秘书处一直有争议。目前，金砖国家合作主要还是非正式的，以论坛为主要形式，各国轮流担任主席国。未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应向更紧密的工作组织“进化”，我国应循序渐进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常设秘书处可作为未来远期目标，中期通过经济合作机制化加强平台基础建设，短期内保留论坛式运作方式。

短期内（2~3 年），金砖组织的论坛形式更有利于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尽管我国与金砖各国有较多共同主张，但也存在不少矛盾分歧。相较于 G7，金砖国家内部在历史渊源、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信仰方面的相似性和协同度都更低，内设永久机构的协调难度也更大。短期内采取灵活机动的运作方式有助于加强国家间沟通，能够实质推动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在中期（3~5 年），应该推动金砖国家向经济合作共同体机制演化，依据以领导人峰会为重点，以部长级会晤和专门高官会为抓手，智库年会等民间渠道为辅助的框架设计，凝心聚力找准利益契合点、高举战略共同点来推进务实合作，使合作平台进一步机制化和发展壮大。在这个过场中，可在经济合作基础上，在金砖国家财金秘书处设执行委员会“尝试落地”，主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副主任由成员国财政金融部门的副手担任并协助主任的工作，共同管理秘书处的运作，内容包括文稿起草、外事行政和要报整理等，以此作为未来金砖国家合作正式秘书处的基础，积累工作经验和人员储备。

在远期（5~10 年），机构的机制化程度随未来合作进展决定，适时推动设立常设秘书处作为处理日常事务的具体职能部门，综合协调各工作组的上传下达、会议文书的记录和整理、资料存档，以及领导人峰会共识的具体落实。金砖国家秘书处是金砖合作机制实质化的体现，能够克服金砖国家合作务虚较多、行动缺乏一致性的弱点。但秘书处的筹建设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规章制度、组织架构、人员安排、驻地选址、预算开支等内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三）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平台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合作

能否处理好与其他国际多边机构和区域组织的关系，是影响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发展前景的重要问题。从 G7 的运作模式可以发现，G7 一向注重与其他国际多边机构的对接和互动，并善于使 G7 峰会达成的共识摇身一变，转变为全球治理的指导方针和通行规

则。如果希望进一步完善金砖国家合作平台，扩大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可以考虑拓展金砖国家合作平台与相关国际机构平台的沟通渠道，积极寻求强化同其他国际组织的联络。

目前，金砖国家合作平台运作中已有一些与其他国际组织互动的尝试。例如，有些金砖国家峰会当值主席国曾邀请部分国家或机构组织成员一道参与峰会。2013年3月，南非举办德班峰会，主题为“金砖国家与非洲：致力于发展、一体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系”，开创了“金砖+非洲”会晤的模式；2014年7月的巴西福塔莱萨峰会则开启了“金砖+拉美”式的会晤；2015年7月的俄罗斯乌法峰会有“金砖+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2016年10月的印度果阿峰会有“金砖+环孟加拉湾经济技术合作组织”会晤。但这种合作模式尚不成熟，在通则共识和制度规范上还有待于探索。

下一步，可以推动建立“金砖+X”的对话合作机制，参会代表为金砖国家首脑以及各区域性组织的年度主席国或秘书处负责人，年会由金砖国家峰会轮值主席国委派相关机构承办，在合适时机将更多对象列入邀请名单。同时，随着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工作的日益完善，也可以委派金砖智库理事会或其他下设机构作为永久观察员，多方参与区域性多边组织的学术网络研讨会、技术转让和知识共享促进会、教育医疗合作等部分交流活动，共同就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探讨。

（四）加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

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合作最具实质性内容的平台，与各国需求最为契合，应作为未来金砖国家合作的基础性平台重点加以建设。

1. 为新发展银行运营营造良好氛围。相关国家权威媒体、经济学者和专家应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进行正面、准确地解读，重点解读“有益的补充”的角色和定位，是新型的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以及其份额相等、各国地位平等的深刻内涵，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新开发银行自身要设定合理的发展目标和方向，避免初始目标过高产生落差，形成不必要的压力，失去合理的发展环境。

2. 加强内部治理体系建设。新开发银行应形成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努力打造成拥有合理的股权比例、有效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良好风控机制的专业性机构。要引入具有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国际职业银行家与高端金融人才。要尽快公布章程等内部规则和未来工作计划，让世界更加了解其内部运行规则，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展业务的潜在受益者。尽快通过项目运行和落地，体现新开发银行的影响力和工作实效，以获得国际支持。

3. 进一步顺畅机构运作机制。要处理好内部成员的关系。中国作为该机构最大的经济体，要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个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循序渐进，避免其他国家不必要的顾虑，尽可能平衡好各国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国家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要处理好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秉承开放性的宗旨，与世行、IMF 等机构形成良性互动，发挥积极引导和有益补充的作用。

4. 进一步完善银行组织架构。可学习世界银行和我国国家开发银行的经验，在新开发银行下设置若干有功能区别的相对独立机构，分别完成不同的职能。如保险、担保、评级、项目咨询、债券发行等功能，都可设立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形成矩阵式功能实体结构，增强新发展银行对成员国提供开发性融资服务的能力。

（五）加强工商和智库等专业理事会建设

经济合作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应借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组织经验，拓展工商理事会的合作范围和形式。可考虑的选项包括：①组织金砖国家 CEO 峰会，与领导人峰会同时举行，促进各国企业家交流。②设立贸易投资委员会，负责研究交流金砖国家在关税、市场准入、标准、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调解、商务人员流动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③借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自贸协定，在工商合作基础上探讨建设金砖国家高标准自贸区的方案。

智库理事会是发挥金砖国家合作软实力的最重要平台，要借鉴 OECD 等国际组织的经验，对金砖国际总体发展情况、国别情况、合作情况等进行定期研究和评估，为各国政府改善治理和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定期合作出版发展展望、年度综述和比较统计资料等出版物，传播成员智库的智力成果。例如，《金砖国家经济展望》，评估成员国和主要非成员经济体的经济前景，提供比较指标和国家业绩评价；《金砖国家概况》，为经济研究与政策制定人员提供参考工具；《金砖国家经济调查》，提供单独的国家分析和政策建议。建立金砖国家智库与政府部门对话机制，促进智库研究成果向各国政策的转化应用。

（六）补足多轨合作平台短板

要针对目前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四轨”到“九轨”相对空白的现状，主动引导建立相关合作平台，补足平台短板。

在四轨（平民）平台方面，可考虑建立金砖国家非盈利组织合作论坛，鼓励开展各领域志愿者民间交流合作，组织广泛的平民交流活动，组织金砖国家运动会和体育交流，大力促进成员国民众的旅游交流。

在五轨（研究教育）合作平台方面，可考虑建立金砖国家高校合作机制，发挥各国

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的特长，加大留学生、交换生培养交流力度，开展联合科技研究项目。

在六轨（社会行动）合作平台方面，可考虑以各国社会组织为主体，开展人权和犯罪预防、反对种族主义、促进民族团结、环境保护、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养老、禁毒、少数群体权益保护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在七轨（宗教文化）合作平台方面，可考虑设立金砖国家宗教对话论坛、跨文化交流与对话论坛，推动各国相互学习语言文化，加强艺术交流、出版合作、博物馆图书馆合作等，促进金砖国家文化交流。

在八轨（慈善）合作平台方面，可考虑建立金砖国家公益基金会合作机制，加强卫生援助和发展援助，开展扶贫合作。

在九轨（网络和传媒）合作平台方面，可考虑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下设立金砖国家互联网治理及技术合作论坛，在相关领域进行密切合作。设立金砖国家新闻合作和新媒体交流机制，在国际舞台上客观传播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形象，共同发出积极声音。

参考文献：

1. 毕吉耀：《2016 年国际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中国投资》2016 年第 2 期。
2. 蔡春林、丁畅：《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强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对策》，《国际商务研究》2014 年第 9 期。
3. 陈文玲、李锋：《重塑金砖国家合作发展新优势》，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年版。
4. 黄仁伟：《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当代世界》2011 年第 5 期。
5. 黄薇：《金砖国家合作：基础、动力与进展》，《国际贸易探索》2014 年第 12 期。
6. 李向阳：《金砖国家发展之路如何延伸》，《当代经济》2011 年第 5 期。
7. 戴蒙德、麦克唐纳 [美]：《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8. 司文、陈晴宜：《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历程与前景》，《国际研究参考》2015 年第 7 期。
9. 郑新立：《加强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经济研究参考》2011 年第 49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 区域 经济 ·

三个维度看浙江

黄 勇 潘毅刚 郎金焕

摘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0000 美元以上的 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① 为比较对象，从高质量、均衡性、可持续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梳理浙江发展的优势以及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导向和工作着力点。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均衡发展 可持续性

作者简介：黄 勇，浙江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潘毅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处处长、副研究员；

郎金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高质量维度

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有很多，效益、效率是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指标。因此，笔者重点选择居民收入、企业利润和国家税收三个效益指标，以及工业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效率指标开展比较。

^①按照人均 GDP 排序，这 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是天津（17406 美元）、北京（17271 美元）、上海（17120 美元）、江苏（14361 美元）、浙江（12635 美元）、福建（11184 美元）、内蒙古（11171 美元）、广东（11034 美元）、山东（10245 美元）。笔者还在 9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GDP 接近或超过 1 万亿元的 8 个城市之间进行了比较，这些城市为广州、深圳、杭州、宁波、南京、苏州、无锡和青岛。

（一）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所在。目前，浙江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北京市和上海市，居全国各省区市之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北京市，居民经营净收入超过北京市和上海市，形成明显的领先优势。不过，也必须看到，近年浙江省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难度加大。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看（见表 1），浙江省居民收入领先优势明显。2016 年，浙江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国第三，比第四名天津市和第五名江苏省分别高出 4500 元和 6500 元，即使上述两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浙江省 2 个百分点，也分别需要 7 年和 10 年左右时间才能追上浙江省，其他省区市与浙江省差距则更大。

表 1 2016 年 9 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单位：元

	上海	北京	浙江	天津	江苏	广东	福建	山东	内蒙古
人均可支配收入	54305	52530	38529	34074	32070	30296	27608	24685	24127
与浙江省比较	15776	14001	——	－ 4455	－ 6459	－ 8233	－ 10921	－ 13844	－ 14402

数据来源：2016 年 9 省区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将居民收入分解为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大组成来看（见表 2），浙江省居民经营净收入已经是全国第一，但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都低于上海市和北京市，工资性收入差距最大，是浙江省居民收入低于上海市和北京市的主要原因。与其他 6 个省区市相比，浙江省居民不仅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四大组成也普遍较高，仅在转移净收入方面与天津市和江苏省分别存在 1400 元和 400 元差距。

表 2 2016 年 9 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组成 单位：元

	上海	北京	浙江	天津	江苏	广东	福建	山东	内蒙古
工资性收入	32718	33114	22207	20967	18664	19878	16042	14259	12969
经营净收入	1399	1396	6589	3165	4724	3748	5280	5470	5818
财产净收入	7684	8230	4337	3188	2880	2683	2622	1633	1369
转移净收入	12504	9790	5396	6752	5802	1549	3664	3323	3971

数据来源：2017 年 9 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浙江省居民收入城乡结构较为均衡（见表 3），农村收入领先是突出亮点。9 个省区市中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三，较北京市和上海市低 10000 元左右，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北京市，与排在第一的上海市差距不到 3000 元，达到其 87%的水平。

表 3 2016 年 9 省区市城乡居民收入情况 单位：元

	上海	北京	浙江	天津	江苏	广东	福建	山东	内蒙古
城镇居民	57692	57275	47237	34101	40152	37684	36014	34012	32975
农村居民	25520	22310	22866	18482	17606	14512	14999	13954	11609

数据来源：2016 年 9 省区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但必须看到，近些年浙江省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呈现下滑态势（见表 4）。2016 年，浙江省居民实际收入增速为 6.4%，低于山东（7.5%）、北京（6.9%）、福建（6.9%）、内蒙古（6.9%）和天津（6.8%）。按照 2017 年上半年浙江省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 6.6%，GDP 增速 8%推算，收入增速和 GDP 增速相背离的态势在拉大，保持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目标难度增加，值得关注。

表 4 2012—2016 年扣除价格因素后 9 省区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单位：%

年份	上海	北京	浙江	天津	江苏	广东	福建	山东	内蒙古
2012	8.1	7.4	9.0	7.6	10.0	9.4	10.2	10.8	10.9
2013	6.8	7.1	7.4	7.3	7.7	7.2	7.8	8.3	7.5
2014	5.9	7.2	7.4	6.9	7.5	7.2	7.8	7.8	8.4
2015	6.0	7.0	7.3	6.6	7.2	6.9	7.1	7.5	7.4
2016	5.5	6.9	6.4	6.8	6.3	6.3	6.9	7.5	6.9

数据来源：2017 年 9 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注：天津市和江苏省两地仅报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速，为统一口径，将两地名义增速减去当年当地居民消费价格增速，得到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的估算值。

（二）企业利润

企业利润是反映经济发展效益的主要指标。目前，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水平呈现分化态势，工业企业利润明显偏低，服务业企业情况较好。

工业企业利润方面，按照主营业务利润率（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总资产回报率（利润总额/资产总计）两个口径计算出 2016 年 9 省区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水平（见表 5）。从主营业务利润率看，由于央企数量较多，上海市和北京市远高于浙江省，福建省、天津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处在第二梯队，水平大致相同，但浙江省相对略低。从总资产回报率看，浙江省排名下滑至第七位，与前六位省区市差距基本在 1 个百分点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还存在低效或无效资产包袱。

表 5 2016 年 9 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单位: %

	上海	北京	福建	天津	江苏	浙江	广东	内蒙古	山东
主营业务利润率	8.45	7.98	6.79	6.74	6.67	6.62	6.30	6.27	5.76
总资产回报率	7.20	3.73	9.01	8.80	9.21	6.43	7.66	3.56	8.25

数据来源：2017 年 9 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偏低，说明浙江省企业生产效率仍有待提高。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产销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看（见表 6），浙江省排名靠后，尤其是工业增加值率排名第八，全员劳动生产率排名在最末。浙江省工业部门转型升级任重道远，也至关重要。如果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能达到江苏省的水平（21.9%），工业增加值就将提高 1100 亿元，这相当于 2016 年浙江省 GDP 的 2.36% 的增量空间。

表 6 2016 年 9 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若干指标情况

	内蒙	天津	广东	福建	上海	江苏	北京	浙江	山东
工业增加值率（%）	33.0	24.6	24.5	23.9	23.0	21.9	20.7	20.3	17.2
产销率（%）	96.40	97.70	96.79	96.36	99.90	98.34	99.08	97.49	—
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	—	23.2	26.2	31.8	31.9	36.5	20.7	38.7

数据来源：2017 年 9 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注：“—”表示相关数据未披露。

服务业企业方面，由于部分地区未披露服务业企业利润情况，因此笔者主要比较了浙苏粤 3 省情况以及杭州市与 4 个一线城市（见表 7）。其中，5 个城市之间，杭州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已经超过广州市和深圳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超过上海市。3 个省份之间，浙江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率高于江苏省但低于广东省。同时，也可以看出，浙江省有 94% 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来自于杭州市，在省域内极不平衡。

（三）国家税收

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稳定器”，也是发挥政府积极有为作用的财力保障。从 9 省区市比较看，浙江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匹配度较高，尤其是杭州市和宁波市两大城市正在崛起。从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看，浙江省在全国排名第五，前四位分别是北京

市、上海市、天津市和广东省；从人均税收贡献度看，2016 年浙江省常住人口每人贡献 1.55 万元税收，在全国排名也是第五。两个口径计算出的税收实力，与浙江省在全国的人均 GDP 水平位次相当（见表 8）。

表 7 2016 年若干省区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情况

	北京	上海	杭州	深圳	广州	广东	浙江	江苏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28550	14254	5986	6611	6355	16470	9237	11130
利润总额（亿元）	7244	1866	1344	1317	854	2882	1427	979
主营业务利润率（%）	25.4	13.1	22.45	19.92	13.44	17.5	15.4	8.8

数据来源：2016 年 9 省区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 8 2016 年 9 省区市税收收入情况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东	浙江	江苏	福建	山东	内蒙古
税收收入/GDP（%）	50.1	43.1	19.2	24.4	18.7	15.9	12.8	12.4	10.5
地税收入/GDP（%）	14.4	19.0	9.1	8.3	7.6	6.6	5.6	6.3	5.3
人均税收贡献（万元/人）	5.74	4.90	2.19	1.77	1.55	1.51	0.94	0.83	0.78

数据来源：税收收入数据来自 2016 年 9 省区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地税收入数据来自 9 省区市的地税局网站。

表 9 2016 年 8 大城市税收收入相当于 GDP 比值比较

	深圳	杭州	南京	宁波	广州	苏州	青岛	无锡
税收收入/GDP（%）	34.3	21.1	21.3	23.4	22.7	19.6	19.3	15.0
地税收入/GDP（%）	12.8	8.9	8.0	7.6	6.9	6.9	5.9	5.6

数据来源：税收收入数据来自 8 个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地税收入数据来自 8 个城市地税局网站。

从税收分布的地区结构看，所在省份城市经济规模大小决定了区域税收实力。分析 9 省区市中 GDP 总量接近或超过 1 万亿元的城市表现出的税收实力（见表 9），深圳市处于第一梯队，杭州市、宁波市、广州市和南京市处于第二梯队，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均在 21%至 23%之间。考虑到广州市和深圳市的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较多，^① 可为当地提供大量税收，但本身是国家布局的结果，不具可比性。为此，笔者用地税收入占 GDP 比重进行比较，深圳市仍然排名第一，但杭州市升至第二，比广州市高出 2 个百分点，宁波

^①例如，深圳的深交所和招商局，广州的南方电网和南方航空等，都是大型金融机构和央企。

市排名第四。

二、均衡性维度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显著缩小，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以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这三个反映城乡平衡、区域协调和人群阶层公平的指标来度量发展均衡性。

（一）城乡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被广泛用来衡量城乡差距，它等于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目前，浙江呈现“高水平基础上高均衡”的良好态势。

2016 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 2.07（见图 1），比天津的 1.85 略大，其他省市区均在 2.2 以上。需要说明的是，天津市的城乡收入倍差较小，主因在于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相较而言，浙江省在较高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好的城乡均衡，含金量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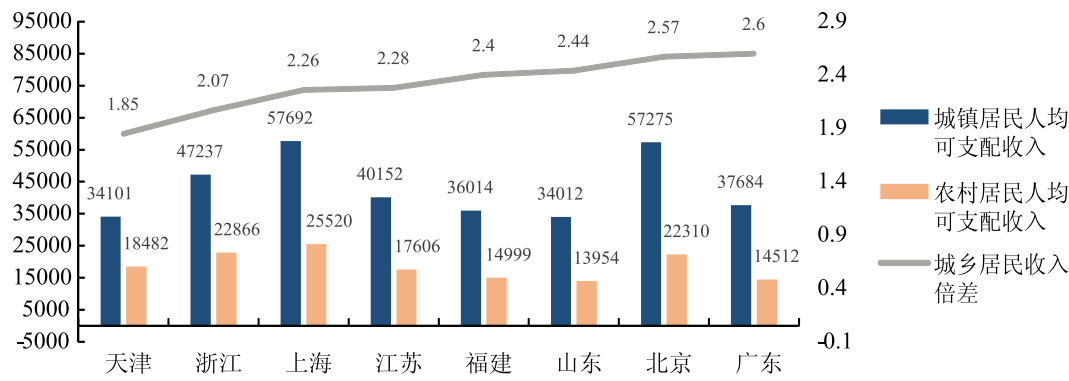


图 1 2016 年 9 省区市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数据来源：2016 年 9 省区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 9 省区市中 GDP 总量接近或超过 1 万亿元的城市看^①（见图 2），目前宁波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最小（1.8），杭州市也在 1.9 以内。杭州市和宁波市实现高水平城乡均衡的主因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如杭州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别高出 5600 元和 2400 元，宁波市分别高出 6200 元和 3000 元。

^①深圳市没有农村户籍，不存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其情况特殊不做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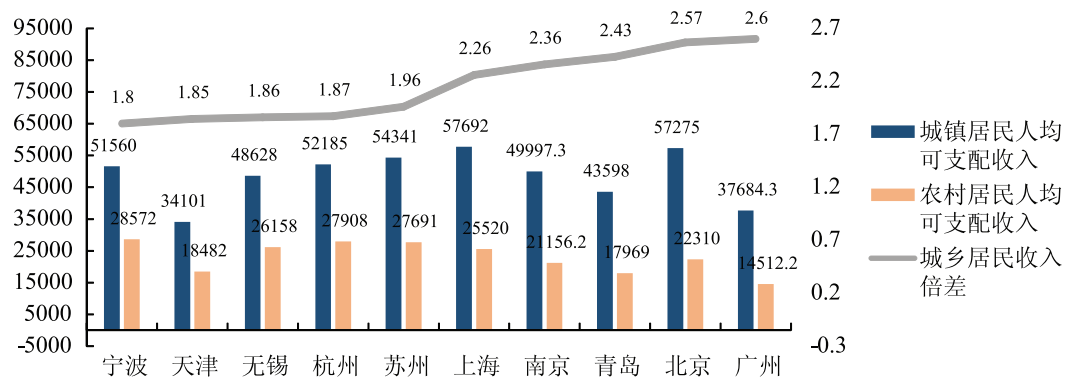


图 2 2016 年主要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数据来源：2016 年相关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区域差距

区域居民收入倍差被广泛用于衡量区域差距，该指标是指在某个省区市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两个市（或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目前，在 9 省区市中浙江省的区域差距最小。

从区域居民收入的绝对倍差看（见表 10），^① 浙江省是唯一一个保持在 2 以下的省份。浙江省区域居民收入倍差较小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两个地区（衢州市和丽水市），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其他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地区。^②

表 10 2016 年 7 省区市的区域居民收入的绝对倍差

	浙江	福建	山东	江苏	内蒙古	北京	广东
区域居民收入绝对倍差	1.72	2.06	2.28	2.45	2.42	2.46	3.03

数据来源：2017 年 7 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区域居民收入的绝对倍差是区域居民收入的极大值和极小值之比，仅依据两个地区的收入情况考察区域差距，容易引起结论失真。为此，笔者选择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和福建省 4 个数据比较完备的省份，计算了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③ 衡量区域

① 由于上海市和天津市没有公布各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笔者在剩下的 7 个省区市之间进行比较。

② 2016 年，浙江省衢州市和丽水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67 万元和 2.68 万元，江苏宿迁市、广东河源市、福建宁德市、内蒙古兴安盟、山东菏泽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90 万元、1.60 万元、2.10 万元、1.55 万元和 1.57 万元。

③ 泰尔指数（Theil index）的计算公式为 $T = \sum_{i=1}^N \frac{P_i}{P} \log \frac{\bar{y}}{y_i}$ 。其中， P_i 为区域 i 的人口总数，P 为总人口， y_i 为区域 i 的人均收入， $\bar{y}$ 是总体人口的平均收入。根据定义，T 值越大，则地区间收入差距越大。

居民收入的相对倍差。该指数有两个好处：一是它衡量了不同地区相对于区域居民平均收入的差距，避免了个别地区居民收入极高或极低而出现收入差距失真的情况；二是它用人口占比对收入进行加权，避免了个别人口数量偏低的地区对区域收入差距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经过计算，目前浙江省泰尔指数在浙苏粤闽 4 省中仍然最小（见表 11）。不过，计算中也发现，由于人才持续流入，杭州市与全省其他地区的差距正在持续拉大。这表明在高水平发展之下，绝对意义的区域均衡并不存在，浙江省进入了区域差距相对持平或扩大的阶段。

表 11 近年苏浙粤闽四省的区域收入差距泰尔指数

年份	江苏	浙江	广东	福建
2015 年	0.0191	- 0.0124	0.0449	0.0077
2016 年	0.0178	- 0.0243	0.0342	0.0083

数据来源：2017 年 4 个省份的《统计年鉴》。

（三）贫富差距

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地区的贫富差距，但是由于在我国很难精确获得各收入水平居民在总体居民中所占比例，所以用这个系数衡量中国的贫富差距存在难度。鉴于此，笔者使用城镇和农村居民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前 20%与后 20%的两类人群的收入倍数，^① 衡量贫富差距。计算表明，表列 7 省区市中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阶层差距较大。^② 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4.66，高于北京市和上海市；农村居民贫富差距 6.04，不仅高于北京市和上海市，也高于广东省和福建省（见表 12）。

表 12 7 省区市两类人群的贫富差距

	上海	北京	浙江	广东	福建	江苏	内蒙古
城镇常住居民	4.05	4.43	4.66	4.75	4.86	5.57	5.81
农村常住居民	3.32	4.3	6.04	5.1	5.4	6.29	8.2

数据来源：2017 年 7 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三、可持续维度

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广泛，本文的分析中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主要体现为“三有”：即经济发展有后劲，创新活动有支撑，资源环境有保障。

^①由于目前部分省区市尚未公布 2016 年分组收入数据，这里采用 2015 年数据进行讨论。
^②由于天津市和山东省没有公布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所以笔者在剩下的 7 省区市中进行比较。

（一）投资回报率

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决定了一个行业和区域对资本要素的吸引力和经济发展的潜力。笔者用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衡量投资回报率。这个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地区生产总值（GRP）增量与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① 也就是单位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形成的产出。近年来，9 省区市的投资回报率都在下降（见表 13）。目前，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排名第五，但是与上海市、北京市和广东省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按照 4% 的资金成本和 5% 的折旧（即 20 年折旧期限）计算，当前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每投入 1 元钱，一年的净回报为 0.037 元，^② 而上海市、北京市和广东省分别为 0.205 元、0.12 元和 0.104 元，差距巨大。

表 13 2012—2016 年 9 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年份	上海	北京	广东	江苏	浙江	天津	福建	山东	内蒙
2012	0.342	0.250	0.285	0.173	0.137	0.162	0.176	0.134	0.072
2013	0.276	0.246	0.224	0.138	0.131	0.089	0.126	0.097	0.004
2014	0.389	0.272	0.255	0.142	0.148	0.128	0.140	0.094	0.046
2015	0.294	0.223	0.197	0.128	0.128	0.136	0.113	0.105	0.098
2016	0.295	0.210	0.194	0.130	0.127	0.120	0.113	0.105	0.093

数据来源：2017 年 9 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二）创新支撑力

创新是一件风险概率较大的事件，今天的研发投入决定了明天创新成功的概率大小。我们用研发投入强度和人才数量衡量创新发展的潜力。从两个指标比较情况看，目前浙江省在这两方面的竞争优势都不够强。

浙江省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落后（见表 14）。2016 年，浙江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 9 省区市中位列第六（2.43%），较人均 GDP 水平落后一位。特别是，与江苏省和广东省相比，浙江省研发投入强度虽然分别仅相差 0.23 和 0.13 个百分点，但是换算成研发投入绝对值，差距达到 900 亿元左右，相当于少了两个半杭州市的研发投入，日积月累的影响不容小视。

^①考虑到固定资产从投资到产出需要一段时期，计算一般滞后 3 年。用 2016 年各省区市的 GDP 增速外推 2017、2018 年各省区市 GDP，可得 2016 年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2018 年 GDP 增量/2016 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量。

^②即浙江省 2016 年的投资效果系数 0.127 减去 0.04 的资金成本和 0.05 的折旧后的值。

表 14 2016 年 9 省区市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

单位：%

	北京	上海	天津	江苏	广东	浙江	山东	福建	内蒙古
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	5.96	3.82	3	2.66	2.56	2.43	2.34	1.59	0.79

数据来源：《2016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笔者以 9 省市区中主要城市的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来进一步衡量区域创新支撑力（见表 15）。考虑到北京市和上海市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大科学装置较多，其研发投入强度具有不可比性，笔者选择了 8 个 GDP 总量接近或超过 1 万亿元的城市进行比较发现，目前深圳市的研发强度最高，其次是杭州市和宁波市表现出较强的研发投入水平。

表 15 2016 年 9 省市区主要城市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

单位：%

	北京	深圳	上海	杭州	宁波	南京	天津	无锡	苏州	青岛	广州
研发经费/GDP	5.96	4.1	3.82	3.1	3.1	3.05	3	2.82	2.7	2.63	2.3

数据来源：北京和上海的数据来自《2016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其他城市数据来自 2016 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人才数量看，浙江省人才竞争面临巨大挑战。用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衡量人才存量的质量，用普通高校在校生占比衡量人才增量的质量。总体看，浙江省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人口占比达到 15.1%，仅次于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三个直辖市；但浙江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占比为 1.79%，在 9 省区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内蒙古自治区（见表 16）。人才的存量数据和增量数据结合起来说明，浙江省是人才流入大省但不是高教大省。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掀起“抢人大战”，积极出台政策留住本地培育的人才，在这个背景下没有强大高教资源支持，浙江省人才流入将面临巨大挑战。

表 16 2016 年 9 省区市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

单位：%

	北京	上海	天津	浙江	江苏	福建	内蒙古	山东	广东
存量占比	38.15	27.13	22.85	15.1	14.28	11.69	10.89	9.82	9.38
增量占比	2.78	2.12	3.32	1.79	2.15	1.98	1.68	1.93	1.71

数据来源：2017 年 9 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三）环境承载力

有大量指标表征环境承载力。根据国家环境统计公报，近年受到全社会关注的环境指标主要是水、大气和土壤。由于土壤情况与区域性地理地貌有关，可比性不强，所以

主要比较 9 省区市水资源和大气的承载水平，分别用国控断面劣 V 类水比例和 PM2.5 年均浓度进行衡量。9 省区市中福建省的环境承载力最好，水质量和空气质量都比较高，浙江省 V 类断面比例排名第二，PM2.5 年均浓度排名第四，总体处于中上水平（见表 17）。

表 17 2016 年 9 省区市的两类环境承载力情况

年份	天津	北京	上海	内蒙	山东	广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劣 V 类断面比例（%）	50	39.9	34	25.5	9	8.5	4.5	2.7	0
PM2.5 年均浓度 （微克/立方米）	69	73	45	35	66	32	51	37	26

数据来源：2017 年 9 省区市的《环境统计公报》。

四、几点思考和启示

通过 3 个维度 9 类指标，把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 9 省市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总体看，浙江省的发展质量、均衡性和持续性均处在全国领先水平。尤其有 7 类指标排在全国前五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均衡和区域均衡等方面已经超过北京市和上海市，这是最大亮点。同时，在 9 省区市中 GDP 总量接近或超过 1 万亿元的 8 个主要城市里，杭州市和宁波市的 9 类指标均走在前列，崛起势头引人注目。

不过，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到，浙江省在发展中表现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于以下四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工业现代化发展不充分，工业增加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偏低，导致工业企业利润回报水平相对较低。二是创新研发投入强度和人力资本投入力度落后于创新强省发展要求，与兄弟省市差距不小。三是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走低，且明显低于同期的兄弟省市。四是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居民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值得引起重视。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浙江省在省域经济治理上有必要进一步在以下三方面凝聚新共识、部署新行动。

一要加强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前，浙江省工业企业效益较低，归根结底还是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问题。目前，浙江省产业结构面临两大挑战：其一，传统产业低端化路径锁定；其二，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被俘获。这二者的结果，必然是效益不佳。这也表明，要走出效益困境，浙江省必须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倒逼低效企业加快转型，淘汰僵尸企业，推动新一轮企业兼并重组和创新转型，并鼓励各地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壮大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生产性服务投入，努力走向“微笑曲线”两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则主要是因为近些年浙江省社会资本投资比重有所下降，尤其是产业投资占比、民营企业投资占比下滑比较突出。因此，提升投资效益、效率和质量，进一步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让社会资本成为投资的主动力量，保持社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处在主导性地位，是宏观效益、效率提升的根本动力所在。

二要加大创新研发、人力资本和高等教育三大投入，着力用软性投入提升发展硬实力。经验和现实表明，发展硬实力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依靠发挥人力资本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是浙江省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关键时期，必须超常规加大创新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强度，加大高等教育和基础性研究投入，这也是中长期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的“华山一条路”。下一阶段，应按照“四个强省”工作导向，以沪嘉杭创新大走廊为重点，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通过部署科学大装置、内育外引高水平高等教育、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发展科技创新基金和风险资本、鼓励大中型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等手段，强化创新服务，创新人才政策，加强人才住房等保障，把浙江的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拉回到兄弟省市“同一起跑线”上。

三要保持城乡、区域和人群间三大收入均衡优势，努力探索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路径。共同富裕是现代化应有之义，也是浙江省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要坚持藏富于民的方针不变，在保持居民收入国内领先、区域之间相对均衡的基础上，继续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实施新一轮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不断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要高度关注居民阶层差距扩大趋势，打好全面小康脱贫攻坚战，通过鼓励创业、收入分配二次调节、社会保障和教育公平等综合性手段，重点增强中低收入阶层人群和刚脱贫困难人群内生发展能力，防止在高水平发展条件下形成阶层固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创造更多浙江经验。

参考文献：

1.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区域所课题组：《我国地区比较优势研究》，《管理世界》2001年第2期。
2. 曾磊、雷军、鲁奇：《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区域比较分析》，《地理研究》2002年第6期。
3. 李晓钟、张小蒂：《江浙区域技术创新效率比较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7期。
4. 黄春松：《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与海西经济区的城市竞争力综合比较——基于因子分析模型的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
5. 潘毅刚、于蕾：《正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五大差距——浙江与广东、江苏、山东高新技术产业

业发展差距及原因分析》，《浙江经济》2013 年第 6 期。

6. 黄勇、潘毅刚、施纪平：《全球竞争背景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布局的战略思路——基于浙粤苏鲁四省的比较研究》，《全球化》2013 年第 8 期。

7. 黄勇、江振林、潘毅刚：《如何衡量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进程》，《浙江经济》2014 年第 10 期。

8. 廖筠、赵真真：《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比较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50 页)

参考文献：

1. 曹春苗：《中国企业在湄公河次区域投资环境履职问题及其建议》，《东南亚纵横》2014 年第 2 期。

2. 董战峰、葛察忠、王金南等：《“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战略实施框架》，《中国环境管理》2016 年第 2 期。

3. 国冬梅、王玉娟：《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研究及建议》，《中国环境管理》2017 年第 3 期。

4. 范纹嘉、袁钰、曹子靖：《开展绿色供应链国际合作 助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生态文明》2017 年第 3 期。

5. 环保部：《“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资源再生》2017 年第 5 期。

6. 程翠云、翁智雄、葛察忠等：《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思路与重点任务——〈“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解读》，《环境保护》2017 年第 18 期。

责任编辑：李 蕊

深圳：新时期推进社会改革和 社会治理创新的排头兵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李罗力

摘要：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最直接围绕广大群众利益的社会领域和民生领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个新的里程碑。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在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依然走在全国前列。首先，深圳在民间第三方机构监督政府以及政府自觉接受监督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其次，深圳在抓民生实事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第三，深圳在抓基层社会改革、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

关键词：社会改革 社会治理创新 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李罗力，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创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资深专家。

一、党的十八大后中国改革不断深入的新的重大标志

（一）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的社会改革滞后和社会矛盾尖锐形势十分严峻

众所周知，自 1978 年开始，直到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奇迹：从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在不到 35 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进出口贸易第一大国，也成为世界最大的引资国和最大的单一市场。同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 39.6 倍，在国家富强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且普遍的提高。

但是在国家经济不断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严峻的社会矛盾：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把 GDP 增长、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放在首位，而忽略了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的重任；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对于最贴近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如住房、医疗、教育等），采用了过度市场化的解决办法，忽视了政府对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服务，造成了广大民众买房难、就医难和入学难；此外，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完全真正惠及普通百姓，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加之当时日益严重的腐败风气和权钱交易，使得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严重挑战，引起广大群众的反感和不满，仇富仇官心理日渐显露。

（二）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党的十八大后改革的重要任务和根本方向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不但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而且把“为民理念”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融入各项治国理政活动之中，推出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大力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将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最直接围绕广大群众利益的社会领域和民生领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化改革的另外一个鲜明特点是，特别强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坚决根除党内和社会严重的腐败风气，根除权钱交易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通过深化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使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同时，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还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 2020 年中国要实现的伟大战略目标。全面小康，意味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必须要惠及全体人民，要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得到全面发展。因此，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就必须全面深化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非如此，就不可能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百姓；非如此，社会的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改革和创新活力；非如此，就不可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也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大力推进依法行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一大批基层矛盾纠纷纳入法治轨道并加以妥善解决，“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进一步形成。

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又对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九大报告指出，党在新时期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必须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民主意识，发扬民主作风，接受人民监督，当好人民公仆。要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进入新阶段，成为新时期改革出现突破和不断深化的一个新的重要标志

正是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与强力推进下，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迅速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民政部为例，2014年1月，民政部首次在全国推广“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将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天津市和平区，上海市徐汇区、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广州市越秀区、南沙区，深圳罗湖区、坪山新区等全国31个城市的城区确认为第一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实验的时间从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为期三年。实验的内容则完全从贴近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现实社区状况的实际出发，来实验和探索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众所周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由中央政府确定和推广的所有实验区，完全都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类型的实验区，如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区等等。党的十八大后，才出现了以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为主题的“实验区”。这不能不说是十八大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

亮点，也是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民政部推出“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政策措施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各地政府都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大政方针下，积极行动起来。由此，民政部自 2015 年开始，在全国评选“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对于各地在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优秀典型进行表彰和鼓励。以 2015 年 5 月 4 日揭晓的第一届“2014 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为例：南京市推行了“六个一”的街道中心化改革；深圳市罗湖区通过“活化赋权”确立了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地位；济南市市中区积极推进社区事务“三议两公开”；厦门市同安区打造了社区治理微型“闭合系统”，激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热情；天津市和平区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构建了社区“十大服务体系”；大连市西岗区创建了 365 工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为社会和居民提供服务；上海市杨浦区以“社区睦邻中心”建设为抓手，有效整合了公共服务设施资源；杭州市上城区以社区需求发现为内驱力，助推了社区社会组织成长；成都市武侯区“三社联动”社会化参与机制建设；武汉市武昌区“三社协作”社区治理创新等。这些优秀的典型都获得了民政部的通报表扬。

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所推动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理念，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所制订的相关重要政策，开创了全国各地在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局面。为中国的改革带来了新的发展气象，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带来了新的突破和深化，也带来了新的改革硕果。

二、深圳市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一）深圳市在民间第三方机构监督政府以及政府自觉接受监督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洪基金会及其所开展的“政府工作民间评价金秤砣奖评议活动”。马洪基金会全称为“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是由位列 25 个国家高端智库之一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于 2011 年发起成立的。自成立开始，马洪基金会就把“政府工作民间评价”作为自己的主要定位和根本使命。作为迄今为止全国首创的对政府工作开展民间评价的第三方社会智库机构，马洪基金会所开展的“金秤砣奖评议活动”，也成为迄今为止在全国已产生重大影响的独一无二的第三方民间机构评议政府的活动。

马洪基金会的“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是从 2014 年开始的，首先是选择了对深圳市 40 余个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白皮书”进行评价。当时，深圳市政府各个部门每年都要以“公共服务白皮书”的形式向社会承诺为公众实施的公共服务项目。这也是深圳市政府在

全国政府改革的“首创”之举。但这些“白皮书”向社会所承诺的公共服务项目兑现了没有？实施得怎么样？却并没有社会机构对其监督和评价，基本上都是政府“自说自话”。于是马洪基金会将对此的评价作为自己开展政府工作民间评价的一个切入口，且采用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式，即“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所谓“秤砣奖”，取自“天地之间一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金秤砣奖”就是对做得最好的单位所给予的奖励称号，其次是“银秤砣奖”“铜秤砣奖”，做得最差的单位将被评为“纸秤砣奖”。为了组织好这个评议活动，马洪基金会独创了一套评估办法，从网络搜索数据到政府部门自报自评，从公众满意度调查到媒体提供专项跟踪信息，构建了一整套的评估基础信息和数据，最后又邀请近百名社会专家，根据上述基础信息数据，现场对各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白皮书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估打分，几十家媒体进行现场采访，当场公布评分及获奖名单，次日在报纸发布评奖结果。

第一次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成功举办后，立即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轰动，不仅深圳市的媒体，还有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国内许多主流媒体都对此广泛报道、大加赞赏。此后，马洪基金会每年举办一次深圳市政府金秤砣奖评议活动。且自第三届起，马洪基金会将评议政府的方向改为按照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对深圳市政府各个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进行评议。不仅如此，2017年马洪基金会还将“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扩展到整个广东省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政府。同时，从2016年开始，马洪基金会联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对中国31个省区市和32个中心城市政府的财政民生支出水平进行评议。从2018年起还将开始对中国31个省区市政府的政务公开水平进行评议。

总之，马洪基金会作为社会第三方机构，汇聚民间力量，评价和监督政府工作，不仅更好地推动了政府信息进一步透明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推动了政府不断向服务型政府和阳光型政府转型，而且加强了公众对政府社会监督的力度，建立了政府与社会公众间良好的沟通渠道，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是落实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有关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精神的重要行动。马洪基金会这种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创举，在全国发挥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要特别说明的是，深圳市政府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努力改进政府工作方面同样走在全国前列。在马洪基金会刚开展这项活动时，向深圳市各政府部门依申请将其完成白皮书的信息进行公开，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理解。当时深圳市43个部门只有26个部门回复了马洪基金会的依申请公开函，尽管如此，回复的部门也占到市政府部门总数的60.5%。这说明深圳市大多数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第三方机构首次开展的民间评议活

动，给予了相当地理解、响应和支持。

第一次金秤砣奖评议活动结果公布并经媒体报道后，评议活动的效果立即显现出来。获得金秤砣奖的几个政府部门都在部门官网的头条位置贯以横栏标题，喜称本单位被社会评为最佳公共服务单位，是本单位的极大荣誉。而被评为纸秤砣奖的单位的领导，则受到很大震动，引起高度重视，立即开始部署整改工作。随着后来每个金秤砣奖评议活动的不断深入，影响不断扩大，现在深圳市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对这项民间评议活动给予了越来越高度的重视和越来越有力的支持。

以 2018 年开展的第五届深圳市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评议活动为例，作为评议对象的 40 个政府部门（10 个区和 30 个政府职能部门），有 39 个都在法定时限内回复了马洪基金会的依申请公开函，40 个部门全部在法定时限内回复了马洪基金会组织 20 位社会智者通过线上向各政府部门发出的 115 份依申请公开函，并且为了更好地向智者回函，这些政府部门与马洪基金会项目组进行了 100 多次电话沟通。评议活动的结果公布后，获得金、银秤砣奖的政府部门都参加了颁奖仪式，并由区委常委或职能局副局长等代表发表获奖感言，感谢马洪基金会所做的这项督促和鞭策政府部门改进并提高工作水平的举措，纷纷表示要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更好地开展工作、实现政府转型。深圳市政府这种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观念和行动，在国内各省市实属罕见。

（二）深圳市在抓民生实事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深圳市政府在抓民生实事方面创造了许多先进的经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深圳市福田区在 2014 年首创的“民生微实事”项目。近年来，中央号召基层政府要做好“民生实事”项目，但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这些“民生实事”的选题、经费安排和具体实施基本都由政府决定，而且往往是只抓动辄几百万的大项目，不能有效解决最直接关系居民群众生活利益的诸如小广场、小公园、小井盖、小台阶等小项目。结果是，基层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实施很多民生实事项目，却始终无法最大限度满足百姓的民生诉求。

对此，深圳市福田区委区政府经过广泛民意调研，决定从 2014 年开始，创新推出“民生微实事”改革项目，政府定向拨付专项经费，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办理机制，让老百姓自己讨论决定钱怎么花、事怎么办，实现“我的实事我作主”，使老百姓迫切需要、热切关注的民生小项目，以最佳途径落地、最快速度见效，并以此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激活居民自治，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治理发展。此项改革成为福田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2014—2015 年，全福田区共征集项目 2069 项，经过程序立项办理 1650 项，政府投入 8000 多万元，吸引社会投入近 2800 万元，涉及设施维护、环境改造、

技能培训、文化服务等群众迫切需要的各方面，“短平快”解决了百姓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赢得了居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福田区探索以“民生微实事”作为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立即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高度重视。2015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全面推广实施民生微实事指导意见》，总结推广相关改革经验，通过群众“点菜”、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快速解决社区居民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为了保障这些微实项目更接地气，更体现民意，深圳市政府的《指导意见》还规定，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和结果都要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所有项目坚持“三议三公开”。即项目由社区居民提议，街道办事处组织对这些提议项目进行商议，社区居民议事会按照议事制度进行决议；同时，项目决议结果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和评价公开。

福田区的“民生微实事”改革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14年9月19日，民政部主要领导在“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对该项改革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项目“把公益事业与社区居民自治结合起来”的做法很好，做到了执政理念的创新、动员机制的创新和运作机制的创新。2015年12月，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与中共中央党校、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社科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权威专家走访了福田区的社区、街道，对福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工作展开调研，认为福田区“民生微实事”改革等经验做法，为基层社会治理创出了一条创新之路、典型之路，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与此同时，该项目也得到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学习时报》《中国新闻》《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卫视》等媒体深入报道，人民论坛网、人民网、腾讯网等网络多方刊载。由此，“民生微实事”项目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各地参观学习络绎不绝、争相效仿。这充分说明，深圳在抓民生实事方面，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成为这方面改革和创新的排头兵。

（三）深圳市在抓基层社会改革、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自2014年民政部开始在全国建立“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推动全国城市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进入新阶段，全国各地都有社区治理的典型涌现出来，但是很少如深圳市这样，每个区委区政府都像抓GDP一样高度重视社会改革和社区治理，积极努力，你争我赶，甚至相互攀比，争相创新。10个区中除了大鹏新区外，其余9个区都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经验，都受到国家和广东省的表彰，都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这在全国各省市都是罕见的。

1. 罗湖区。罗湖区是深圳最老的城区。在 2014 年民政部公布的首届“中国社区治理创新十大成果”中，罗湖区就以“社区多元融合新机制”当选，并被命名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一年后，罗湖区“活化赋权，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典型经验再次获第二届“中国社区治理创新十大成果”，罗湖区也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连续两年获奖的单位。此后，罗湖区所创造的南湖街道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模式又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并被广东省民政厅确定为 2016 年度“广东省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2. 福田区。2014 年，福田区莲花街道等 4 个街道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2015 年，福田区又创造了“民生微实事”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引起全国高度关注，成为全国学习典范，同样被广东省民政厅确定为 2016 年度“广东省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此后，福田区又用大数据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营造社会治理“共建”新格局，把自己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又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 南山区。2014 年，南山区为了破除以往社区管理体制不顺、定位不清、职能重叠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身份、职责不明等积弊，对工作流程进行优化重组，创建了“一核多元”的社区治理模式，逐步实现政府依法治理、社会自我管理、居民自主自治的良性互动。由此构建了“定位清晰、各司其职、功能互补、和谐共生、共治共享”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与此同时，南山区还开始实行社区工作人员分类改革，对社区工作人员定性、定则、定员，创新薪酬体系、社保购买、上升通道、招录培训、退出机制，解决社区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优化社区队伍结构。南山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引起广泛关注，并以“南山区‘一核多元’率先优化社区治理架构”为题被媒体广泛传播。

4. 盐田区。2014 年 11 月，盐田区盐田街道永安社区等 12 个社区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此后，盐田区开始创建一种携手社会组织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他们根据盐田区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港口物流行业特别是集装箱运输行业矛盾集中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审时度势，运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念，重点培育发展社会治理、生态环保、公益慈善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整合社会组织资源，引导社会组织积极有序参与社会治理。使得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社会和谐、社区融合、生态环保、平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润滑剂”和“稳定器”的作用，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有力伙伴。2016 年，盐田区“构建政社合作伙伴关系”入选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十佳案例。2017 年，先后获得“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区”和“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项国字号荣誉。至此，盐田区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盐田特色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之路。

5. 宝安区。宝安区同样围绕更好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积极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宝安区不但在深圳市率先成立了驻社区党委和党代表工作室，而且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为目的的社区发展基金会，特别是探索形成了指导社区治理实践的“1+N/3PS”模式。其中，“1”是指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党的领导、群众主体和依法自治“三位一体”；“N”是指社区治理的多个影响因素和多条实现路径；“3PS”是指社区治理经历从多元主体培育到多元共治，再到多元自治的三个发展阶段。宝安区创建的这个新的治理模式，2017年9月18日被《人民日报》以“深圳市宝安区从居民需求出发创新社区治理”为题刊出，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6. 龙岗区。龙岗区在2015年推出了“民生大盆菜”项目，建立了“居民点菜、政府买单”的民生实事工作机制，实现了居民“我的实事我做主”，并在构建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民主自治、精准施策的基层治理体系方面做了有益探索。在制度层面上保证社区居民的“话语权”，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2016年，龙岗区的这个“社区民生大盆菜”社区治理创新项目，经过激烈角逐，入选了“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民政部在全国推介这项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成果。

7. 龙华区。龙华区原为龙华新区，经国务院批准，2017年1月7日正式挂牌成为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区对社区治理的改革，首先从基层党建开始。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的“神经末梢”，为了确保全区党建工作血脉畅通，龙华区积极推动基层社区党建全覆盖，在全部36个社区100%推行“社区综合党委+兼职委员”组织架构，建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89个、党代表工作室36个，全区基层综合党委组织多达621个。由此，龙华区获评首届“中国治理党建创新十佳”，受到中组部肯定。此外，龙华区充分发挥居民议事的自治作用，100个社区居委会100%组建了居民议事会，从“闭门议事”向“开放议事”转变，推行“罗伯特议事”等规则，真正实现了“群众有话有处说，社区有事有人管，社区事件社区解决”。同时，龙华区还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新模式，在全市成立第一家区级社会组织孵化服务中心，实施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并在全国率先推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与前置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从而构建了社会组织登记、培育、发展、扶持、壮大的全流程体系。如今，新区社会组织呈现井喷式增长，登记数较新区成立之初增长一倍。龙华区所创建的这种社区治理模式，被称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并被《深圳特区报》等主流媒体广泛传播。不仅如此，2016年7月，搜狐网又以“深圳市龙华区织网工程让深圳又走在全国前列”为题，报道了龙华区在深圳市迪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下，通过实施“织网工程”，将大数据的手段与方法引入城市治

理和社会管理领域。

8. 坪山区。坪山区原也为坪山新区，经国务院批准，2017 年 1 月 7 日正式挂牌成为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区 2014 年被民政部先后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和“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地区”，这是全国市级区域唯一同时获得这两个称号的区。坪山区荣获此项殊荣的原因是，在优化社区队伍人才结构上，出台了全国首个社会工作人才扶持办法，为分散在各个社区的社工人才建立业务培训、交流和考核的平台。此后，坪山区努力打造枢纽型社区服务平台，推动社区服务模式向非行政、多元化、专业化转变。2015 年 7 月，全国社区治理创新工作会议在福建厦门召开，坪山区作为唯一代表深圳市、广东省上台介绍经验的发言单位，介绍了“将社会力量引入社区服务，社区服务中心全覆盖”的社区治理创新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基于基层社区治理创新为基础的坪山新区社区建设，是深圳在新时期以改革创新精神为全国勇探新路的生动实践，具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意识。2016 年，坪山新区申报的“枢纽型社区服务平台建设”项目，通过激烈角逐，再获“2015 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奖。

9. 光明新区。光明新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社区基金会试点改革，为基层社区治理开辟了新的资金渠道。光明新区突破以往公益基金会不许社区冠名和 200 万元的门槛限制，在资金募集、项目运作、资金管理等方面，形成了符合基层实际的制度体系，为在全国推广设立社区基金会成功破题。社区基金会主要吸纳本地慈善资源，设计本地解决方案，让慈善资源更多地服务本土，让捐赠者自主决定善款使用。社区基金会得到辖区企业的大力支持，短期内就募集首批捐款 1470 多万元。2014 年 3 月 31 日，凤凰、白花等 5 个试点社区得到深圳市政府的正式批复和授牌。2014 年 4 月初，民政部专家组到新区调研，对社区基金会试点改革给予了“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和示范意义”的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深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已然走在了全国前列，并且正在不断地朝着这个重大的改革目标，继续大步迈进。

责任编辑：李 蕊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8年9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和专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WTO：下调 2018、2019 两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

世界贸易组织（WTO）2018年9月27日发布声明说，由于主要经济体间贸易冲突升级以及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紧，下调2018、2019两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将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预期从4月份预期的4.4%下调到3.9%，将2019年的增长预期从4.0%下调至3.7%。

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量相较2017年同期增长3.8%。其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总量分别增长3.5%和3.6%，进口总量分别增长3.5%和4.9%。从地区来看，2018年上半年北美地区出口量增长4.8%，成为全球出口增速最快地区；而亚洲则成为全球进口增速最快地区，进口量增长6.1%。

WTO认为，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可能造成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流出，这将给贸易带来负面影响。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尽管贸易增速仍保持强劲，但其下行趋势已反映出贸易冲突升级的影响，“对于政府来说，努力解决分歧、保持克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贸易战将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增长，全球无一地区能够幸免。警示灯已亮起。如果（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将对全球稳定、就业和经济增长构成更大威胁。阿泽维多呼吁相关国家坚定支持WTO，努力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以阻止贸易保护主义蔓延，防止贸易冲突升级，各成员应尽快就世贸组织改革达成一致。

（二）IMF：下调 2018、2019 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10 月 8 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2018、2019 两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3.7%，维持在 2017 年的增长水平，比 2018 年 7 月份的预测值下调 0.2 个百分点。

IMF 警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预计 2018 年发达经济体增速为 2.4%，其中美国经济增速为 2.9%，欧元区为 2.0%，日本为 1.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18 年增速为 4.7%，其中中国增速预期维持在 6.6% 不变。

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已经上升，同时由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势头减弱、金融状况收紧，世界经济增长强于预期的可能性已经下降。报告认为，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可能被削弱，这是经济前景面临的主要威胁。贸易壁垒的增加会破坏全球供给链，阻碍新技术传播，最终导致全球生产率和福利下降。更多的进口限制还会提高可贸易消费品的成本，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特别大的损害。

报告建议，为维护和扩大过去几十年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各国应开展合作，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在不增加扭曲性壁垒的前提下化解分歧。另外，还应通过合作完成金融监管改革议程，加强国际税收体系，提高网络安全性，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三）IMF：全球金融系统近期风险有所增加

IMF 在 2018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与 2018 年 4 月份发布的报告相比，全球金融稳定面临的近期风险有所增加，但金融状况总体上依然宽松，仍有利于近期经济增长。若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压力上升或贸易紧张局势加剧，风险可能急剧增加。

报告警告称，目前贸易争端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行业，如果市场参与者认识到贸易紧张局势将持续更久并重新定价，全球金融环境可能大幅收紧，这将加大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

报告指出，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面临的中期风险依然高企。多年来积累的一些问题可能因金融状况的突然急剧收紧而暴露。发达经济体主要的金融脆弱性包括非金融部门杠杆水平较高且不断上升，信贷发放标准持续恶化，以及一些主要市场的资产价格过高。而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外部借款继续增加，也面临外部融资风险和贸易紧张局势的冲击。

报告建议，为进一步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应完成金融监管改革议程，并避免

改革出现倒退。应当更加积极主动运用金融监管，以充分应对潜在系统性风险。同时，监管机构必须关注新风险，包括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等可能给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

（四）IMF：呼吁各国缓和并解决贸易争端

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2018 年 10 月 1 日为 2018 年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的揭幕发表演讲，呼吁各经济体共同努力，缓和并最终解决当前贸易争端，建立更好的全球贸易体系。拉加德说，7 月份时 IMF 曾预计 2018 年和 2019 年全球经济均将增长 3.9%，但此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变得黯淡，尤其是贸易壁垒正成为新现实。这不仅损害了贸易本身，而且随着不确定性持续上升，还损害了投资与制造业。

拉加德呼吁各经济体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公平、更适应未来的”全球贸易体系。她敦促各经济体共同努力，为贸易建立“更明智的规则”，以缓和并最终解决当前的贸易争端。

拉加德表示，各方需要修复而非破坏全球贸易体系。修复这一体系意味着要让它适应未来，尤其是激发服务贸易的潜力。最新分析表明，若将服务贸易成本降低 15%，2018 年二十国集团国家的经济总量将提高超过 3500 亿美元。

（五）三大国际机构：呼吁重振多边贸易体系

IMF、世界银行（WB）和 WTO 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联合发布报告《重振贸易和包容性增长》，呼吁各经济体继续推动全球贸易一体化改革，重振多边贸易体系，以更好适应现代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二战结束以来，开放的贸易在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减少贫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关税水平都已大幅下降。一个不断深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带来了更多的开放、透明和稳定。

报告指出，全球贸易一体化改革仍有许多工作尚未完成，特别是全球经济在信息技术、电子商务、服务等新领域的根本性变化尚未在全球贸易政策中得到体现。同时，全球价值链和中间品贸易的兴起要求各经济体加强监管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此外，在农村经济、小企业、女性经济赋权等方面，贸易相关的改革对实现更加包容性的增长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报告强调，多边贸易合作在高度互联、多极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日益重要，电子商务等许多重要贸易议题都是全球性的，只能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解决。继续推动全球贸易一体化要吸取过去近 20 年来 WTO 谈判的经验，既吸引多样化、有代表性的成员参加，

也要确保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开放和增强多边贸易体系。继续扩大全球贸易开放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竞争、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当天表示，许多 WTO 成员都认识到贸易政策的许多领域必须改善，以适应各经济体和民众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份报告有助于促进相关讨论来重振全球贸易体系和让所有人受益。

（六）WTO：数字化科技将推动全球贸易加速增长

2018 年 10 月 3 日 WTO 发布的《2018 世界贸易报告》显示，未来多年，数字化科技将有助于大幅削减贸易成本，推动全球贸易加速增长。

报告预测，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3D 打印、区块链等在内的数字化科技将对全球贸易产生深刻影响，在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预计每年将为全球贸易增长贡献约 2 个百分点。

报告认为，服务业和发展中国家有望在 2030 年前成为数字化科技的最大受益方。其中，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预计可从 2016 年的 21% 增加到 2030 年的 25%，而发展中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也有望从 2015 年的 46% 升至 57%。

报告警告，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有关问题未来也可能对管理数字化环境下的贸易构成挑战。

（七）WTO 总干事：国际贸易规则须适应科技变革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 2018 年 10 月 2 日在 WTO 2018 公共论坛开幕式讲话中表示，技术变革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如何调整国际贸易规则以适应这一新变化至关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贸易通过数字平台产生，随着物流方式日新月异，技术变革在颠覆我们传统贸易认知的同时，也给贸易发展带来了挑战。WTO 既要坚守基本规则，也要调整规则以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

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 4 年，技术的发展将取代 7500 万个工作岗位，但同时却能创造 1.33 亿个新的工作机会。阿泽维多强调，技术变革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各方能在公共政策等多个领域通力合作，将显著推动全球贸易增长。

本次论坛以“贸易 2030”为主题，聚焦未来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由技术推动的贸易发展和构建更加包容的国际贸易体制。活动共吸引了来自全球政商学界的 2500 多人参加。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WTO 2018 公共论坛：与会专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WTO 2018 公共论坛 2018 年 10 月 4 日在日内瓦正式落下帷幕。在为期三天的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的经贸专家探讨未来世界贸易发展的趋势，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贸易体制。来自多个国际组织的官员和专家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并且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多项措施给予高度评价。论坛以“贸易 2030”为主题，聚焦未来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由技术推动的贸易发展和构建更加包容的国际贸易体制。多名与会的国际组织官员和专家表示，过去 40 年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随着中国开放的脚步进一步推进，相信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也将会在推动国内发展的同时，更多地造福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将进一步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

世界银行宏观经济贸易和气候投资主任弗洛伊德表示，“中国是一个如此大的经济体，逐步采取开放措施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这将会是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全球化与发展战略司司长柯索尔·赖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新的机会。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经济，中国也面临着挑战，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对世界作出了非常强大和积极的贡献。

（二）渣打银行：通胀高企短期内并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的困扰

日前，渣打银行发布研究报告认为，近期市场对食品、进口产品和租金抬升的担忧不断增加，但输入性通胀是近期通胀的核心动力，同时通胀不会成为未来中国货币政策的核心挑战和困扰。渣打仍然维持全年通胀率为 2.2% 的预期，这仍然低于官方 3.0% 的通胀目标。

报告预计，食品价格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出现小幅度适度回升，回升主要动力为猪肉价格。高油价和汇率波动也将造成输入性通胀动力强劲。其中，高油价是中国输入型通胀上升的主要原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原油价格上涨 50% 会直接导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通胀上涨 0.3 个百分点。预计 2020 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将从 2018 年的每桶 71 美元上涨到平均每桶 78 美元。

租金上涨尚未对官方 CPI 通胀产生影响。某些地区和细分市场的房屋租金上涨速度

可能要比媒体报道所述要慢得多。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中国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关注房屋租赁市场的失常现象，加强对于中介提升租金的调查，并在短期内控制租金增长幅度。因此，在继续关注房屋租赁领域的同时，渣打预计近期房屋租金增长对 CPI 通胀的影响是良性的。

（三）IMF：中国政府“净资产”比重下降

2018 年 10 月 10 日 IMF 发布的《财政监测：管理公共财富》的半年度报告认为，2017 年中国政府净金融价值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8% 左右，其中地方政府“净资产”转负。金融危机后全球债务规模上升主要源自中美两国。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主动去杠杆，反映出推动经济转型的决心。但同时，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正在上升，未来决策难度加大。

IMF 财政事务局局长贾斯帕（Victor Gaspar）表示，2017 年中国地方政府“净资产”转为负值，部分源于去杠杆的努力。中国正处于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IMF 相信，中国应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在 2016 年和 2017 年，中国经济“加杠杆”已经放慢，反映出中国在从投资向消费、从外需向内需、从信贷驱动向更坚实的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有助于金融稳定。

IMF 赞许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做出的努力，但也注意到，经济环境变化可能使未来决策充满挑战。自 2007 年以来，中国私有部门非金融债务为全球私有部门债务上升贡献了 60%。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趋势，也采取了措施，使 2016 年和 2017 年的债务增速明显下降。此外，中国私有部门资产占 GDP 的 100%，为新兴市场中的最高。政府净金融价值仍为正值，占 GDP 的 8%，是 2012—2014 年间达到 GDP 的 15% 以上后逐年下降的结果。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地方政府净金融价值明显下降且首次为负。IMF 认为，这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上升及国企经营不善的结果。

IMF 认为，中国政府资产减去负债得出的“净金融价值”下降至 GDP 的 8% 左右，主要源于中央政府以下级别政府的借债和公有企业营收情况恶化。因此，“表外”债务和公有企业低效是未来的主要风险。与此同时，由于增长放缓以及贸易相关的不确定性上升，中国也有必要采取措施缓解这些冲击。这是决策者面临的难题。

（四）IMF：中国金融状况仍然保持稳定

2018 年 10 月 10 日 IMF 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中国的金融状况仍然保持稳定。受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股市持续低迷，而之前的金融去杠杆政策导致流动性

收紧，债市承压。为了对冲外部压力，这半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采取了边际宽松的措施，包括降准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 Fabio Natalucci 表示，他们认为中国当局非常清楚金融稳定与风险，对中国的政策建议也是一以贯之的。对中国当局而言，需要平衡的是如何在短期内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而不过多增加债务，在中期保持金融稳定。

（五）贝恩：2018 上半年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交易总额大幅下降

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贝恩公司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发布的 2018 年《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报告》中指出，2018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交易总额从 2017 年同期的 567 亿美元降至 220 亿美元，同比下降 61.2%，2017 年同比下降 52.2%。

从中国占亚太地区境外交易比重来看，2018 年上半年降至 11%。2015—2017 年中国占亚太地区境外并购交易的比重均超过 40%，其中，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为 56% 和 45%。2018 上半年并购交易减少的原因包括货币贬值、中美贸易战等。

2018 上半年私营企业完成的境外收购数量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国有企业。因为现有国际贸易的环境下，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交易会受到更多的审查，这些企业走出去会更加谨慎。中国企业因为普遍担忧在美国市场的发展机会，会搁置一些交易。此外，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市场的投资限制变得更加严格，中国政府同时加强了对境外投资的管控。

中美贸易的紧张关系促使中国企业改变境外并购交易的策略。很多企业转向美国之外的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寻求适合的技术能力收购目标，以此作为短期的应对方案。长远来看，中国企业需要制定长期的兼并购战略，针对不同场景来做出必要调整，在可能出现贸易战的时间段内制定不同的应急方案以规避风险。

2018 下半年，并购交易发展趋势更加复杂。例如，目前受到市场监管影响，企业发债难度越来越大，并购交易的成本越来越高。但发布会当日早晨股票大跌，很多公司的资产价格降低，并购或许更易发生。从交易量看，下半年并购交易额仍会稳定地下降。从交易金额看，一单大宗交易或许会影响甚至半年的交易市场，不排除下半年出现大额交易的情况。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10 月)				
世 界	3.3	3.7	3.7	3.7
发达国家	1.7	2.3	2.4	2.1
美 国	1.6	2.2	2.9	2.5
欧元区	1.9	2.4	2.0	1.9
日 本	1.0	1.7	1.1	0.9
发展中国家	4.4	4.7	4.7	4.7
印 度	7.1	6.7	7.3	7.4
俄罗斯	-0.2	1.5	1.7	1.8
巴西	-3.5	1.0	1.4	2.4
世界银行(WB,2018 年 6 月)				
世 界	2.4	3.0	3.1	3.0
发达国家	1.7	2.3	2.2	2.0
发展中国家	3.7	4.3	4.5	4.7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8 年 10 月)				
世 界	2.5	3.2	3.2	3.1
美 国	1.6	2.2	2.9	2.6
欧元区	1.9	2.5	2.0	1.8
日 本	1.0	1.7	1.1	1.2
印 度	7.1	6.7	7.4	7.5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世 界	2.2	5.2	4.2	4.0
进口				
发达国家	2.4	4.2	3.7	4.0
发展中国家	1.8	7.0	6.0	4.8
出口				
发达国家	1.8	4.4	3.4	3.1
发展中国家	3.0	6.9	4.7	4.8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8 年 10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10 月)				
世界	2.8	3.1	3.8	3.8
发达国家	0.8	1.7	2.0	1.9
发展中国家	4.2	4.3	5.0	5.2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8 年 10 月)				
世 界	2.5	2.5	3.0	2.8
美 国	1.3	2.1	2.5	2.3
欧元区	0.2	1.5	1.7	1.7
日 本	-0.1	0.5	0.9	1.1
印 度	4.5	3.6	4.7	4.9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6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二、美国经济				
单位: %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单位: %				
2017 年		2.2	1.6	3.4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9 月	2.2	1.5	3.1	2016 年		1.6	2.7	1.4
	10 月	2.3	1.5	3.1	4 季度		1.8	2.6	0.2
	11 月	2.3	1.6	2.6	2017 年		2.2	2.5	-0.1
	12 月	2.3	1.6	2.7	1 季度		1.8	1.8	-0.8
2018 年					2 季度		3.0	2.9	0.0
	1 月	2.4	1.6	3.0	3 季度		2.8	2.2	-1.0
	2 月	2.3	1.4	3.2	4 季度		2.3	3.9	2.4
	3 月	2.4	1.4	2.6	2018 年				
	4 月	2.3	1.6	2.8	1 季度		2.2	0.5	1.5
	5 月	2.1	1.9	3.5	2 季度		4.2	3.8	2.5
	6 月	2.4	2.1	3.1	3 季度		3.5	4.0	3.3
	7 月	2.4	2.2	3.7					
	8 月	2.5	2.1	3.5					
	9 月	2.3	2.0	3.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表 5 工业生产					单位: %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7 年		3.7	3.1	5.2				年度	季度
	9 月	4.4	3.0	5.7	53.2	53.9	53.7	2016 年	
	10 月	3.8	3.2	5.0	53.4	53.7	54.1	4 季度	
	11 月	4.3	3.4	5.5	54.0	54.9	55.1	2017 年	
	12 月	4.3	3.7	5.6	54.5	55.5	55.8	1 季度	
2018 年								2 季度	
	1 月	5.0	2.7	6.6	54.4	55.6	55.4	3 季度	
	2 月	5.0	3.2	6.5	54.1	54.8	55.0	4 季度	
	3 月	3.7	3.2	5.2	53.3	53.4	53.7	2018 年	
	4 月	4.3	2.7	6.4	53.5	53.9	53.8	1 季度	
	5 月	3.7	2.8	5.4	53.1	53.4	53.4	2 季度	
	6 月	3.7	2.6	4.8	53.0	53.2	52.9	3 季度	
	7 月	4.3	2.2	5.3	52.7	53.0	52.5	4 季度	
	8 月	3.0	2.2	4.7	52.6	53.3	52.5	2018 年	
	9 月				52.2	52.4	52.1	1 季度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单位: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6	2.7	1.4
					4 季度		1.9	2.8	0.9
					2017 年		2.2	2.5	-0.1
					1 季度		1.9	2.6	-0.1
					2 季度		2.1	2.5	0.1
					3 季度		2.3	2.4	-0.4
					4 季度		2.5	2.7	0.1
					2018 年				
					1 季度		2.6	2.4	0.7
					2 季度		2.9	2.6	1.3
					3 季度		3.0	3.0	2.4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7	−0.1	1.9
	4 季度	2.4	0.8	3.1
2017 年		4.8	3.0	4.6
	1 季度	4.3	2.6	4.1
	2 季度	4.7	2.7	4.6
	3 季度	4.6	2.1	4.1
2018 年	4 季度	5.7	4.7	5.4
	1 季度	5.2	4.3	5.0
	2 季度	5.8	5.7	4.2
	3 季度	5.0	3.9	5.7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7 年			1.2	4.4	218.8
	9 月	2.3	1.4	4.2	1.4
	10 月			4.1	27.1
	11 月			4.1	21.6
	12 月	−0.3	1.0	4.1	17.5
2018 年	1 月			4.1	17.6
	2 月			4.1	32.4
	3 月	0.3	1.0	4.1	15.5
	4 月			3.9	17.5
	5 月			3.8	26.8
	6 月	2.9	1.3	4.0	20.8
	7 月			3.9	16.5
	8 月			3.9	27.0
	9 月			3.7	13.4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7 年			3.0	33087		4.6	−8587
	8 月	1956	0.2	4.0	2398	0.2	4.4
	9 月	1984	1.4	5.0	2428	1.3	6.5
	10 月	1986	0.1	6.3	2456	1.2	7.1
	11 月	2023	1.8	9.1	2512	2.3	8.5
	12 月	2050	1.3	7.8	2569	2.2	9.7
2018 年							
	1 月	2020	−1.5	5.5	2543	−1.0	6.7
	2 月	2055	1.7	6.8	2604	2.4	10.1
	3 月	2100	2.2	9.1	2567	−1.4	8.6
	4 月	2105	0.3	9.5	2560	−0.2	7.5
	5 月	2147	2.0	11.4	2572	0.5	7.8
	6 月	2132	−0.7	9.5	2589	0.7	8.1
	7 月	2111	−1.0	8.2	2611	0.9	9.1
	8 月	2094	−0.8	7.1	2627	0.6	9.6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4718	2893	1825
	3 季度	1094	852	242
	4 季度	541	406	135
2017 年		2773	3004	−231
	1 季度	897	1263	−366
	2 季度	856	431	425
	3 季度	646	703	−57
	4 季度	374	608	−234
2018 年				
	1 季度	572	−1232	1804
	2 季度	−95	−541	446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3 季度	0.3	0.3	0.2
	4 季度	0.8	0.6	0.3
2017 年		2.4	1.6	1.1
	1 季度	0.7	0.4	0.2
	2 季度	0.7	0.5	0.4
	3 季度	0.7	0.4	0.4
	4 季度	0.7	0.2	0.2
2018 年				
	1 季度	0.4	0.5	0.1
	2 季度	0.4	0.2	0.4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4.0	3.0	4.2
	3 季度	0.8	0.3	0.7
	4 季度	1.4	1.5	1.9
2017 年		2.6	5.2	3.9
	1 季度	-0.7	1.8	0.5
	2 季度	2.1	1.0	1.1
	3 季度	-0.3	1.3	0.6
	4 季度	1.5	2.1	1.5
2018 年				
	1 季度	0.1	-0.7	-0.5
	2 季度	1.4	1.0	1.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7 年		0.8		241.1	9.1
	8 月				9.0
	9 月	0.3	1.1	62.1	8.9
	10 月				8.8
	11 月				8.7
	12 月	0.4	1.1	46.7	8.6
2018 年					
	1 月				8.6
	2 月				8.5
	3 月	0.0	0.9	65.0	8.4
	4 月				8.4
	5 月				8.2
	6 月	0.1	0.7	57.8	8.2
	7 月				8.2
	8 月				8.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3 季度	1.8	1.7	1.7
	4 季度	2.1	1.8	1.6
2017 年		2.4	1.6	1.2
	1 季度	2.1	1.6	1.0
	2 季度	2.5	1.8	1.1
	3 季度	2.8	1.9	1.4
	4 季度	2.7	1.6	1.2
2018 年				
	1 季度	2.4	1.7	1.1
	2 季度	2.2	1.4	1.1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4.0	3.0	4.2
	3 季度	5.5	3.0	4.8
	4 季度	4.2	3.7	4.4
2017 年		2.6	5.2	3.9
	1 季度	2.8	4.9	4.2
	2 季度	3.6	4.7	4.3
	3 季度	2.5	5.7	4.1
	4 季度	2.6	6.3	3.6
2018 年				
	1 季度	3.5	3.8	2.7
	2 季度	2.8	3.8	2.8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月份		(%)	(%)		(%)	(%)	口 额
2017 年	21949		7.1	19623		10.0	2327
	8 月	1831	2.3	1629	0.9	9.4	202
	9 月	1849	1.0	1613	-1.0	5.7	236
	10 月	1810	-2.1	1634	1.4	10.8	175
	11 月	1887	4.3	1685	3.1	9.3	202
	12 月	1920	1.7	1692	0.4	2.9	228
2018 年							
	1 月	1903	-0.9	1709	1.0	6.2	194
	2 月	1840	-3.3	1660	-2.9	1.8	180
	3 月	1864	1.3	1673	0.8	-2.0	191
	4 月	1873	0.5	1694	1.3	8.2	178
	5 月	1879	0.4	1713	1.1	0.6	167
	6 月	1912	1.7	1746	1.9	8.6	166
	7 月	1892	-1.1	1766	1.2	13.4	126
	8 月	1931	2.1	1765	0.0	8.5	166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1639	2485	- 846
	8 月	160	- 63	223
	9 月	- 97	147	- 245
	10 月	555	691	- 136
	11 月	413	- 269	681
	12 月	- 512	- 84	- 428
2018 年	1 月	- 327	- 19	- 307
	2 月	231	454	- 223
	3 月	- 508	195	- 703
	4 月	- 212	219	- 431
	5 月	- 164	- 236	72
	6 月	- 852	- 579	- 273
	7 月	172	- 20	192
	8 月	45	91	- 46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6 年		1.0	0.1	1.3
	3 季度	0.3	0.4	0.5
	4 季度	0.2	0.0	- 0.2
2017 年		1.7	1.0	0.4
	1 季度	0.7	0.5	0.3
	2 季度	0.5	0.8	0.4
	3 季度	0.6	- 0.7	0.1
	4 季度	0.2	0.3	0.1
2018 年	1 季度	- 0.2	- 0.2	0.0
	2 季度	0.7	0.7	0.2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1	1.7	- 1.6
	3 季度	0.2	2.3	- 0.1
	4 季度	0.7	2.7	1.0
2017 年		2.5	6.7	3.4
	1 季度	0.5	1.9	1.4
	2 季度	1.4	0.2	1.9
	3 季度	0.1	2.1	- 1.5
	4 季度	0.0	2.1	3.3
2018 年	1 季度	0.0	0.6	0.2
	2 季度	1.7	0.2	0.9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6 年		1.0	0.1	1.3
	3 季度	1.0	- 0.1	1.3
	4 季度	1.6	0.6	0.2
2017 年		1.7	1.0	0.4
	1 季度	1.5	0.8	- 0.6
	2 季度	1.6	1.8	0.9
	3 季度	2.0	0.6	0.6
2018 年		2.0	1.0	0.8
	1 季度	1.0	0.1	0.5
	2 季度	1.3	0.2	0.3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1	1.7	- 1.6
	3 季度	1.1	1.3	- 3.1
	4 季度	1.9	5.4	- 1.2
2017 年		2.5	6.7	3.4
	1 季度	2.0	6.6	1.5
	2 季度	3.3	6.8	4.3
	3 季度	2.8	6.9	2.7
	4 季度	2.0	6.5	5.3
2018 年	1 季度	1.4	5.1	3.9
	2 季度	2.2	5.0	2.9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7 年		3.3	2.24	2.8
	8 月	4.8	2.22	2.8
	9 月	1.1	2.27	2.8
	10 月	3.4	2.35	2.8
	11 月	1.5	2.34	2.7
	12 月	2.2	2.38	2.7
2018 年	1 月	1.0	2.34	2.4
	2 月	1.8	2.30	2.5
	3 月	1.3	2.41	2.5
	4 月	2.1	2.37	2.5
	5 月	1.3	2.34	2.2
	6 月	- 2.2	2.47	2.4
	7 月	1.2	2.42	2.5
	8 月	- 1.5	2.34	2.4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7 年	782865		11. 8	753792		14. 1	29073
9 月	66137	0. 5	14. 1	63500	2. 7	12. 3	2638
10 月	67215	1. 6	14. 0	63698	0. 3	19. 0	3517
11 月	68483	1. 9	16. 2	64803	1. 7	17. 3	3679
12 月	68779	0. 4	9. 4	68361	5. 5	15. 0	418
2018 年							
1 月	67907	- 1. 3	12. 3	63918	- 6. 5	7. 8	3989
2 月	67432	- 0. 7	1. 8	68995	7. 9	16. 6	- 1563
3 月	65582	- 2. 7	2. 1	64705	- 6. 2	- 0. 5	878
4 月	68538	4. 5	7. 8	64164	- 0. 8	6. 0	4374
5 月	68069	- 0. 7	8. 1	70744	10. 3	14. 1	- 2674
6 月	67787	- 0. 4	6. 7	67153	- 5. 1	2. 6	634
7 月	68315	0. 8	3. 9	69391	3. 3	14. 7	- 1075
8 月	68637	0. 5	6. 6	70548	1. 7	15. 3	- 1910
9 月	66938	- 2. 5	- 1. 2	69327	- 1. 7	7. 0	- 2389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21179	189450	- 168271
	8 月	2354	8472	- 6118
	9 月	- 1109	15365	- 16474
	10 月	1828	9869	- 8041
	11 月	1961	8487	- 6526
	12 月	4847	27409	- 22562
2018 年				
	1 月	- 2164	17179	- 19343
	2 月	1485	10285	- 8800
	3 月	5233	13257	- 8024
	4 月	- 973	12509	- 13482
	5 月	7988	13410	- 5422
	6 月	2458	18852	- 16394
	7 月	3469	14804	- 11335
	8 月	- 395	13150	- 13545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6 年		1. 4	1. 8	0. 3	- 3. 6	7. 1	- 0. 2
	3 季度	1. 5	1. 7	0. 9	- 2. 7	7. 6	- 0. 2
	4 季度	2. 0	1. 7	1. 0	- 2. 5	6. 8	0. 4
2017 年		3. 1	1. 7	1. 3	1. 0	6. 3	1. 6
	1 季度	2. 3	1. 8	1. 0	0. 0	6. 1	0. 6
	2 季度	3. 8	1. 8	1. 2	0. 4	5. 6	2. 5
	3 季度	3. 1	1. 7	1. 6	1. 4	6. 3	2. 2
	4 季度	3. 0	1. 3	1. 4	2. 1	7. 0	0. 9
2018 年							
	1 季度	2. 3	1. 2	0. 8	1. 2	7. 7	1. 3
	2 季度	1. 9	1. 3	0. 4	1. 0	8. 2	1. 8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6 年		2. 8	2. 3	2. 0	1. 5	4. 2	5. 0
	4 季度	2. 6	3. 3	3. 4	2. 8	4. 5	4. 9
2017 年		3. 1	2. 1	3. 8	2. 9	5. 9	5. 1
	1 季度	2. 9	3. 3	4. 4	2. 6	5. 6	5. 0
	2 季度	2. 7	1. 8	3. 9	2. 3	5. 8	5. 0
	3 季度	3. 8	1. 6	3. 6	3. 2	6. 2	5. 1
	4 季度	2. 8	1. 5	3. 4	3. 4	5. 9	5. 2
2018 年							
	1 季度	2. 8	1. 4	4. 6	3. 0	5. 4	5. 1
	2 季度	2. 9	2. 6	3. 5	3. 3	4. 5	5. 3
	3 季度	2. 0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7 年		6. 4	4. 5	12. 8	5. 2	27. 5
	8 月	6. 2	4. 3	12. 6	4. 9	
	9 月	6. 2	4. 3	12. 4	5. 0	27. 7
	10 月	6. 3	4. 3	12. 2	5. 1	
	11 月	5. 9	4. 3	12. 0	5. 1	
	12 月	5. 8	4. 4	11. 8	5. 1	26. 7
2018 年						
	1 月	5. 9	4. 3	12. 2	5. 2	
	2 月	5. 8	4. 2	12. 6	5. 0	
	3 月	5. 8	4. 2	13. 1	5. 0	26. 7
	4 月	5. 8	4. 2	12. 9	4. 9	
	5 月	5. 8	4. 2	12. 7	4. 7	
	6 月	6. 0	4. 0	12. 4	4. 7	27. 2
	7 月	5. 8	4. 0	12. 3	4. 7	
	8 月	6. 0			4. 6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7 年		3. 7	3. 4	3. 1	3. 8	3. 4
	8 月	3. 8	3. 5	3. 1	3. 8	3. 4
	9 月	3. 7	3. 6	3. 1	3. 7	3. 4
	10 月	3. 6	3. 5	3. 0	3. 7	3. 4
	11 月	3. 7	3. 4	3. 0	3. 7	3. 4
	12 月	3. 7	3. 1	2. 9	3. 7	3. 3
2018 年						
	1 月	3. 6	3. 4	2. 9	3. 7	3. 4
	2 月	3. 6	3. 2	2. 9	3. 7	3. 3
	3 月	4. 0	2. 9	2. 9	3. 7	3. 3
	4 月	3. 8	3. 4	2. 8	3. 7	3. 3
	5 月	4. 0	3. 2	2. 8	3. 7	3. 3
	6 月	3. 7	3. 4	2. 8	3. 7	3. 4
	7 月	3. 8	3. 5	2. 8	3. 7	3. 4
	8 月	4. 2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4212	4325	-114	4410	6441	-2030
8 月	346.2	381.6	-28.2	336.8	541.3	-204.5
9 月	350.3	374.4	-18.8	377.1	617.4	-240.4
10 月	362.0	369.1	-20.2	390.3	590.0	-199.7
11 月	366.2	382.2	12.1	397.5	577.2	-179.7
12 月	361.1	354.1	8.7	386.5	524.5	-138.1
2018 年						
1 月	364.8	352.4	-41.9	402.8	599.6	-196.8
2 月	336.6	351.8	-15.2	382.0	529.1	-147.1
3 月	385.0	406.7	-21.7	440.3	604.1	-163.8
4 月	373.1	394.4	-21.3	394.9	556.1	-161.2
5 月	394.5	412.7	-18.1	405.4	540.2	-134.9
6 月	399.7	401.3	-1.6	419.4	555.9	-136.5
7 月	371.6	378.1	-6.5	416.0	554.5	-138.4
8 月	385.5	390.5	-5.0	401.6	535.7	-134.2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888	830	59	2178	1507	670
9 月	78.5	74.3	4.2	186.7	141.1	45.6
10 月	75.8	72.7	3.1	188.8	142.8	46.0
11 月	82.8	73.4	9.4	166.9	137.3	29.6
12 月	77.6	67.0	10.6	176.0	131.9	44.1
2018 年						
1 月	66.0	88.5	-22.5	169.7	148.5	43.4
2 月	75.9	76.5	-0.6	173.2	129.8	56.7
3 月	82.8	75.1	7.7	200.9	144.2	55.2
4 月	73.0	72.1	0.9	199.3	144.2	55.2
5 月	81.7	78.9	2.9	191.3	138.6	52.7
6 月	84.3	74.2	10.1	200.7	149.7	51.0
7 月	79.9	83.9	-4.0	227.6	195.0	32.6
8 月	82.9	75.7	7.2	225.5	196.3	29.2
9 月				190.9	147.6	43.3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2991	4473	-1446	3535	2378	1158
9 月	286.5	379.2	-92.7	308.0	205.6	102.4
10 月	228.5	374.6	-146.1	315.8	215.0	100.8
11 月	260.9	404.2	-143.3	334.4	219.0	115.5
12 月	276.8	419.1	-142.3	375.3	241.5	133.9
2018 年						
1 月	249.6	406.6	-157.1	335.9	166.7	169.1
2 月	260.3	378.7	-118.4	312.7	191.1	121.6
3 月	291.7	428.0	-136.3	366.2	216.4	149.8
4 月	256.4	396.0	-139.6	359.9	208.0	151.8
5 月	289.9	438.8	-148.9	365.6	214.1	151.5
6 月	273.2	448.1	-174.9	363.8	211.3	152.6
7 月	259.5	437.9	-178.4	344.3	210.3	134.0
8 月	278.7	452.4	-173.6	374.4	216.4	158.0
9 月	279.5	419.3	-139.8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5737	4785	952	4095	4322	-227
9 月	551.2	417.0	134.2	338.2	367.3	-29.1
10 月	447.9	378.6	69.3	367.2	400.7	-33.5
11 月	497.1	420.1	76.9	374.9	381.1	-6.2
12 月	490.4	435.3	55.1	359.8	370.0	-10.2
2018 年						
1 月	492.3	457.4	34.9	307.2	361.2	-54.0
2 月	445.3	417.1	28.2	350.8	350.5	0.3
3 月	513.3	448.8	64.5	394.5	377.3	17.2
4 月	498.7	435.6	63.1	371.8	374.7	-2.9
5 月	507.1	443.3	63.7	391.8	407.6	-15.8
6 月	511.3	449.9	61.4	374.8	383.8	-9.0
7 月	518.2	449.5	68.7	367.2	396.1	-28.9
8 月	512.0	443.4	68.5	395.4	421.3	-25.9
9 月	505.9	408.4	97.5	378.1	380.0	-1.9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5503	5899	-396	3174	2595	579
9 月	496.3	526.2	-30.0	289.0	222.8	66.2
10 月	464.6	503.8	-39.2	275.4	223.4	52.0
11 月	502.6	553.2	-50.6	288.8	229.1	59.7
12 月	490.8	553.5	-62.6	295.1	233.7	61.4
2018 年						
1 月	483.9	521.4	-37.6	273.8	247.0	26.9
2 月	337.0	387.5	-50.5	223.6	192.9	30.7
3 月	486.7	546.1	-59.4	299.9	239.8	60.1
4 月	460.0	498.5	-38.5	267.3	225.6	41.7
5 月	485.4	521.3	-35.9	291.2	247.1	44.1
6 月	482.2	532.3	-50.1	282.4	230.3	52.1
7 月	489.9	541.1	-51.2	283.6	260.9	22.8
8 月	506.5	559.8	-53.4	283.0	237.7	45.2
9 月				296.2	252.9	43.3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2178	1951	227	1686	1569	117
9 月	185.9	165.5	20.5	145.6	127.8	17.8
10 月	194.6	169.9	24.7	150.9	142.4	8.5
11 月	200.2	176.3	23.9	153.2	151.1	2.2
12 月	194.5	176.8	17.8	147.9	150.9	-3.0
2018 年						
1 月	209.3	184.8	24.4	145.5	153.1	-7.6
2 月	179.8	156.8	23.1	141.3	141.9	-0.5
3 月	216.4	178.8	37.6	155.9	144.6	11.2
4 月	216.8	183.3	33.5	145.4	161.6	-16.3
5 月	207.2	186.7	20.5	162.1	176.6	-14.5
6 月	196.5	181.5	15.0	129.7	112.7	17.1
7 月	212.8	192.2	20.6	162.9	183.0	-20.1
8 月	199.9	196.0	3.9	158.7	168.2	-9.4
9 月				148.3	146.0	2.3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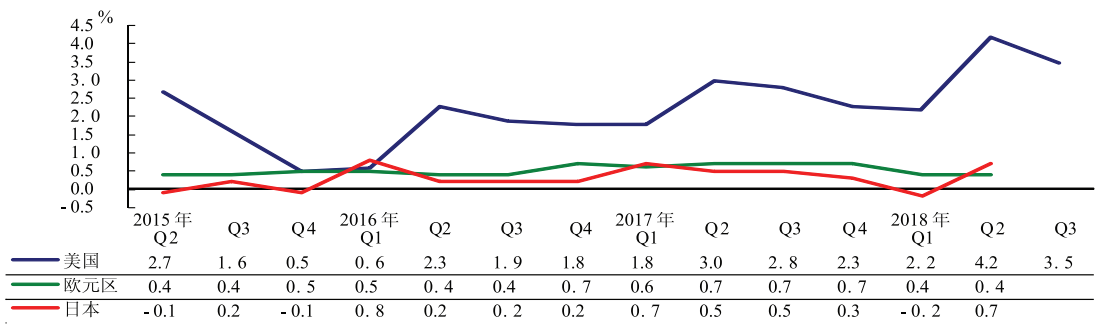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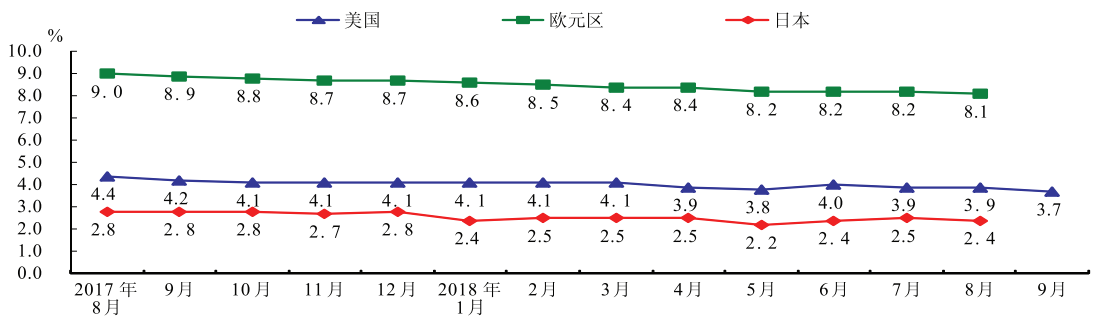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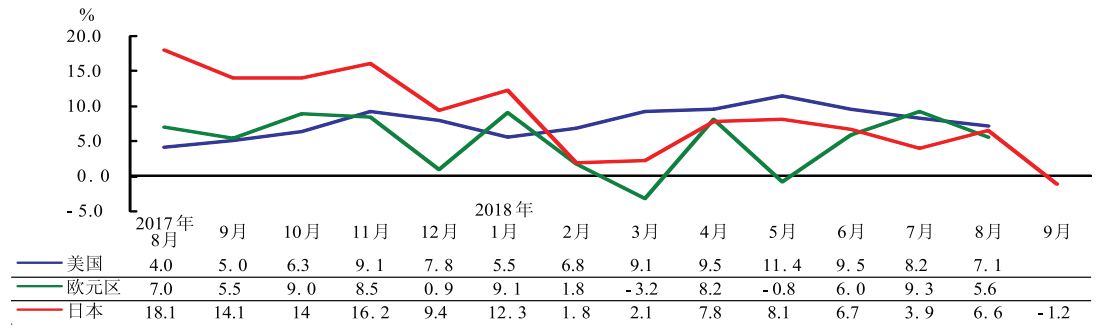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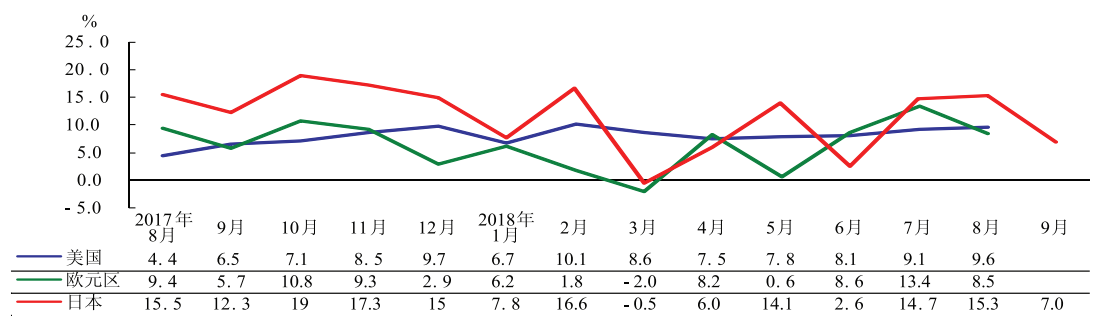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1~图4)。

ABSTRACTS

(1) Adhering to innovation, opening up and cooperation: To driv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industry

Zhang Xiaoqiang

While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since 2009, we should be soberly aware of the gap existing between China’s energy industry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world’s advanced level. The China’s 13th Five – Year Plan Outline put forward that we should speed up energy revolution, push har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patterns, optimize the energy supply structure, improve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build a clean, low – carbon, safe and efficient energy system, and safeguard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nergy industry needs to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exp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umber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key common technologies and moder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which include technologies for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equipments and technologies for deep – sea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tterie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key technologies for electronic control and power – generating machine,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for large – scale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construction, large – scale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high – power electric power and electronic devices and so on. The especial importance is to establish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with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 market as the guide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e should support the innovation not only for the backbone large energy enterprises, but also for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ergy enterprises. We must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treat more effectively the chronic disease of dual problem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pening up the energy sector requires efforts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more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oil and gas import source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to improve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e the settlement using our own currency in bilateral trade with major oil and gas trading countries,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oil and gas pricing mechanism in Northeast Asia or Asia – Pacific region and internet for cooperation on energy, actively promote the negotiation and signing of high – level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or regions; support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variety of ways.

(2)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CCIEE Research Group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in China,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in the

economic field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success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At present, the chang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hav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deepening reform, opening up and innovation in an all – round way. The restart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should adhere to the problem – oriented approach, tak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further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government and societ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3)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nhance China ’ s softwar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Wang Xiaohong and Li Rui

Digital economy is becoming a new kinetic energy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infrastructure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digital have accelerated, and the growth of new digital industries, new formats and new modes has speed up, releasing strong demand for software market and creating huge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 expanding global software trade.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have rolled out the strategy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China ’ s digital economy lags far behind in strategic layou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dustrial chain and core technology. We shoul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omestic digital economy and formulate relevant development plans;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oftware export; speed up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core technology, build the software industry ecological system with integrated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improve the level of creation and protection of softw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rive for dominance and discourse pow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rules.

(4)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top – level design of green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Zhang Jidong, Pan Jian, Yang Ronglei and Xing Guojun

in the process of pushing the “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guided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ules, and carried out in – depth coop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lution preven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ircular economy and other fields, and constant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of green finance and green trade system construction. China is taking action to build a “green silk road” that disseminates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motes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hares the achievemen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lso soberly awa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en silk road” has a long way to go where we will face the challenges of low carrying capacity, weak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undation, poor sense of a few enterprises and huge influence of some industries. To promote the green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we need to use strategic thinking to do well in the top – level design of the “four pillars and eight pillars” in which we

should not only grasp the “nose”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green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provide feedback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bout the achievements of green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but als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impact monitoring by the remote sensing means for key industries in important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so as to avoid significant ecological risk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5) Measurement of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hoices of aid modes in Africa

Wang Zhen, Yue Hongfei and Zhou Jing

Comb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Inclus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ID), this paper constructs four dimensions of African ISID indicators including “soc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growth”,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equal inclusion”,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aid modes on African ISI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progress in Africa’s ISID from 2000 to 2014, the level is generally low and the progress is slow, a trend of progress is observed for the middle and high – income countries in Africa while the low – income and middle – income countries basically remain unchanged or even retrogress.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via aid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African ISID; grant assistance was un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savings rate and foreign exchange fund gap, and achieved poor results; commercial loans need to be more prudent, which onl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relatively mature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of middle and high – income countries, and have little or no effect for most African countries. Middle and high – income countries in Africa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growth,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quity, while low and middle – income countries in Africa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paradise”.

(6) Analysis of the law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hange

Guo Yingfeng, Hu Yiming and Liang Yunfeng

At present,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economic struct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isting quantitative monetary policy with indirect regulation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with its effectiveness being declining. As one of the two major macro – control means, monetary policy needs to actively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macro – control objectives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micro – subjects under the decisive effect of market mechanism, the innov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financial formats, and the reform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which requires that China’s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properly transformed from the former quantitative monetary policy into a price based monetary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hanges, we can fin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has certain regularity.

(7) China’s thinking and path design for improving BRICs cooperation platform

Zhao Chunzh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st decade, BRICS has gradually realized the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investment to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moting the representation and voice of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of emerging economies represented by BRICS countries in the existing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s not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economic strength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With the emergence of emerging countries as a group, the asymmetry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adequate, obviously affecting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basic thoughts for strengthening the BRICs cooperation platform is under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complement it with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G20 cooperation mechanisms, gradually expand the scale, build permanent institutions, enrich the content of cooperation, deepen cooperation,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platform of cooperation for all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On this basis, we will steadily expand the size of member countries to allow the coverage of cooperation platform from BRICS member countries to major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8)Three dimensions to see Zhejiang

Huang Yong, Pan Yigang and Lang Jinhuan

China’s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a high – speed growth stage to a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We must focus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striving to achieve a higher quality, more efficient, more equitable and m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paring with nine provinces, districts and cities with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of more than \$ 10,000,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high quality, balance and sustainability, combs the advantages and inadequateness and imbalance in Zhejiang’s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work focus.

(9)Shenzhen: the pioneer of promoting social reform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Commemorating 40th anniversary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 Luoli

After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nd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soci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she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social and livelihood areas that most directly revolve around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thus becoming a new milestone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the window and leader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enzhen is still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country in soci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First, Shenzhen i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country i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by the third – party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s conscious acceptance of supervision; second, Shenzhen i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country in grassroots social reform; and thirdly, Shenzhen i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country in grassroots social reform,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Editor: Huang Yongfu

欢迎订阅《全球化》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2 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50；电话：010－83362183/83366113。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 35 元，美元 20 元，港币 50 元，每月 25 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19 年《全球化》杂志（月刊）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电话	
详细地址 (邮编)				
征订份数		420 元/年（12 期）	总计金额	